

致读者

亲爱的校友们：

校友刊物《民大人》，今天又以一个新的面孔，跟大家见面啦！从本期开始，她将以面目亲和，内容丰富，原创性强的特点呈献给校友们。换言之，《民大人》将逐步减少新闻报道所占比重，强化原创性、纪实性文章，着力打造成有品位、有主见、有情怀的人物类校友专刊。

民大校友会是民大校友的家，旨在加强母校与校友之间、校友相互之间的联系。《民大人》是母校与校友之间、校友相互之间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展示校友风采、宣传母校成就的平台。

时代在变迁，赋予我们新的光荣与梦想，促使我们再一次把《民大人》推到了自我变革的新途。

求知的渴望，校友的情怀，各族兄弟姐妹的挚爱……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寄托在一个有品位、有主见、有情怀的校友刊物上。《民大人》注定是其忠实的载体、生动的化身！

现在，我们对栏目做了重新设计定位，平添对师生风貌和校友故事的报道。

作为“重头戏”的《名师》栏目，其选题侧重思想性、学识性、影响力，契合我校的定位与发展；《民大之子》则更加注重与时效热点的联系，以投合读者们的阅读兴趣；《三角地情怀》，全部遴选原创性的文章，为校友们提供展示回忆，抒发钟爱母校的情感之地；《我和我的民大》在那里你会看到自己青葱岁月的影子；在《副刊》中，你会读到校友文采飞扬，溢满家国情怀的文学作品。

当然，不管形式如何变，《民大人》讲述“民大人”自己的故事，这个办刊宗旨永远不变，对母校情怀和民大格调的坚守，永远不变！

最后，感谢校友们多年来对《民大人》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参与《民大人》采编发行的同事，感谢每一位撰稿人，感谢每一位接受采访的老师和校友。感谢每一位读者！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民大人》建成“民大人”共有的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编辑部全体同仁，恭祝校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民大人》编辑部

CONTENTS 目录

致读者

一、专题报道

1.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美美论坛举行 / 004
2. 凝聚力量 携手前行——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会长高庆海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 005
3.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执行团队名单 / 006

二、母校聚焦

1. 党委宣传部党支部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 007
2. 我校召开“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座谈会 / 007
3. 民大师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 / 008
4. 我校两项目入选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 009
5. 党委书记鄂义太为学校新党员及预备党员培训班全体师生学员讲专题党课 / 010
6. “民族天籁”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作品音乐会在京成功举行 / 012
7. 教育部语信司司长田立新莅临学校考察指导相关工作 / 013

三、校友活动

1.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0 周年院庆圆满落幕 / 014
2. 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 30 年校友聚会 / 015
3. 中央民族大学媒体圈沙龙 / 017

四、封面人物：王尧 / 018

五、名师

1. 才华自横溢 人生多蹉磨——闻宥先生忌辰三十周年 / 022
2. 现代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的创构者 / 026
3. 从事教书，是我的福气——记“北京市师德榜样”、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宗丽教授 / 030

六、民大之子

1. 拳拳之心七年梦想终成真——1985 级新闻专业校友向母校捐赠“日晷”雕塑 / 032
2. 秦海：创业维艰，一路靠自省！ / 036

七、三角地文化

1. 难忘的民院往事 / 038
2. 扒一扒历史系 88 级 / 041
3. 在狂风暴雨中飞翔——回忆大学生治安服务队 / 046
4. 那份工作，那间小屋，那一群人——记在民院广播站的日子 / 048
5.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哲学系的故事 / 050

八、我和我的民大

1. 青春不老 / 053
2. 我的大学生涯 / 055
3. 预科二十年碎忆 / 063
4. 从这我们打开新闻之门 / 065

九、校史钩沉

1. 不可复制的进藏招生经历 / 067
2. 阿佩山实习纪行 / 071
3.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科的前世今生 / 077

十、线上线下

1. 教育学院举行民族教育学科建设高级论坛 / 080
2. “2016 中国城市品牌建设研讨会”召开 / 081
3.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高层论坛在我校举办 / 082
4. 2016 中俄能源论坛暨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京举行 / 083
5. “近代中国的族群、民族与边界”研讨会召开 / 084
6. “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会”在校举办 / 085
7. 文传学院举办“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 / 086

十一、合作交流

1. 刀波会见三菱 UFJ 国际财团理事长一行 / 087
2.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副校长代表团访问我校 / 088
3. 西昌学院副校长来校考察交流 / 088
4.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校长肖恩·休斯顿教授一行来校访问 / 089
5. 内蒙古民族大学考察团来校调研交流 / 090
6. 缅甸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代表团到访我校 / 091

十二、校园民族文化

1. 2016 羌历年晚会在京举行 / 092
2. 在京土族欢度 2016 年安召纳顿节 / 094
3. 彝年聚亲朋，彝心暖京城
——2016 北京彝族同胞欢度彝历新年系列活动在中央民大举行 / 095

十三、副刊

1. 评论讽刺小说——阿凡提新篇 / 096
2. 额鲁特的诗 / 097
3. 魏公村往事 / 101
4. 长征诗三篇 / 103

十四、图片掠影

外语学院 - 老照片 / 107

《民大人》编委会:

主任: 马文喜

副主任: 刀波 石亚洲 邹吉忠 殷会利 张艳丽
吕家兴 高庆海 王红曼 丁汀 李晓东

主编: 王红曼

执行主编: 李晓东

编辑: 武雷 彭烁 田迎春

主办: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

协办: 中国民族报经济部

制作发行: 北京中民艺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美美论坛成功举行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大会于 201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2 点，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一层报告厅隆重召开。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旨在为母校“创新、创业”工作服务，为民大创业校友服务，为民大在校学生创业服务，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成立大会由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主办，参加此次会议的学校领导有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校友会会长马文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助理吕家兴，校友办王红曼主任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校友创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校友共 200 人。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成立大会由校友创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林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文喜教授代表学校致辞并宣布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马书记在致辞中，阐述了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的必要和意义，向全体与会校友表达了学校支持校友活动的决心，也提出了对校友创业联合会后续工作的殷切期望。会上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由黄泰岩校长、马文喜副书记、高庆海会长共同为校友创业联合会揭牌。北大校友创业联合会副会长孔令博代表兄弟高校校友创业联合会致贺词。最后校友创业联合会会长高庆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庆海会长首先向报告了联合会成立的过程，并对学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

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高庆海会长通过七个方面向校友介绍了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一是进一步明确创会宗旨；二是抓紧做好联合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三是做好创业校友信息搜集和会员发展工作；四是开展系列活动、服务校友创业；五是凝聚校友力量，为母校建设和发展服务；六是服务和支持在校学生的创业和就业的指导工作；七是加强对外宣传和校际创业联合会工作交流。最后高庆海会长提出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求实创新、勇于创业、共谋大业，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民大校友的力量”。成立大会在校友们热烈的掌声和最诚挚的祝福中顺利结束，校友们从祖国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母校，共同见证了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的盛举。成立大会之后，举办了首届“美美论坛”。“美美论坛”是首个由民大校友发起和组织的论坛，它秉持开放、创新、平等的精神，为民大校友提供一个畅谈经济走势，纵论改革之道，切磋创新创业经验，讨论企业基业长青之路的交流、研讨的平台。校长黄泰岩教授、现代移动互联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丹枫博士、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师孙建波博士在论坛上分别发表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及转轨中的企业应对》、《传统企业互联网化升级与创新》和《经济转折时代的资本市场展望》的精彩演讲，受到与会校友的热烈欢迎。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秘书处 王润球

凝聚力量 携手前行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会长高庆海 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黄校长、马书记，尊敬的各位老师、校友代表和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我谨代表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各位领导、老师、校友、朋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加强对校友创业的支持，发挥创业校友合力，为母校、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贡献力量，中央民族大学部分校友向学校校友会和学校领导提出了成立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的建议，此建议得到校友会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2016年6月20日，校友会正式发文同意成立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2016年6月28日，校友代表选举产生了创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并通过了《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章程》。创业联合会从筹备到成立得到学校领导、校友工作办公室、校友会老师和校友们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同时经济发展由持续高速增长进入了新常态；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各项经济活动也进入了崭新的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这些变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校友创新创业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绝大部分校友来自经济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大部分校友毕业后回到家乡，回到民族地区。他们愿意创业，渴望利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为本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但是，由于大部分民族地区存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信息闭塞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他们的创业热情、项目实施和企业的发展壮大。

成立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就是为了创业的民大校友提供一个持续交流信息、资源共享、联络情感、合作共赢的平台，帮助民大校友勇于创业、持续创业、成功创业。同时，凝聚校友力量，架起创业校友和母校息息相通的桥梁。今后一段时期，校友创业联合会将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进一步明确创会宗旨。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是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领导下服务民族地区创业校友的自发型、自律型、平台型的服务组织，办会的宗旨是“以汇集校友力量、实现资源互惠共享、服务校友创业、为民族地区全面发展贡献民大人的力量”。联合会将为民大创业校友

搭建一个项目、资金、人才、媒体、政策互通互融的平台。

二、抓紧做好联合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联合会将招聘专职工作人员负责联合会日常工作，保证联合会工作常态化。同时依据联合会章程制定相关财务制度、会员制度等规范工作行为和会员行为。

三、做好创业校友信息搜集工作和会员发展工作。校友信息数据库是开展校友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开发利用校友资源的基础。在初期将通过设立院系联络人和地区联络人等方式和途径广泛搜集创业校友信息，并依据章程对愿意加入联合会的校友发展入会。

四、开展系列活动，服务校友创业。日常活动是发展和保持联合会持续活动的关键，联合会将以感情为纽带，以事业为目标开展多种内容和形式的活动，将定期举办“美美”论坛，不定期举办各种沙龙、聚会、培训、参观等活动，满足校友创业需求。

五、凝聚校友力量，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充分发挥联合会沟通母校与校友情感的交流作用和协调作用，积极寻求母校发展需求和校友意愿的契合点，建立校友与母校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使校友与母校的感情和事业上联系更加紧密互动，为母校发展服务。

六、配合母校职能部门，服务和支持好在校学生的创业和就业指导。目前各高等院校都在广泛地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以文科为主的民族特色学校，大学生创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联合会将通过设立“创业大讲堂”和“创业导师”等活动鼓励和帮助在校学生创业，使其创业少走弯路，事半功倍。同时，根据创业校友企业和单位用人需要，帮助在校毕业生就业，鼓励创业校友单位优先录用母校毕业生。

七、加强对外宣传和校际创业联合会工作交流。我们将通过网站、微信、报刊、杂志等渠道提高创业联合会知名度，不断扩大创业联合会影响力。同时开展与兄弟高校校友创业联合会、校友企业家联合会等组织的联系，学习他们好的经验和做法，交流合作，实现共赢。

总之，校友创业联合会将团结广大创业校友，凝聚校友智慧和力量，坚实走好每一步，不辜负母校和广大校友的厚望。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校友，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今天宣告成立了。让我们携起手来，求实创新、勇于创业、共谋大业，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民大校友的力量。

谢谢大家！



中央民族大学 校友创业联合会

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执行团队

一、理事会 理事（排名不分先后）

- 高庆海 北京中民健投资集团公司 总经理
王世林 深圳市华晟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可夫 北京可儿幼教集团 董事长
杨光兴 上海府大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白金钟 天津红礪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波 杜普传媒执行 董事
申东日 北京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彤 《市场观察》杂志社 总编辑
全熙根 抚松参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安阳 玖弘（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人
刘焯 北京读书堂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监事会 监事（排名不分先后）

李雪涛 田迎春

三、执行团队

会长 高庆海
副会长 王世林 杨光兴 刘可夫 白金钟 刘彤 申东日 安阳
秘书长 全熙根
副秘书长 王润球（兼）

党委宣传部党支部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刊讯 9日上午,党委宣传部召开党支部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刘云山同志的会议总结讲话精神。

会上,同志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讨论和深入领会,大家认为,刚刚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是高校党的建设历史上的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委宣传部部长、党支部书记朱雄全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纲领性文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针对性,总书记的讲话中,明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的三个“根本问题”,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两个“更加”形势、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四个“坚持不懈”、教育引导学生的四个“正确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四个“统一”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高校宣传思想战线的全体党员同志,要认真学习 and 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将理解和认识化为做好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和遵循,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宣传工作全过程,开创中央民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为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不断做出积极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母校聚焦



我校召开“双一流建设”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座谈会

本刊讯 为加快“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学校“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执行进度达到财政部要求,近日,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4-2016年‘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考核方案”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讨论“2014-2016年‘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考核方案”,部署2014-2016年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考核和2017年预算编制工作。学校发展规划处、财务处负责人及各学院(系)、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2011协同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发展规划处负责人首先传达了学校资金预算工作会议精神,对2014-2016年“引导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和2017年预算编制工作进行了部署,从预算执行考核的时限和标准、考核指标、考核方法、考核结果的应用、考核主体和考核时间六个方面对“2014-

2016年‘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考核方案”做了解读。

财务处负责人就目前学校专项资金执行情况、面临的压力和财政部、国家民委对国拨专项资金执行进度的相关要求做了介绍。与会人员就“2014-2016年‘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考核方案”进行了讨论。

学校要求,各学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和考核工作,做好动员,既要积极推进项目执行进度,又要保障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各单位在执行2014-2016年“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的同时,要提前做好2017年“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民大师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的重要讲话精神



母校聚焦

本刊讯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于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自12月9日起，民大校园掀起学习热潮，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各族师生中引发热议。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班班多杰教授在学习讲话后表示非常振奋。他认为，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立足于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阐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内涵，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作为高校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今后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课堂主渠道，把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贯穿到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做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合格人才。

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宗丽教授对讲话中提出的“立德树人”感受颇深。她谈到，从教师的层面来说，立德为先，任务是树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教师要用“德”去教育学生、影响学生，用“才”去感染学生、引领学生。作为一名教师，我力求做好树人的工作。

党委宣传部部长朱雄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针对性。作为高校宣传思想战线的全体党员同志，要认真学习 and 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将理解和认识化为做好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和遵循，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为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不断做出积极贡献。

结合自身工作，藏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包永贵深切感受到民族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做好广大少数民族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在深受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宗教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师生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的需要，更是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五个认同教育的需要，还是通过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维护边疆稳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他表示，今后要把学习和贯彻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与学院理论中心组学习和教职工理论学习相结合、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结合、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当前“双一流”建设相结合，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到学院一流学科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在学院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上，为培养各民族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邓群感受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看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个“春天”，既倍受鼓舞，又深感任重道远。作为一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满热爱，坚守情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成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的“引路者”和“守望者”。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路义旭谈到，总书记的讲话明确了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聚焦点、着力点，在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进行肯定的同时，还从拓展选拔视野、抓好教育培训、强化实践锻炼、健全激励机制等方面明确了整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思路。讲话既饱含期望、催人奋进，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团委副书记樊博谈到，作为高校的共青团干部，不仅要在思想上做到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项活动都要站在为加强和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

统筹谋划，精心开展；对待每一名学生都要做到以人为本，从他们的实际需要出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培养和引导他们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总书记的讲话将成为学校共青团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工作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将会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力争做到把思想引导贯穿到每一项工作中，融入到每一项活动中，结合当代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成长需要，想好点子，找对法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每一名学生在全面成才的过程中，都能深切感受到党的关怀。

信息工程学院辅导员李晓旭通过认真学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深深感到作为高校尤其是民族高校辅导员责任重大，并表示，在实际工作中要积极响应中央精神，强化思想引领，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始终与学生在一起，把学生的点滴成长汇成自己的幸福，与学生同心同行，助力他们成长成才，在辅导员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用团结敬业的精神激励各族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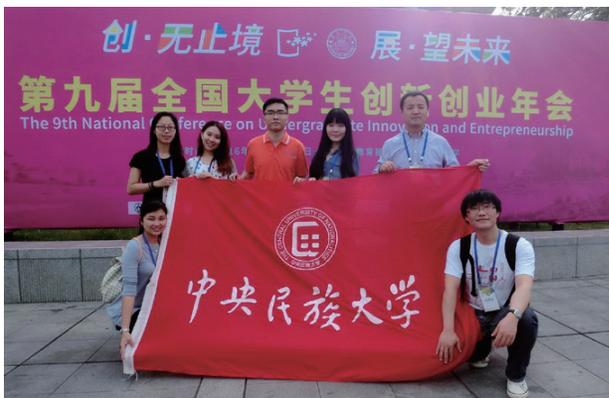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辅导员王海舟表示，总书记

的讲话高屋建瓴地引领高校思政工作者保卫并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极大地鼓舞了辅导员的士气，同时对高校思政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具体指导，并对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听从总书记的教导，首先明道、信道，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知识水平，根据不同民族学生的特点，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有针对性地满足各民族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做出贡献。

历史文化学院 2014 级本科生王艺朝对总书记讲话中强调的“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印象深刻，感到当今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应紧随时代的潮流，担当起身上的一份责任，努力学习，积极实践，不断积累学识和各方面的技能，脚踏实地，努力前行。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我校两项目入选第九届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本刊讯 近日，由教育部主办、厦门大学承办主题为“创·无止境，展·望未来”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开幕，我校学术论文《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基于量化潜在 GDP 的研究》和展示项目《贵州安顺屯堡地戏的“遗产化”实践研究》两个项目入选。全国 300 余所高校（含澳门地区）和韩国蔚山大学师生代表以及相关机构的科学家、企业家等约 1500 人参会。

我校接到年会通知后，教务处实创中心高度重

视，在学校各教学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下，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项目中认真遴选后报送至教育部。经年会组委会专家评审后，我校经济学院张丽君、王飞两位老师共同指导、汤金润同学撰写《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基于量化潜在 GDP 的研究》和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潘守永老师指导，张一丹、郭郑瑞、邹思媛、赵一、许禄同学共同完成的展示项目入选。我校学生张一丹、汤金润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过硬的专业素养，与参会的同学和评审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 573 所高校推荐的学术论文 813 篇、创新创业展示项目 845 项、创业推介项目 213 项，共计 1871 项，参与的高校数和推荐的总项目数均为历届年会最多。本届年会期间评出了“优秀论文”20 篇、“我最喜爱的项目”20 项、“最佳创意项目”20 项、“优秀创业项目”6 项、“创新方法应用优秀指导教师”5 项、“创新方法应用优秀学生团队”10 项。

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

党委书记鄂义太为学校新党员及预备党员培训班全体师生学员讲专题党课



母校聚焦



本刊讯 12月4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鄂义太出席“2016年新党员及预备党员培训班总结大会”，并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做合格党员”为题，为全体师生学员讲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专题党课。

鄂义太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且通过中央全会进行专门决策部署，是我党自身建设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新飞跃，体现了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历史担当。六中全会与之前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完整地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新时代。六中全会还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是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贡献。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持续推进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在广大党员同志中落深、落细、落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组织的首要政治任务。要着重从三个方面加深理解和认真实践。

首先，要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切实增强思想理论武装。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召开四次全会，先后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分别逐一作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整体设计、统筹布局和渐次展开、深度推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性质、担当的使命和党内现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把党建设好、建设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过去三年多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懈努力和深入实践，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党风政风民风正在发生全面深刻、影响深远和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这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深得党心民心。

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在不少方面虽然有了“起势”，但还没有形成“定势”；虽然取得了“优势”，但还没有达到“胜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做出战略部署，以制定《准则》、修订《条例》为切入点，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征程，目的就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标本兼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严字当头成为管党治党的常态。

其次，要充分认识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核心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当前，我党正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大事业，同时还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肩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艰巨使命。处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要凝聚全党、团结人民、战胜挑战、破浪前进，保证我党始终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力量，党中央、全党就必须要有个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历和领导经验，具有成为全党核心的深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和实践基础。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实至名归，反映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全党团结一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领导地位，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自觉地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最后，要充分认识制定《准则》和修订《条例》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执行自觉性和严肃性。

《准则》和《条例》都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刻总结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直面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一个围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明确要求，一个围绕加强党内监督做出具体规定，内在统一、相辅相成，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的根本遵循，是中央着眼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安排。这次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既是党章规定和要求的具体化，也是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形成的一系列规定和举措的系统化。作为一名党员，贯彻执行《准则》和《条例》，就要联系思想和学习工作实际，明确责任担当，切实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坚定理想信念，要坚持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要坚持自警自省自律，要正确行使监督权利，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模范作用。

鄂义太最后强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已经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吹响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号角。全体党员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从自身做起，加强党性修养，做好每一件事情，推动学校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不断迈出新步伐，奋力开创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部长张文香在总结本次培训中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和党员意识，进一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和能力，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校党委组织了“不忘入党初心，做合格党员”主题培训班，852

名学生党员和55名教职工党员接受了这次培训。参加集中学习培训，是每一位学员要求进步的必修课程，也是接受党的教育的极好机会，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更是人生道路迈出的重要一步。校党委高度重视对每名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培训工作，通过发展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充分发挥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她认为，本次专题培训班具有不断创新形式、科学设置课程等方面特点，并对今后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张文香进一步强调，近年来，全党将端正入党动机、锤炼党性修养和加强组织建设，作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和重点工作来看待和推进，开展学习和接受培训今后会不断深入开展，“永远在路上”。然而，师生党员仅靠短期学习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之中，加强学习、不断锤炼，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总结大会期间，“挑战超越自我熔炼团队精神”



主题素质拓展汇报表演通过同心鼓、团队神笔、卓越绳圈三个拓展项目重温了师生学员挑战自我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宗晓哲、管理学院2013级本科生杰苏尔·居来提，分别作为教职工党员代表和学生党员代表，概要介绍了经验分享与交流。

党校专职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江波，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处处长马国伟，党校正处级组织员李岚，校团委副书记马宏参加会议。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民族天籁”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作品音乐会在京成功举办



11月2日晚，“民族天籁”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成功举行。音乐会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科研处承办，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共同演出。党委书记鄂义太，校长黄泰岩，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文喜，党委副书记刀波，党委常委、副校长青觉等校领导同业界专家、知名人士，以及首都观众一同观赏了音乐会。

音乐会上演了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8位教师创作的具有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苗族、哈尼族等多民族风格以及其他风格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建院以来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不断积累沉淀陆续创作出的部分优秀音乐作品。

上半场在由斯仁·那达米德教授创作的民族歌



剧《木雕的传说》经典唱段中拉开帷幕。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以及优秀学生演唱的女声独唱《我终于来到了人间》、男女声二重唱《永不分离》、女声独唱《这里的早晨多美好》、男女声二重唱《痛楚难忍》、女声独唱《啊，长生天》以完美的歌唱技巧和细腻的感情让在场的观众沉

醉其中。于洋副教授创作的扬琴五重奏《云中虹》，

其动人的乐音让观众耳目一新，陶醉不已。接着，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了龙晓匀教授创作的合唱《延边歌舞》、安鲁新教授创作的合唱《破阵子》、一级作曲张朝创作的合唱《春天来了》、刘洋洋副教授创作的合唱《卡丽普赛达思》，对音乐艺术进行了完美呈现。

下半场，斯琴朝克图教授创作的交响序曲《草原节奏》、青年歌唱家齐峰演唱的歌曲《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张纯教授创作的管弦乐组曲《我的法兰西岁月》令观众的心情更加澎湃。最后以张朝创作的一首气势恢弘庞大的钢琴协奏曲《哀牢山狂想》为结尾，整场音乐会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本场音乐会交响乐部分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出演，著名指挥家邵恩担任指挥。特邀外籍著名青年钢琴家黄紫楠担任钢琴协奏曲《哀牢山狂想》的钢琴演奏。

本场音乐会的成功举办让广大观众体验到一场美妙绝伦的视听盛宴。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将以本次作品音乐会为新的起点，激发更大的创作热情，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少数民族音乐精品，开启创作与教学科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篇章，努力在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艺术以及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教育部语信司司长田立新 莅临学校考察指导相关工作



本刊讯 11月23日，受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委托，评审专家组进校对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心（以下简称“少语监测中心”）的续建申请进行考察评议，一致认为少语监测中心一期建设成效显著，符合续建条件和基础，建议相关部委予以批准。11月24日，教育部语信司司长田立新一行莅临学校考察少语监测中心一期的建设情况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中心（以下简称“语保中心”）的工作情况。校长黄泰岩、校党委副书记刀波参加考察活动。

考察汇报会在三号楼一层会议室进行。会上，刀波介绍了少语监测中心和语保中心的总体建设情况，并指出，学校高度重视两个中心的建设，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整合学校优势资源，成立了具有独立编制的研究机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负责具体工作。少语监测中心负责人赵小兵教授和语保中心负责人丁石庆教授分别对两个中心的建设和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赵小兵汇报了少语监测中心自成立以来，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联盟体系建设、咨政服务、科学研究、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取得的成绩，并指出，少语监测中心已在民族语言资源动态监测与研究方面形成独特优势，为贯彻落实国家民族语言政策、推动民族语言舆情与语情监测、制定民族语言信息化规范标准等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和咨政服务。丁石庆介绍了语保中心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程项目开展的工作，并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

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田立新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在学校高度重视与支持下，两个中心

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她指出，少语监测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联盟体系“中心+基地”的机制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家语委的19个研究机构中成绩突出；少语监测中心充分发挥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独特优势，在民族类院校中起到了学术引领和示范作用。田立新强调，语保工程是一项抢救工程，希望语保中心高度重视，调动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完成好这项国家重要的工程任务。她表示，教育部语信司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少语监测中心和语保中心的工作，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



黄泰岩作总结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教育部语信司对两个中心的工作高度重视，为我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不断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研究与保护对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我校的学科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个中心自成立以来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他表示，学校对两个中心的工作高度重视，将以此次评审工作为契机，大力扶持和重点建设好中心的硬件保障设施，并将在机构编制、学科建设、人员经费等方面继续给予倾斜和长效支持。

期间，田立新一行实地考察了少语监测中心的办公研究场地、硬件设施等，并在现场听取了项目演示。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考察活动。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母校聚焦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60周年院庆圆满落幕

10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60周年院庆在中央民族大学大礼堂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刀波，党委常委、副校长石亚洲，党委常委、副校长曲木铁西出席活动。大礼堂里坐满从全国各地而来的院友。大家相聚于此，共庆学院60岁生日。

晚会由1977级院友韩国纲，2011级院友姜军，2012级院友吴莹和2013级本科生王贝贝的主持。晚会前，暖场视频在屏幕上滚动播放，到场嘉宾激动得谈着离别后的故事，回忆曾经在学院生活的往事。曲木铁西、系友代表安维芬女士和院长苍铭先后致辞，在回顾学院过去的同时，祝愿学院未来更加美好，前途一片光明。

整场晚会由十个节目组成，既有精彩的少数民族舞蹈，感动人心的诗朗诵，还有由同学们精心准备、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欢乐的那达慕》拉开了晚会的帷幕，雄浑壮丽的蒙古族舞姿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民大情，中国梦》的朗诵将学院的历史和大师融入其中，让大家在欣赏朗诵的同时也了解了学院的辉煌历史。伴随着舞蹈《老照片》中同学们的翩翩舞姿，荧幕中出现了学院各个毕业班的老照片，勾起了各级系友对大学时光的温暖回忆。随后由学院的系友带来了三个精彩节目——歌曲《天边》、朗诵《我们是您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歌曲《神鹿啊神鹿》，尽管系友们离开学院多年，但精心准备的节目都展现出了他们对学院深深的热爱。由学院1978级系友和2016年在校生同台演出歌舞《楼兰姑娘》，热烈的歌舞表演将全场气氛带向了高潮。舞蹈《阿瓦山上的星星》，其曼妙的舞姿带给了观众美的享受。舞台剧《好久不见》以毕业了10年的同学们与母校的故事为主线，表达了对学院、对恩师的爱。最后伴随着《相亲相爱》的歌声，2016级的同学们表演了灯光秀，代表着1956级到2016级班级的班牌进行了走秀。

60年院庆，既是历史文化学院对60年来成绩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展望。在过去的60年里，学院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物，为边疆地区输出了大量建设人才。60年院庆，加强了学院凝聚力，提高了学院的影响力，更增强学院前进的动力。相信历史文化学院能够在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绽放新的光芒。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 30年校友聚会

2016年10月22日，以“团结、友谊、传承”为主题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30年校友聚会在北京市海淀区维也纳酒店三楼燕兰楼餐厅举行。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庚以泰老师、何川书记、张泽涛院长、熊文钊老师、周其洪老师、金锡华老师、李荣老师以及百余名校友出席本次聚会，并就论坛议题交流意见。本次聚会别开生面的将晚宴与论坛相结合，其中论坛分为四个环节。第一节法律人的寄望与奋进；第二节律师职业的现状和未来；第三节体制内外法律职业畅谈；第四节企业精英如是说。

首先，在包丽娟校友、周瀚校友的主持下，聚会联谊组织者石宇辰校友向大家致欢迎辞。庚以泰老师、何川书记、张泽涛院长分别向校友们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的传统、优势、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教师代表熊文钊老师讲到了民大法律系的情感，校友代表王新表达了民大法律系学生在法治航程中的奋进与成果。

随后，以“法律人的寄望与奋进”为主题的论坛第一节，在石宇辰校友主持下，由熊文钊老师、周其洪老师、金锡华老师、李荣老师向各位校友分享了法律人的信念、乐趣、付出以及法律人的独立判断、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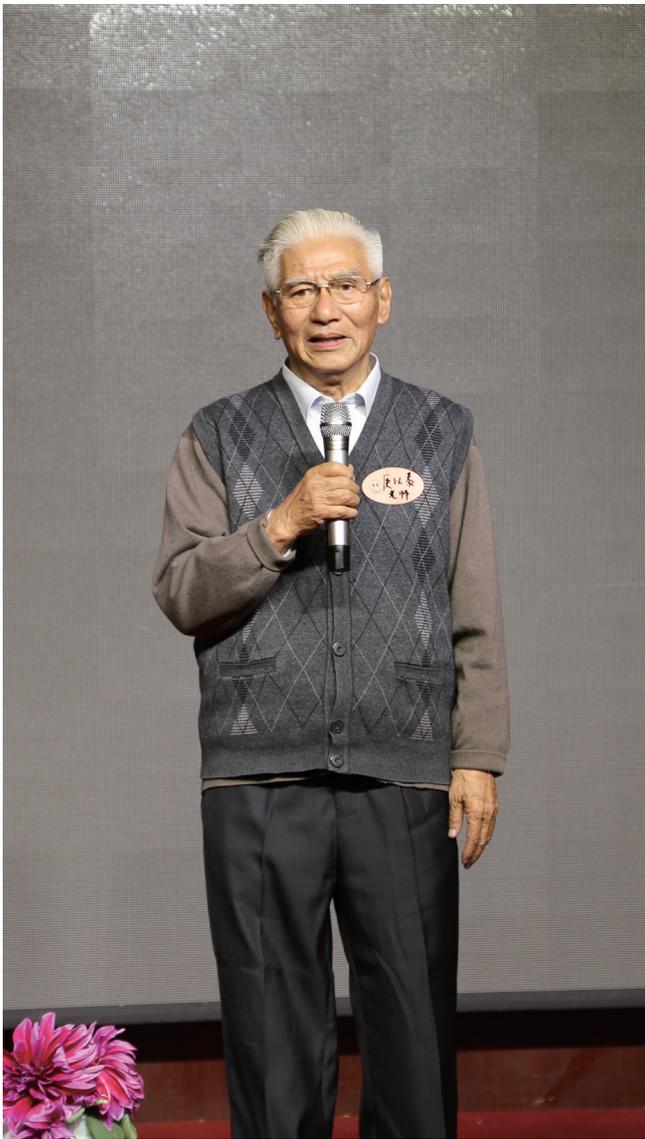
担当。

之后，以“律师职业的现状和未来”为主题的论坛第二节，在陈永学校友主持下，由李荣老师、张剑弼校友、高文龙校友、海涌校友、关乃文校友、梁冰心校友，向各位校友分享了了律师的专业性、与时俱进、自由职业的不自由、律师的担当、律师执业的意义等等。

之后，以“体制内外法律职业畅谈”为主题的论坛第三节，在侯爱文校友的主持下，由赵县委校友、石宇辰校友、李元校友、常亮校友、王新校友、张立明校友，向各位校友介绍了体制内外的职业性、执业理想的追求、坚持。

最后，以“企业精英如是说”为主题的论坛第四节，在王雨雯校友的主持下，由孔杰校友、程光校友、戴豪校友、孙琦程校友、何壮校友、迟得双校友，向师弟师妹们介绍了今后择业的考量、具备的技能等等。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30年校友聚会落下帷幕。

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



校友活动

第二届“MUN-MEDIA 中央民大媒体沙龙”举办

本刊讯 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创业联合会成立之际，2016年度第二届“中央民大媒体沙龙”于12月6日在北京东三环富力城举办。

在京的媒体圈校友30余人参加了此次聚会，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校友联络，凝聚校友力量，实现媒体资源共享，增强民大校友的社会传播影响力。本次活动邀请了在京的媒体圈民大校友、三一科技公司董事长王林峰交流分享了创业故事。王林峰图文并茂地向校友们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故事和品牌梦想。他还介绍了三一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科技产品TOMA自行车，以及2017丝绸之路骑行活动的策划。其创业经历引发了在坐校友的共鸣，很多正在创业和准备创业的校友纷纷提问，内容涉及互联网、金融、健康等产业，并对如何实现创新成果与产业、市场、经济更好融合展开了讨论，通过交流，聚力创新、激励创业，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举行了MUN-MEDIA晚宴，与会校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展开交流，将沙龙气氛推向高潮。

中央民大85届汉语系新闻专业校友、“民大媒体沙龙”策划人、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主席张波介绍，“民大媒体沙龙”由民大媒体圈策划和组织，专门为媒体界的民大校友建立的传媒交流平台。“美美与共、知行合一”，民大媒体人将会秉承其内涵精髓，并发扬光大。

彭烁



校友活动

- 86 经济校友、三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林峰做创业分享 ①
- MUN-MEDIA 晚宴 ②
- 媒体圈校友和嘉宾互动 ③
- 校友参与时尚 TOMA 自行车运动体验 ④

寻根

我往有道的喇嘛面前，
求他指我一条明路。
只因不能回心转意，
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三百余年前创作的缠绵悱恻的情歌，穿越时空、超越民族、跨越国界，至今已译成20余种文字传遍全球，不仅在西藏文学史享誉盛名，亦在世界诗坛声名显赫。

2015年12月16日，“先生还在身边——中央民族大学名师纪念展”校园吸睛开幕。摩肩接踵的人潮中，一些民大学子甫一得知，平常烂熟于心的仓央嘉措诗作，最初是由眼前这位被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于道泉先生首先翻译介绍给世界。1930年，他编译的藏文、汉译、英译对照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正式出版面世，这本世界上第一部采用藏文以外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专著，受到当时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

设计藏语拉丁化拼音方案、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设计藏文数码代字……作为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于道泉先生的睿智思考和深邃眼光，还体现于创建藏学专业和培养藏语人才方面。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赴北大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感情真挚、态度诚恳，促使他暗下归国决心。1949年4月，于道泉先生回国后便迫不及待与时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羨林先生见面磋商，最终商定开设藏语专业和任命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并立即开始招生。由此，藏学这一专业在中国高等学府正式立足。

建国之初，为尽快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社会需求，季羨林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方法突击学习藏语。1951年6月，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云集首都组成藏语学习班。彼时，23岁的王尧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来到首都，与大家共同拜在于道泉先生门下，开始藏语学习、投身藏学研究。

大师陨落

“先生还在身边——中央民族大学名师纪念展”举办地民族博物馆，开展日随即成为校园焦点。各族师生纷至沓来，感受大师的文人风骨和精神风范。展览翌日，噩耗传来，于道泉先生弟子、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于17日18时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追忆大师情怀鼎沸校园之时，民大再度痛失“瑰宝”，微信朋友圈被悼念文章刷屏。

23日，王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虽然距离仪式开始尚有1个小时，但人们已排起长队默默等待着最后送别。“学界翘楚博古通今统摄汉藏享誉海内外，藏学宗师谨严治学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的挽联映入眼帘，灵堂两侧摆放着李克强、张高丽、温家宝、杨晶、王正伟、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等敬献的花圈与花篮，无声传达着先生在藏学领域的贡献与声望；台湾佛光山及星云大师也派代表送别王尧先生……

2013年10月10日，笔者曾跟随《光明日报》记者和现已退休的校报摄影师汤其燕叩门进入王尧先生家中采访，有幸一面之缘，每每想起往事，仍然身临其境。当年5月，王尧先生刚刚“送走”陪伴60年的夫人，些许凌乱的屋中满是悲伤味道。

“你做了一辈子西藏工作，我却一次都没有去过。”王尧先生主动提及，夫人漫不经心的只言片语，让他铭记于心。1999年，机会终于来临。中国台湾和北京大学几位学者计划去西藏自治区调研，便力邀王尧先生作为“向导”陪同。西藏之行终于变为现实，但是，“她没有福分，高原反应太强烈。”走马观花般游览了拉萨、日喀则、山南几地，王尧先生和老伴儿还没怎么体验当地风土人情便返回成都，困扰夫人多日的头疼同时一去不复返。他说自己很后悔，没给她做个体检就直接入藏，实在有些冒险。

谈起老伴儿，王尧先生仿佛总是言语间若有所思、停停顿顿。不愿再去触碰先生这份心底悲伤，记者主动将话头调转。谈及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王尧先生便开始滔滔不绝、行云流水。“尽管6月11日才开学，我





那时5月份便从南京赶到北京。”他说，其实刚开始对西藏和藏学一窍不通，胸中也茫然无绪，不存在感不感兴趣的说法，只是积极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国家号召便勇往直前。

1952年，王尧与周遭同学一起离开首都前往藏区，开启了新的学习征程。贡嘎寺是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嘎活佛是他们的老师，曾经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的贡嘎活佛，聪慧伶俐、博学多才，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先生说自己久难忘怀。一次，他和同学们前往玉龙树村参加一场婚礼。第一次接触藏族礼俗，热烈的场面、热闹的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刚入门不久的王尧听不明白，只能依靠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一二。“我心爱的姑娘啊，你像一只木头碗那该多好。”婚礼上的歌词让他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把姑娘比喻成月亮、鸟儿、花朵这些美好的事物，却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逐渐了解，原来藏族人民具有自己带碗的生活习惯，而且木碗会在藏袍里贴身揣着。“你想，每天贴皮靠肉般在一起，将姑娘比作木头碗是多么奇妙的构思！”

在感叹自己“无知”的同时，王尧对藏族和藏文的感情日渐升温，亦感慨于这个民族具有很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经历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王尧决定先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发掘代表性文化，这也构成他早期研究的主要内容。

60年代开始，王尧先生开始探索古代藏文发展脉络，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吐蕃时期的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三大藏文文献研究。他的藏学研究生涯始于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研习，在藏语分期和方言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译释、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轨迹、藏传佛教和藏汉佛学比勘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先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西藏文史考信集》、《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藏学零墨》等论著。王尧先生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结集于《王尧藏学研究文集》，2012年6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毕生心血描绘了一甲子的绚烂生命画卷。

王尧先生的开拓性学术贡献，让众多学者铭记于心。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对于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将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和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起到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学院沈卫荣教授认为：“王尧先生真正将西方关于藏学的学术成果引进国内，掀起藏学热，并在国际藏学和中国藏学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

1981年8月，王尧先生首次应邀赴维也纳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提交了《藏语 mig(目)古读考》

和《宋少帝赵显遗事》两篇论文，当他离开英语讲稿用藏语向在座学者致意三分钟时，令全场愕然而震撼。那次藏学会议，他结交了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意大利毕达克、旅美华人学者李方桂和张琨等很多国外藏学家，亦留下很多难忘回忆。1982年夏天，王尧先生应邀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席第三届国际藏学会，系统介绍了我国藏戏发展现状。1982年秋天，他应聘赴维也纳大学藏学一佛学系开展教学工作……之后，他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

王尧先生当时还特别提及，欣喜于国内同行近年出国参加藏学研讨的队伍日益扩大，“这足以证明我国藏学研究的进展已是举世公认。”

寻根问祖

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著家史小说《根》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书，一时供不应求、洛阳纸贵。这本书由一明一暗两条主线组成。明线是作者经过十二年考证非洲寻根，追溯自己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从非洲西海岸被掳到北美当奴隶的悲惨命运；暗线则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惊雷乍起语境下，作者努力探求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仍然处于受压制、受排挤不平等地位的原因与根源。

寻根问祖，似乎古今中外的人们一直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虔诚追逐。王尧先生也不例外，于道泉先生和贡嘎活佛，是他的“根”。

“你知道吗？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集，最早就是我的老师于道泉先生翻译传播给世界。他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是中国藏学的‘开山鼻祖’。”谈及先师，王尧先生当时话语间满满敬佩与自豪。这份浓烈而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见诸纸端。

2001年，王尧先生编著的《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集纳了季羨林先生、于若木先生和王尧先生自己对于于道泉先生的追忆文章，而且回顾了于道泉先生毕生主要学术贡献，亦通过年谱简编、纪念文章和书札选刊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先师的伟大人生。同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亦刊载了王尧先生撰写的《报国书生一片心——平凡而又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文，赞叹老先生一生的为人处事和刚正不阿。

“感谢于道泉先生，当时他以最大的耐心教导我们学习藏语。”于道泉先生不仅将从海外带回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交给王尧学习，引起他对海外藏文文献研究的兴趣。同时，他还在于道泉先生的指导与帮助下，成为中国藏学界首开研究敦煌藏文卷子的学者之一，并获得丰硕成果。

离京赴藏，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是贡嘎寺学习期间的主要任务。“贡嘎活佛是我们在藏

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正是在他的教授下，我开始了探索藏文古典作品的第一步。”王尧先生当时回忆，1954年9月，他有幸作为助手随贡嘎活佛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又协助藏学界一些大学者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五部法律文件。他说，这次经历颇为珍贵，“那些大学者的风范和学识让我终身受益。”

除了于道泉先生和贡嘎活佛的教诲，还有一位西藏活佛学者对王尧先生具有重要影响。东噶·洛桑赤列是西藏东部林芝扎西曲林寺（东噶寺）第八世活佛，曾在西藏若干大寺庙和上密院学习，获得西藏最高佛学学位“格西拉让巴”，先后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及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出版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大辞典》和《西藏目录学》等著作，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开设“藏文研究班”，东噶·洛桑赤列应邀主持讲席。其间，“我承乏一些教学助理工作，朝朝暮暮与他共事前后十余年，后又一道出国参加会议。”王尧先生评价，东噶·洛桑赤列“是西藏最为通达的大师级权威”，“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

沈卫荣、陈庆英、谢继胜、熊文彬、陈楠、储俊杰……这一串响亮的名字，是当今中外藏学研究舞台上—支引人注目力量的。王尧先生接受采访期间亦对他们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因为，他们都师承王尧先生。王尧先生，就是“沈卫荣们”的“根”。

其实，王尧先生并不是沈卫荣的直接导师，但他却一直对外宣称是王门弟子。“王尧先生引我登堂入室。”沈卫荣赴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博士主要研究藏学，也是由王尧先生推荐，“那些珍贵的藏学史料，也只有王尧先生家中才能见到。”

1984年9月，王尧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一门古藏文课程，许多外校学生听闻纷至沓来。虽然授课时间仅仅10个月，却改变了一些前来蹭课学生的学术人生。他们开始背离原来专业，改为研究藏学。虽然王尧先生一生没有带过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但是这些学生却一直以王门弟子自称和引以为荣，并慢慢成长为藏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王尧先生在学术上的请教和交流也从未间断。以藏学研究为中心，王门中人相互支撑、相互补给的师生情谊一直延续30余年。

对于王尧先生而言，于道泉先生和贡嘎活佛就是他的“根”；对于“沈卫荣们”而言，王尧先生就是他们的“根”。一代代民大学人，就如此这般站在先师的肩膀上，仰望星空；即便先师逝去，他们也在“根”的滋养与鞭策中，奋勇直前。

不蔓不枝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时不我待，不容半分驻足观望。

时代赋予中央民族大学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任务和前进目标，只争朝夕间，民大学人和各族学子的“根”究竟在哪里？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就在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他奠定了清华“校格”，通过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学术和教育的进步。获赞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因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四大哲人”。

被誉为总统摇篮的耶鲁大学，曾经诞生过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迄今也拥有6位总统和3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都拥有20位以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牛津大学不甘落后，25位英国首相和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熠熠生辉；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字为56……

中外历史无一例外都昭示着，大师，才是每所高等学校生生不息、方兴未艾的“根”。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创建和学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在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推进过程中，倾尽一生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以精深学问、开阔视野、严谨态度、高尚品格，开创了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培养模式，传承着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传统。

翦伯赞、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闻宥、于道泉、杨成志、冯家昇、陈振铎、翁独健、林耀华、费孝通、傅懋勳、陈述、马学良、王锺翰、傅乐焕、陈永龄、宋蜀华、李森……这些，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创校功臣和兴教业师。他们，才是民大积淀的厚重，历尽沧桑；他们，才是民大发展的动力，滔滔不竭；他们，才是民大坚固的根基，稳如磐石；他们，才是民大前行的明灯，不蔓不枝……

吴文藻先生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于道泉先生最先将世界海拔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的名字由藏语译成汉语介绍给世界、陈振铎先生引领中国民族音乐登上西方大雅之堂……“名师纪念展”中，师生观众依然络绎不绝。大师们治学、做人、行事的风范，令人敬仰、引人向上。

大师的胸襟与品格，不仅让师生为之动容、陷入沉思，亦惠及和鞭策着民大的建设与发展。永久性举办名师纪念展、为各位大师塑像和出版“大师学术文集”、“大师纪念文集”两套丛书……在大师期盼目光注视下，在大师精神风范感召下，在大师学术思想滋润下，中央民族大学为尝试解决“钱学森之问”，寻找特色答案。

民大正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朝着建成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目标迈进，但，绝不是独行。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刘佳

才华自横溢 人生多蹇磨

——纪念闻宥先生忌辰三十周年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中国民族学、语言学、金石学、铜鼓学、考古学家闻宥教授谢世迄今，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一切恍如昨日。

—

闻宥（1901—1985），又名闻在宥，号野鹤。出生于江苏松江府（原娄县）泗井镇一个书香寒门，父亲是清末秀才。1915年后，离家到松江府中学就读，后又赴沪上大学。由于酷爱文学，不断发表诗作、小说，后因结识“南社”社长柳亚子而加入“南社”，成为社中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之一。

自1921年始，便主编过一些杂志，如小说专刊《礼拜花》（1921年，先生时年二十岁）、《中国画报》（1925年）以及有中、外文版的《中国文化研究会刊》等。1926年始至1955年初，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

先生辗转国内各地，受聘于上海几所私立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山东青岛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四川成都华西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任职。在此期间，他又挤出时间深入我西南边疆地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及历史民俗的田野调查研究；也曾游学于东南亚一些邻国，如越南、泰国等；此后，先生发表多篇语言学论文，诸如《论民族语言系属》、《羌语比较文法》、《评托玛斯南语——汉藏边区一种古语》等，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发之灼见，一时间闻宥之名便蜚声中外。

先生精通法语、英语、日语，后又自修拉丁文、越南语，练就了坚实的外文功底。他常与外国知名的汉学家通信往来，如与法国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亨利·马伯乐（1883—1944）互通书信，进行学术切磋。1953年，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研究成果开举世之先河，曾在学术界掀起铜鼓研究的热潮。

先生拥有多个鲜为人知的荣誉头衔，如：法国远东博物院通讯院士、西德意志东方学会会员、土耳其国际东方研究学会会员等。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先生曾婉拒了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聘请。

1955年，因全国性院校调整，闻宥先生从四川大学应调至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之中央民族大学），直到1985年辞世，整整三十个年头。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毕业留校，在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教时，有一天接到院教务处的通知，要我于教课之余兼任闻先生的助教、协助辅导学生的工作，约一个学期；80年代初，又应院科研处之聘，让我有幸在教学之余兼作闻先生的助手，我便每周抽出两个下午的时间帮助收集、整理闻先生的旧日文稿，直到先生逝世前夕，前后约有三、四年之久。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使我亲身体验到先生的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坦诚，即使身处逆境时，仍勤勉治学，认真执教。现仅撷取几件难忘的往事，匆匆命笔，以志对先生逝世近三十周年的纪念。

二

1、“左”与“右”

最早认识闻先生，是从1955年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开始的。那时，校园里的学术空气还比较浓，常常请校内或校外的专家学者开专门讲座，如朱德熙、罗继光、王钟翰等，在众多的专家教授中有一位面容清癯、身材不高、操着浓重家乡口音的长者，他便是闻宥先生。记得一次旁听他的有关文字学的专题讲座，先生从甲骨象形字说起，一直讲到篆、隶、楷书，引用了《说文解字》类的早期字典及经文例句，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先生用的例字是“左”和“右”这两个象形字。先从字的本义开始，再讲它的引申之义，指出“左”与“右”从人之手到表示相向相对的位置，再推广到地理位置，进而到可表达与古代礼仪、，，如“江左”（长江下游以东，今江苏省一带）“江右”（长江下游以西，今江西省地位待遇有关的深意一带），“左迁”（降职被贬谪）、“右擢”（被提拔升官）、“右族”（指豪门大户）、“左昭右穆”（宗庙牌位的列序）有史有论，风趣生动。

但时隔不久，就在闻先生的“左”、“右”辨言犹响耳际之时，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无情地袭来，闻先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反复动员感召下，在民主党派（先生是民盟成员）召开的为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不知发了些什么“谬论”——对此闻先生从来隐忍不谈，于是，他便被无情地卷进了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之中，在“左”与“右”平衡两极中被“左”派推向了“右”的一极，被扣上了大“右派”的黑帽子。一位才华横溢，正值天命之年的专家教授，就这样被推押着走上了长达十数年之久、蹉磨坎坷之路。每念及此，我本不相信天命的脑瓜，居然为闻先生当年不该选择“左”“右”而遗恨，例字信手即有，何必非要选这两个与政治沾边儿的字眼啊，莫非真的在劫难逃吗？！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雪之后寒霜继之。距“反右”还不到十年，神州大地上又起狂飙。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是“右派”的闻先生又一次面临厄运。那时，我院和社会上一样骚乱，黑白颠倒、是非莫辨。和闻先生同在研究部工作的费孝通这位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因在大鸣大放为党整风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而获罪）、我国研究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著名老专家吴文藻（费孝通的老师、著名女作家冰心女士是他的夫人）等蜚声中外的老专家被狂热的“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一个个点名揪了出来，扣以“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名，抄家、折磨、侮辱、批斗，受尽人格和肉体的摧残。因为闻先生在运动一开始便被“造反派”“红卫兵”们认定

是个“老右派”，打入“死老虎”之列，只勒令他随叫随到、老老实实接受批斗和改造，恩免了对他的过重体罚。但是，人伤其群，先生眼见老同事老朋友受尽肉体糟践、精神凌辱时，他心中的煎熬可想而知。在人前，他只能佝偻着身躯、目不旁视地低着头走路，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先辈们故去了，但历史人生舞台上“左”与“右”的大悲剧，却不时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屏幕上闪现！

2、“真”与“博”

闻宥先生1955年调入我院，先是作为专家安排在院直属研究部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便下到基层，在语文系汉语文教研室（该教研室即现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化传媒学院的雏形）当教员了。1960年我毕业留校，和闻先生成了同事关系，但因闻先生很少开课，平时也沉默寡语，所以很少有接触机会。大概是1962年春季开始的那个学期，政治系哲学班要开古代哲学文选课程而缺少讲课老师，便向我系借人，闻先生才被安排上课程；然而，因为先生家乡口音太浓，怕少数民族学生听不太清楚，便由教务处出面让我在教学之余，兼任闻先生的助教，为时一个学期。具体任务是：先生讲课后，我协助课下辅导。记得最深的是，先生接到任务后，极为认真，亲自选编教材，更是耐心讲授。闻先生对庄子（庄周）似是有情有独钟，课堂上从来不看讲稿，但讲解起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听课变成一种享受，使我仿佛又见到了十年前先生在文字学专题讲座时意气风发的情景。课下，当我情不自禁地向闻老道出我的这种感觉时，闻先生那不易展现笑容的脸上隐隐闪过一道光亮，不无诙谐地说：“站在讲台上，我是一无所有的，只剩下庄夫子的‘物’‘我’两忘了。”我意识到，站在神圣讲台上的闻先生是一个充分自由的人，“右派分子”的紧箍仿佛瞬间被摘除，那长期禁锢的精神被庄子那恣肆汪洋的文风所诱发，也瞬间得以释放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我院科研处准备内部刊印《闻宥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了。闻先生非常高兴，需要一个助手，便向科研处提出要我帮助他整理旧日的文稿。出版《论文集》是学界的期望，也是闻先生多年的心愿。正如闻先生在《论文集》“后记”所说：“这些年来，朋友们看到我快离开人间了，希望我自己编集，留一个小小的纪念。他们的好意我很感谢……”。可先生早期发表的文稿，几十年间经受多次搬迁和动乱，留在先生手头的微乎其微，需要翻检三、四十年代的刊物资料，从那忆海钩沉里去寻找。

在整理校阅文稿的过程中，我发现先生对年代久远的文字，并非拿来就用，而是以严格的眼光进行汰选审定。除改定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外，绝不追逐潮





流对观点内容随意变动，仍然让它保留原文的历史面貌。是非功过过去由后人评说！

闻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一丝不苟，耿直如此，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严于律己，不为虚饰所惑。就在1985年9月21日，闻先生辞世前六天，在我院周报（亦称院刊）上登载了一篇五、六百字的署名文章，介绍闻先生一生的教学经历，其中有这样的叙述：“在上海上大学，随后到法国求学”“留学法国时，闻先生还曾在法国几所大学任教”（见1985年9月21日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三版）。此时，闻先生虽已重病在床，可头脑仍十分清醒，当知道自己一息尚存之际，便有人对他作如此虚妄谬赞时，气愤至极地说：

“我要声明：本人从未去过法国、西欧等地！从未去留过洋、镀过金……请不要给我贴金……请不要给我贴金！”

闻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深恶浮夸，务实求真，令人尊重的长者。

皇天不负苦心人。《闻宥论文集》第一辑，终于在1985年7月由我院科研处内部印刷成书。文集未收入先生早期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只限先生早年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历史学、金石学、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如《黑鹿释名》、《“雍无梁林”解》、《论所谓“南语”》、《贵州雷山新出苗文残石初考》、《殷墟文字孳乳研究》……共十一篇。按原计划，闻先生还有《保罗译语》、《川滇黔彝文之比较》、《红崖碑杂考》、《古铜鼓考》等诸多论文，准备整理成第二、第三辑问世，其中许多都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就在《论文集》第一辑油墨未干，先生枕边寄赠友人的集子尚有余册之际，先生便因心力衰竭、药石不济，于9月27日夜半零时溘然长逝了。

我抚摸着这小开本的、深桔色封皮的、薄薄一本内部出版的《闻宥论文集》，不禁感慨唏嘘：它注定将永远地只影单了。当然，它对于闻先生以及了解闻先生的人们，无疑仍是弥足珍贵的心灵慰藉和纪念。

3、“憾”与“忆”

闻宥先生前半生的教学和学术经历，以及一系列的职务、职称、荣誉称号，标志着他人生旅途中一个个闪光的足印，即使在他后期中段坎坷多蹇磨的漫漫长途上，他也始终执着而孤寂地进行学术探索，哪怕是为时极少的在讲台上为学员授业、解惑。可谓是一生殚精竭虑于教育科研园地。尽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作为一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学者，只要一息尚存，就仍在编织着美丽的梦，以期在梦中实现真实的自我。

就在闻先生仙逝的前半年，他还很有信心地计划着自己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一是继《论文集》印出后，再开始第二辑、第三辑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要尽快地由他组织人员编写一部大型的《古汉语虚词

词典》；三是为全院学生作一次有关汉代壁画的学术讲座；四是将他已物色到的一位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聂鸿音招收为自己的博士生。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无情的病魔所吞噬，先生就这样带着深深的遗憾、念念不忘他未竟的、为之追逐一生的学术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和眷恋的人间。

回忆使我心潮激荡难平，抬头仰望书架上方摆放的闻先生亲笔题赠的两幅墨宝，先生挥毫我展纸的情景，便又跃然出现在眼前。一幅题写于1983年夏天，全诗如下：

偶然薄炙破愁霖，未破当前一片阴。
迢递烽烟天外直，凄凉禾黍望中深。
覆巢已绝重栖想，枯海还馀待涸心。
今夜天涯无梦到，白头掩泪为沉吟。

诗后有字曰：“一九四零年初，余初至成都，秋雨新霁，景色凄怆。时日寇正猖獗，家书久绝，中夜不寐，彷徨有作。秋白同志索书 一九八三年夏 闻宥录旧作。”下方盖先生之铃印。

当时先生一边放下笔，一边说：“这是1940年我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生死存亡关头，自西南联大颠沛至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国土破碎、家书断绝、夜不成寐时的旧作。你那时才三、四岁吧？送给你做个历史的纪念吧！”我连连称谢不迭。就在闻先生于落款处署上自己的名讳时，我终于脱口问出早已想问的话：“闻先生！您的又名‘闻在宥’，是不是典出《庄子·在宥》篇啊？”闻老慢慢放下笔来，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便操着浓重的乡音琅琅地诵道“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宥之也者，……”之后，先生便慢慢地摇着头笑着说：“庄周老夫子要在宥天下，岂不大乱！还是治天下好，治天下好！”从这一面小小的生活镜头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先生的豁达和亦庄亦谐的性格。

时隔不久，就在那年秋天的某日，先生怕是已经预感身体不适，在整理文稿之余，突然对我说：“我老了，诗思迟钝了，也提不动大笔了，再留一首小诗写给你作个纪念吧！”我简直是受宠若惊，马上就忙着张罗铺纸、递笔、磨墨，我看到先生的手显然已有些发颤，但依旧运笔有致、收放自如、一气呵成。诗文如下：

来时还是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

诗后落字曰：秋白同志 雅正。一九八三年秋 闻宥。左旁铃先生之印章。

八十多岁的老人，病痛在身，能构思并书写出如此潇洒、飘逸灵动的诗句，真让我感慨无限。试想，

这一“来”一“去”，岂非一“生”一“死”？这“天”与“水”之喻，岂非人类赖以生存的茫茫宇宙空间和古往今来绵绵无休的历史长河？如此可知，闻老是把对生命的敬畏、对故乡热土的眷恋、对一生的得失感悟以及对仍有未经事业追求之遗憾，统统都借此倾泻出来。这首未经雕琢、纯如璞玉，又简洁如话般的七言绝句，实不愧为大手笔之作！闻先生的风骨、精神，尽蕴其中矣！

我反复吟颂，一时百味杂陈，继而又豁然有所悟，顿有孔子的临水之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又有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时发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深深感触！

三

闻先生的忌辰是 1985 年 9 月 27 日，迄今已历二十九个春秋。我想，认识或了解这位中国著名学者的人，在全国和我校也许仅有 70 岁以上的老人了吧！当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在此列。近期，我偶尔翻阅署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先生所著《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惊喜地发现其中几处提到闻先生的名讳与功业海钩沉绩。如：“1930 年—1940 年代，在此地区进行考查的有……以及语言学者闻宥”（171 页）、“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 年，他到（四川）汶川、理县一带作调查……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172 页）。

言简意赅，却对闻先生最早在“羌语”研究上的贡献作了定位。

不久，喜讯又翩翩传来：有同事寄来从“四川文艺网”的网页上下载的文章《闻宥——被遗忘的学术大家》（作者雷文景）和“新浪博客”上的《天下何人更知君——从〈闻宥遗札〉看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作者袁津琥）。这两篇宏文，引据充实的资料，论证了闻先生的重大学术贡献与无愧于“学术大师”的胸襟、风貌，读之令人动容。从友人处得知，有关闻先生与专家学者论学术的信札手迹分上、下卷，署名为《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不久前已由海峡彼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于 2010 年 1 月便出版了《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此外，被闻先生生前看好、计划招为博士生的青年教师聂鸿音，也早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从事西夏文等研究，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研究员了。这当是诸多喜讯中的又一喜讯了。

总之，闻先生生前所追寻的“梦”，正一一陈现于世，闻先生学术硕果之一部分亦得以璧存矣！信如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所说“然筚路蓝缕之功，在公论者，终不没于天下”！

闻先生！您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早已有了学界的定位与肯定；您的未竟的学术事业毕竟会有后学者继续拓展不懈；您生前亲手整理刊印的那本《闻宥论文集》第一辑也不用担心会孤寂无伴、形单影只了！九天有知，您当释怀而朗笑了吧！

韩秋白



现代民族自治地方 公共管理的创构者

——李俊清

名
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社会体制、基层组织与经济制度经历了重大结构性变化；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和战略博弈局面，中国对外的政治谈判、经济合作与文化交往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迁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民族关系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许多方面都出现新现象和新问题。在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凸显的同时，民族问题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其结果是吸引了大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加入。在众多民族问题研究专家中，有一位特色鲜明的学者，他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俊清教授。

在中国国内尤以民族学和人类学见长的民族问题研究专家中，李俊清教授是独树一帜的。这不仅因为他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在创建现代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的推动下，现代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巨大跨越，为提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对于这样一位公共管理学界的知名学者，一般人

都会以为他一定是自幼就对公共管理或政治学十分感兴趣，并且很早就投入到该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中。然而，李俊清教授进入公共管理领域不但是很偶然的机缘，而且为时已经算晚了。他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山西大学历史学，毕业后留在山西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这一时期“从时间跨度看，先秦、魏晋、唐、宋、明、清乃至民初；从内容看，举凡制度、人物、文献均有涉及”。任教十余年后，他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博士，毕业后来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任职，并在这之后开始关注民族问题研究。对于一个在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学者而言，上述经历未免有一些传奇。国家民委网站更是用“学术生涯经历过几次大的跳跃与变化的学者”对他进行介绍。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李俊清教授认为这种跳跃与变化并没有特殊性，反而强调跨学科专业背景是做好民族问题研究的基石，恰恰是中国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研究素材。回顾李俊清教授的学术生涯，在过去十余年内，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 20 余项，出版专著 20 余本。





诚然，单凭数量来看，这些成果放在今天不能说难以企及，但在系统梳理出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脉络后，就不难理解李俊清教授良好的学术声誉形成的必然性。

一、对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制度考订研究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认为政治与行政概念来自西方，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是一个“舶来品”。但是，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优秀的文明古国之一，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和《存目》中3229卷的所谓正史，基本上都是政治史，其他专门记述制度流变的“十通”，以及各类会要、实录、谱牒、行状，乃至野史笔记，都与政治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连西方的政治学家都承认：西方政治与行政制度更多时候来自中国的启发。我们只是在近代现代全球化过程发现自己在科技、文化、制度的落后，也顺利成章的认为政治与行政制度起源于西方。作为一位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学者，李俊清教授从步入学界开始，就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他将20余年来写成的三十余篇论文结集出版一本《政治与行政：史论集》，尽管他谦称这些文章“唯一的收货就是能对讲授的有整体性把握，对引导学生涉猎不同的研究领域亦有裨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知识均成为他后续研究重要的积累和铺垫，“日后自会连成一体”。李俊清教授在研究中国政治与行政体系中发现，文官制度始终占据了核心位置。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20世纪初叶中国引进和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过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大量具体史事考订辨析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该书出版后，远销美国、日本和港台地区。受到法学界和行政学界的密切关注，香港《大公报》、《中华读书报》、《中国行政管理》等报刊杂志先后刊载书评。三次入选《重庆晚报》的《热书排行榜》，并一度排名第一。入选“人天书店”《热书推荐榜》、“西南最大的网上书店——时代网”销售排行榜第十六位及《阅读网》“2008年中好书榜——今年以来最佳好书”。

二、对中国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的系统性研究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既有一般地方政府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组织如何才能成为相对落后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推动力量，成为引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舵手，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但

令人遗憾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研究依然以民族学和社会学为主流，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行政管理问题一直鲜有人涉猎，在少数已有研究中，也更多局限于传统的一般的行政组织理论和政府过程理论来讨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和政府过程的优化。实际上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生态环境特殊性的存在，一般的理论和方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应用，却经常会带来适应性困难，甚至使本来与社会生态环境关系就存在一些矛盾的公共组织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因此，要分析和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中遇到的特殊问题，需要突破传统理论局限藩篱，积极寻找新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为此，李俊清教授分七个方面，系统地对中国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展开系统性研究，并逐步建立起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

（一）民族与国家

民族与国家建构相辅相成，理解和把握民族问题必须从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出发寻找答案。为此，他首先从民族与国家谈起，尝试对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冲突的根源进行解释。他认为民族现象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建构新型国家——现代国家的进程中，由于现代国家的理论设计与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现实问题之间存在脱节而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对传统社会一系列价值和共同体的扬弃进程缓慢交叠而出现的问题。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与行政改革

在意识到中国处于民族问题多发期的客观现实以及民族自治地区公共管理的重要性后，李俊清教授开始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的创构建立理论准备。这一时期他主编了中国民族地区公共管理论丛，先后出版《传承与创新——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变革与繁荣——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的问题与挑战》、《重构与超越——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并主编民族关系与公共政策译丛，翻译出版了《分离、同化或融合：少数民族政策比较》、《亚太地区的政府政策和民族关系》、《族裔特性、社会流动与公共政策：美英比较》、《自治与民族：多民族国家竞争性诉求的协调》，深入总结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并对国内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学科发展、研究重点、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前景进行了系统梳理。



（三）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市场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和现代管理模式，涉及方方面面，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种主体的关系，并且灵活运用多种机制。为此，李俊清教授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落后的现状，深入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并不存在普适原则，而是要依据显示情况而决定。民族自治地方因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存在与“完全市场假设”的差距，决定了政府“市场替代”行为的双面性，但他认为这并非常态，从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长久治安的角度，应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调到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政府辅助并服务市场的正常状态。

（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社会

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除了市场力量以外，还需要多元力量的推进。近年来，各种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扶贫等多个领域发挥着弥补政府和市场缺位的积极作用，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其独特的功能尤为明显。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尚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普遍存在着规模小、资源不足、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弱点，他认为对此，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仅靠目前民政管理中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三种分类来认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到它们的传统型和特殊性，这是规范和发挥组织功能的前提。

（五）城市民族工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加大，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成为新趋势，全国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近3000万，多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成潮流，一些民族矛盾冲突在非民族地区频发，城市民族工作压力凸显。李俊清教授指出，改革城市民族工作的机制，改进城市民族工作方法，以适应民族工作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具体而言，东部城市需要通过不断优化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着力解决其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人口流入和流出地政府要建立合作机制，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在不断改进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促进族群间的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

（六）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治理

民族地区往往地处边疆，近年来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活动猖獗，且呈现出不断蔓延扩张之势，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习主席也提出了“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战略思想。为确

保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应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建构科学有效的应急体系，推进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上述民族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必须将跨界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特殊区域进行规划调整，尝试构建基于边域的区域主义的多元治理模式，尤其要规范和引导宗教活动。

（七）西藏和新疆的发展与稳定

边疆最具代表性的是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的发展和稳定事关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的大局。近年来，围绕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李俊清教授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央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他撰写的关于西藏、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多篇内部报告，获得了中央领导批示。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后，他发表了《新一轮援疆：授人以渔，还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好政府职能，处理好优先排序》等系列文章，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西藏“3·14事件”发生后，他陆续发表了《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看西藏人权的改善》等文章，驳斥“藏独”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的相关言论。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他接受人民网的专访，提出“应适时调整政策，在确保各种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实施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新疆长治久安上来。

砥砺漫漫，必将春华秋实。上述议题和观点是李俊清教授多年理论创新成果的结晶，共同构成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成果已经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编入《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教材之中，距离他创构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学科的理想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然而，构建科学的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核心概念的准确界定，理论框架的科学构建，有效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变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趋势等，仍需要不断的总结与探索，在这一方向上，他没有停止脚步。

“从事教书，是我的福气”

——记“北京市师德榜样”、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宗丽教授



名师



她，长期工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深受学生爱戴，被学生誉为慈母般的好老师。她是中共北京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今年9月份荣获“2016北京市师德榜样”荣誉称号；曾获得多项校级、市级教学奖项，是中央民族大学“十佳”教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高校优秀德育先进工作者，多次被学校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她说，“从事教书，是我的福气。”带着这份“福气”，她在高校的讲台上一呆就是31年。她就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杨宗丽教授。

一、爱岗敬业，业务精湛

杨老师热爱党的民族教育事业，三十多年来孜孜以求，成长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业务精湛的教授。同学印象中的杨老师：知识丰富，幽默风趣，讲课深入浅出，且教学生做人和爱国。在很多同学印象中，思想政治课是枯燥的，但走进杨老师的课堂，就被她的讲解吸引住了。

有的学生说：“那些上课带闲书的人后来也不带

了，在大教室上课，居然出现了学生占座位的情况。”她课堂上的旁听生还有硕士生、博士生、外校的学生和同行老师。有学生在评师网上写道：“听杨老师的课受益匪浅，从没有听过这样有趣、生动的政治课……在当今缺少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会被感染，我们不再逃课。听了她的课，才知道原来政治课是可以这样上的，把听课变成了享受。100多人的课堂上，大家专注地听讲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老师，就应该她那样的，尤其是政治课老师，别板着一副马列主义的面孔。其实，讲得好，大学生也挺喜欢听马列课。”

某晚，杨老师给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学生上课，突然停电了，她只好宣布下课，但学生却找来蜡烛，要求继续上课。在摇曳的烛光中，同学们专心致志地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在杨老师的课堂上，常常能听到学生情不自禁的掌声。在教学评估中，学生给予了她很高的评价，评估分数都是90分以上，多次名列学院第一。学生说：“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如沐春风，如看一部好的小说和电影，能真正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和思想的深度。”



二、积极创新，勇于实践

在教学中，杨老师注意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随时吸收、补充科研新成果，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启发式教学。

为了增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感性认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杨老师利用公休时间带学生参观圆明园、卢沟桥等。她的课多次成为观摩课，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国家民委教育司司长、北京市党建评估专家等都曾到学校随堂听过杨老师的课，并且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时任国家教委社科司司长的杨瑞森听了杨老师的课后这样评价：“把思政课讲得这样受欢迎，实属不易。从听课中可以感受到杨老师在讲台下花了大工夫，能够抓住疑难问题进行研究。”

熟悉杨老师的人都知道，她的成功来自孜孜不倦的努力，她常到国家图书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处查阅资料，为了查证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她要请教不少专家和学者。在课堂上看似信手拈来的资料和独到的见解，实则下了很多工夫。

三、关爱学生，教书育人

杨老师不仅在课堂讲好课，课下也关注学生生活和思想上的需求，与学生分享生命成熟中的点滴收获。她给教过的所有学生留下她的手机和家里电话号码，告诉学生们：“有困难了，心理难受了，无人诉说了，就找我吧！24小时开机。”有学生说，看见杨老师，就想起自己的妈妈。

当然，杨老师对学生的爱还体现在她的严格要求上，有学生撰文：“杨老师待人和蔼，又不失严肃，学校规章，课堂纪律，有言在先，违者重罚，说到做到，故听者动容，无君敢以身试‘法’。她创造了一个良好学习氛围和整体性的肃然环境。”也有毕业多年的学生，再次回到民大，还会走进她的课堂，再“聆听老师的教导”。法学院1998届毕业生匡俊英，自主创业，上了慈善家排行榜，且受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的接见，他应邀回校做讲座，学校让他只邀请一位老师做嘉宾，他邀请了当年教他“中国革命史”思政课的杨老师。在讲座中他说：“一生难忘杨老师当年的教诲，她说过：温暖是会循环的，温暖是会传承的，谋求发展的同时，力争做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回报社会……每每想起母校，就会想起杨老师，而想起杨老师，也就会想起母校。”

四、以科研促教学，注重队伍建设

杨老师一直坚持教学和科研并重，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获奖，多部专著出版。担任教研室主任十几年，她注重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杨老师所带的教学团队在市级讲课比赛中多

次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实践教学成果奖等奖项。由她负责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建设成为校级精品课。

五、癌症术后，重返讲台，完成工作，保质保量

2013年4月，杨老师被查出患淋巴瘤，在住院的头一天晚上，她依然在给研究生上课，下课后才告知学生自己的病情，听闻后学生们哭了……手术出院后，调整好心态的她又积极地投入到本科、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中。现在依然能看到她脖子上还有不宜手术的肿块，但她仍以积极的心态与癌共存，以积极乐观



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工作，对工作质量、数量不降，对学生的关爱不降。近3年（2013—2015学年）年均工作量528学时。

六、服务社会，传播正能量

作为思政课教师，杨老师不仅是在学校的课堂上，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用听者能听进去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她被国资委、文化部、国家博物馆、北京肿瘤医院、中国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医科大学等邀请做过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党史、职业道德等的讲座，听者感慨说：杨老师的讲座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期间，她的为人、乐观的精神感染了周围的人，出院后，曾是患者的她被请回医院做有关“医德”的讲座，她从白求恩事迹切入的这场讲座，感动了听讲的医生，医院党委书记说：“这是难得的一场几乎无人刷屏的讲座。”

怎样看待自己的职业，她在文章中写到：“学生并非教师讲台前的匆匆过客，而应是教师精神生命的延续。能从事教书这样一种职业，真是我的福气。‘教师’，是我无悔的选择。”

宣传部 王卫平

拳拳之心七年梦想终成真

——1985级新闻专业校友向母校捐赠“日晷”雕塑



民大之子

2009年秋天，我们在北京举办了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全班30多位同学在毕业后第一次聚集在北京。大家参观母校校园，拜访当年住过的宿舍，和校长座谈，在大礼堂合影，还去集体攀登了金山岭长城，并在滦平县的一个宾馆里举行了大学毕业20周年联欢会。

聚会结束后，同学们又回到了天南海北各地。

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班是否可以给母校捐赠一座雕像呢？永远把我们对母校的感情化为一个象征，留在母校熟悉的校园里。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位同学，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于是，2009年底，我就正式向全班同学发出了倡议，捐款为母校捐赠一尊雕塑。

母校的校园里，从来还没有过任何一尊由同学们捐赠的雕塑。

我记得大约是1986年吧，当时我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学校里有学长们发起了捐款行动，说是要树立一尊“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雕像。我还捐了款。可是不知何故，这件事不了了之。

就在大家开始捐款的同时，我开始琢磨如何捐赠雕塑的具体方案。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捐赠我们的第一任院长乌兰夫同

志，他不仅是我们的院长，还当过国家副主席。可是，想法刚出来，就有同学反对。他对我说：“你太天真了！国家领导的塑像能随便立吗？学校无权决定，还得上报中央呢！”

于是，我又琢磨，那就改成吴文藻和冰心先生的双人雕塑吧。吴文藻先生是学校的终身教授，人类学开山鼻祖。冰心先生和我们也很亲近，我在大学参与的学生杂志《同心园》的封面刊名就是冰心先生亲笔题写的。我还想，如果吴文藻先生夫妇雕像矗立在校园，得有多少学子去仰慕观看呀！

大约是在2010年秋天的一天，我还宴请了冰心先生的女儿吴青夫妇。曹克佳、钟奇志和巫小兵陪同。吴青教授很支持我们的想法，还专门在家里和我们聊天，让我翻拍了不少吴文藻先生夫妇的照片。说实话，我那时候压根没有想过这尊铜像要雕塑好有多不容易，成本得多高呀！

还没有等我着手去寻找合适的雕塑设计师，学校的反馈就来了。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学校不同意我们的方案。

我不得不重新想点子，后来我干脆提出不再塑立人物的雕塑，我们干脆捐赠一个简单的日晷得了。为此，我开始关注到汉白玉，还专门跑到房山的大石窝镇看了好几家雕刻厂，初步谈好了汉白玉日晷的制作。

当时，在学校里帮我们协调的是校友办公室的邬老师。我还见了两次马文喜副校长，感觉马校长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想法。后来，据说是学校开了两次校长办公会，因为当时校领导意见的不统一，我们的捐赠计划被迫搁浅了。

要说不沮丧，那肯定是假话。一腔热血被浇了一盆冰水的感觉。

后来，同学们也陆续知道结果。有气愤填膺的，也有说改成捐给系里做奖学金的，也有说干脆退还给大家的。

我后来琢磨一下，心里还是不愿意彻底放弃。同时，每人捐赠的这点钱，退回去其实对大家也没有啥意义。一万多块钱，也做不了啥奖学金。

于是我把愿望深藏在心底，捐款呢，也保存好，原封不动，等待时机。

这期间，也有同学误解我，据说有人批评我私吞同学的捐款。我听后，也不置评说。人在做，天在看，我



问心无愧。

时间，就这样在沉默中静静地流淌。

一转眼，就到了2015年。随着学校领导班子的变化，我又开始联络学校的有关部门，洽谈捐赠雕塑的可行性。刚开始不太顺利，一直没有等到积极的反馈。一个偶然的机，一位校领导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很赞同，并且立即帮我联系上了新上任的学校校友会办公室主任王红曼老师。

王红曼老师非常热心的推动，让事情逐步向乐观的方向发展。

刚开始，我提出的建议是做孔子像。正好雕刻厂正在为一家单位制作孔子雕像，3.5米高。我想做一个小一点的，2.5米就行了。我打了报告，附上了孔子的雕像图片。王红曼老师根据我的报告，又写了一份正式报告提交到校领导。一周后，我得到消息，校领导认为孔子像太多，和民大关系不大。

于是我赶紧修改方案，换成乌兰夫校长的汉白玉像。我还立即搜集了一些乌兰夫的代表性照片，并把它们发给了雕刻厂，厂里回复我说可以按照图片做。于是重新修改申请，王老师也重新递交报告。

然后就是焦急的等待。

大约是两周后，王老师突然联系我，高兴的说校领导开会研究了，首先是认可这个事。同时，几位校领导在讨论中提出了几点意见。大概反馈是，乌兰夫的雕像适合民大，这个雕像要立在学校最明显的大礼堂对面位置，这个雕像应该是铜像，雕塑水平必须要好。还有校领导提出，这样的铜像造价至少在60万元以上。

王老师安慰我说，校领导说了，雕像必须要高标准才行，我们的班的捐款太少，学校可以另外找捐赠方，看看是否可以把我们班也算在捐赠方里面。

我理解校领导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的捐款数量其实很少，根本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理想状态。如果把我们的捐款名义算到乌兰夫雕像上，真正捐款60万也不一定同意。

思考了几天后，我和王老师提出新的建议。我们班不再捐赠任何人物的雕像，我们也不去加入到别人的捐赠里，这和我们的初衷不一样了。我们的方案改成造价比较低的汉白玉日晷。日晷相比人像，要求就宽松很多了，

造价也低得多。

王老师很同情和支持我们，于是，她再次把我们捐赠日晷的想法和几位校领导做了沟通。

一周后，我们得到了喜讯。

书记、校长都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唯一的要求是，我们的捐赠日晷具体方案要得到殷会利副校长的审批。

我定的日晷，是综合了好几种日晷的部分。雕刻厂说他们可以按图片来做。可是，这家雕刻厂虽然规模不算小，但是一家典型的房山大石窝镇的乡镇企业，加工能力很强，但是并没有设计能力。厂里接的活儿，一般都是带着设计图来的。日晷属于比较简单的活儿，他们没有设计图，也能雕出来。

可是，认真负责的殷副校长是美术专业出身，要求很高，他告诉王老师，光看报告里罗列的照片不行，必须要看正规的设计图！否则无法通过。

我和厂里商量半天，他们的确拿不出来设计图。他们的强项在于本地产的汉白玉石料，以及加工的经验，雕刻工人不少，但是的确没有专门的设计师。如果去请专业设计机构出方案，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没办法，我只好联系一个美术系毕业的，自己搞建筑装饰设计的哥们王忠。远在四川成都的王忠，听说我的困难，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忙，一天后，日晷的专业设计效果图已经发到了我的邮箱！

这样，日晷的设计方案总算得到通过。

接下来，我和雕刻厂的宋红英开始协调日晷的制作。

刚开始，计划是日晷用一级汉白玉，基座用二级汉白玉，总高度是2.5米。后来，为了确保质量，还是改成日晷和基座都用一级汉白玉。当然，成本就增加了一些。好在已经联系多年，厂里也给了很大的优惠。为了控制成本不至于太高，我就把日晷的高度减小，调整到总高度为2米。

基座正面雕刻篆体字：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背面是：

1985级新闻专业全体同学捐赠母校 二零一六年六月

2016年6月14日上午，我驾车带着王红曼老师前往房山大石窝镇，到厂里实地查看进展。日晷和基座都已经雕刻完毕，等待亚光细磨。

2米高，3吨重，看来我们的汉白玉日晷还是很大气的。

日晷上还有一些瑕疵，宋红英说，这样大的石料，完全躲开瑕疵不大可能。这样的品相就算是很不错啦。旁边有一个河神雕像，是二级汉白玉，深色条纹就多得，衣袍上还问题不大，可是河神的面孔就有点惨不忍睹，全是花的，鼻头都黑了一圈。一级汉白玉就不会这样。

当然，一些细节还需要打磨的更精致。

比较大的问题出现了，汉白玉的基座上雕刻的孔子





语录，因为有框，按比例做的，看起来有点小。关键是白底使得字体很不明显。王老师现场看了一下，觉得涂金色底不一定好看。她说：“涂灰色可以不？”

经过认真讨论，王老师要求我设法出一个带颜色的刻字效果图，以便交给校领导最后审批安装。

我只好又联系王忠，把情况解释了一下。让他帮忙出一个全部带金色底色字体的，再出一个日晷不加底色，基座刻字加金色的效果图。我还把厂里目前用的金色涂料的标号图片发给他。

我之前一直不敢把有关进展告诉同学们，因为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万一有变化不好给大家交代。另外，有部分同学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给学校捐赠雕塑。有部分同学知道第一次捐赠被学校否决后很气愤，说热脸贴冷屁股，千万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了！

直到这时，我也就是告诉了曹克佳和杨满两个参与了捐款的同学。

等到雕塑安放在校园里的那天，我再正式通知全体同学吧。

2016年7月5日大清早，我开车到大石窝镇。日晷静静地躺在雕刻厂的院子里，我赶过去仔细查看基座上描金的字体，吓了一跳！这些字体明显描金不认真，有的地方有金色，有的地方是白色的，这不是糊弄人吗？！

我一进雕刻厂办公室，就告诉宋红英描金的问题。小宋说，不是的，是因为白粉的问题。

我们一起到院子里，小宋端了一盆水，拿起刷子一刷，之间字体里凹处的白粉被洗掉了，原来的描金露了出来。原来是厂里的粉尘太多，都跑到字体的凹处积累起来，就把描金都盖住了。

原本想带上宋红英和她老公小刘的，结果他们都因为有事走不了。最后，小宋派厂里开吊车的老赵跟我去城里学校看场地。

一路上，我和赵师傅聊起来。看似年龄和我差不多的赵师傅，竟然都当姥爷了。他的女儿今年24岁，刚生了一个胖小子。“我们农村人结婚早，我女儿没上高中，学了个会计中专，结婚生孩子了，女婿在城里做手机生意，也不让我女儿上班，就在家看孩子。”

据赵师傅介绍，这个厂是大石窝镇当年唯一的雕刻厂，八十年代被宋红英的爸爸承包了。小宋的爸爸是镇上的大企业家，信佛，经常跑寺庙。好多寺庙的汉白玉都是他送的。“大老板信佛，讲信用，对人温和。不像别的厂子，都是私人开的，老板和家里人都经常呵斥工人，管得严呢！”

“你们挑的汉白玉还不错！要说我见过的好汉白玉，还得数修建毛主席纪念馆那时候的汉白玉好，一点瑕疵都少见！如今的汉白玉就差了，一级汉白玉都有水线。明年听说就不让开矿了，破坏环境。过去早年间开采汉白玉都是人工，一年也开不了多少。如今都是机械化，开采的太厉害。现在的汉白玉矿埋得深了，以后就不好

采了！政府也不让采矿了。”

我们进校园的时候，王红曼老师还在开会。我和赵师傅到现场先看。按照王红曼老师的建议，安放日晷的地方换到了大礼堂的东边一块空地上。如果按原来计划安放在国际学院前面的草坪上，必定会有很多人围观日晷而把草坪践踏，王老师因此特意说服了马文喜副校长和黄校长同意更换地方。

赵师傅走步子初步测量一下说，安放点距离道路大约有20多米远。“至少得要25-30吨的吊车才行！”

半小时后，王老师赶来。我们一起再次查勘。最后，考虑到安放点地基不牢靠，建议工厂提前几天来先做一个安放雕塑的水泥地基。因为货车和吊车只能在晚上11-12点以后才能进城，事先勘察好是必要的。吊车只能从学校的东门进来。王老师说，本周日就放假了，干脆就把做地基和安放工作都安排在学校放假以后吧。

王老师说“这个日晷就是字不太好，一是小，二是字体太怪，我问了五个人都看不出来啥意思。”我解释说：“这是引用的孔子语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用的就是篆体呀。我相信很多人最终都会了解到的。”

中午，我带找师傅去了一家驴肉火烧店，请他吃完饭后，送他去三环坐车到六里桥，那里有长途车回房山。

晚上，我发短信给宋红英，告诉他们要准备提前整理水泥地基的事。小宋说他们厂里没有专门做水泥地基的人，他们只作石材。如果非要单独做水泥地基，他们也的去请专业的工人来做。“你们又换了安装地点，又要做水泥地基，我们还得请30吨的吊车，这费用咋办？”我一想，算了，都到这最后的地步了，我不想讨价还价让大家不愉快。于是我说：“做水泥地基的工人费用，材料费用我来负担！”

小宋后来回答说：“那好！我们厂里出车！做地基的2000元你来负责。”

约好周日施工后，我和王红曼老师有短信交换了意见，王老师把学校的保安队王队长，园林部刘主任的电话都发给了我。

2016年7月10日星期天，早晨8点左右，我就接到短信，工人们已经进校园了。

我赶紧给校园管理部主任刘江发了短信，然后赶往校园。

我赶到学校大礼堂东侧时，看见了几个工人正在马路上站着。一见到我，赵师傅就喊起来。三位泥瓦工和他一起早上6点就从房山过来。旁边一位小伙子就是学校园林队派来协作的。

我们赶紧碰头，何师傅说需要用电，于是赶紧联系电工。还不错，大约10分钟后一位电工师傅来了，知道我们只是“临电”，电锯切石块，只用15分钟就完事。于是他带我去舞蹈学院接电，结果因为放假的缘故，舞蹈学院的办公室紧闭着。没办法，我们又找到了学校大礼堂的值班师傅，从大礼堂舞台上的洗手间位置接通了电。多亏了园林处的小伙子借来一条电线，否则长度够



不着。

青石板覆盖的地方过去曾经是一处花坛，还当过水池。我们在圆形的青石板区域测量出中心点，并根据日晷的基座大小用墨线标出一个矩形来，电锯在轰鸣声中切割下去，大约3厘米厚的青石板被切割出来。师傅们撬开青石板，刨掉下面的杂土后发现，就在地面的大约15厘米下，居然是厚厚的水泥地基！

在确认了原有水泥地基的牢固性后，工人师傅决定填进带来的红砖，再浇上水泥，在地面找平。这时候，阳光照射下，地面温度已经高达30度以上。我站在旁边监工都是一身汗。于是我去了学校的一个校园地下超市，买了6瓶矿泉水给大家。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位小伙子居然一口就喝完了！

后来校园管理部的刘江主任也来现场，他的一只脚上缠着白色纱布，原来是前些时候摔倒后导致骨折。刘主任说，现在的学校后勤也不好干。据说北航的校园里修好了一处很大的水池，可是却一直干着。他问北航的后勤部门，人家回答说，这个水池曾经有水，可是掉下去过一个小孩子。从此，为了避免风险，北航的这个大水池就一直干着。

干活的时候，几块砖头都断裂了。领头的何师傅决定把所有的砖头都取出来，直接灌水泥进去。“水泥这玩意儿，比砖头可结实！”

接近中午时分，水泥地基已经打好。工人们把地面收拾干净。这时候，王红曼老师骑车来了，还专门给师傅们带来几瓶矿泉水。

不给学校带来处理垃圾的困难，我们把施工的垃圾装进袋里运到车里，烈日下我们送走了4位朴实的房山农民。按照约定，我把2000元钱交给了领头的何师傅。我和王老师约好，争取周四晚上完成日晷的最后安装。

查阅天气预报，发现周三是大晴天，周四就有雨。于是和王红曼老师，雕刻厂商议，把最后的安装放在周三的晚上。

2016年7月13日，周三的晚上。我问清楚了货车和吊车的车牌后，分别短信通报给王老师和学校的保安队长。宋红英发短信说车辆晚上11点半就到学校，而不是原定的晚上12点。

于是我赶在晚上11点半就到了学校，因为放假，校园里已经很安静，偶尔有几个匆匆而过的学生的身影。文华楼的自习室里还有一些勤奋的同学没有回宿舍。校园里的长椅几乎没有任何人。

我等到快12点，还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发短信给小宋，她回短信把何师傅的手机发给我。我马上电话询问，得知他们运载日晷的车已经到了紫竹桥附近，但是约好的吊车开错了方向，正在掉头赶回来。

因为得知校园管理处的刘江主任亲自在东门等候他们。我就在学校的大草坪里散步，坐了一会，天气并不算凉快，可关键是蚊子不少，根本不敢久坐。抬头看见的是松树的枝丫和远处的影影绰绰的白云。四周一片寂

静，只有夏虫的呢喃。

过了一会，突然看见了远处的汽车灯光，大货车和吊车开进来了。我一看表，晚上12点半，也就是14日的凌晨。

货车在前，吊车在后。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呢，货车司机和吊车司机居然言语不和顶撞起来。我赶紧上去把货车司机劝开，大家干好自己的活儿最重要！

因为现场道路狭窄，无法固定70吨的大吊车。只好由12吨的吊车先把3吨重的日晷吊下来，然后再把一辆叉车也吊下来。再由叉车把日晷运到安装地。

前几天留下的定位线有些模糊，于是何师傅和徒弟又重新弹了墨线，划出清晰的十字定位。日晷的基座也标好了位置线。叉车先把日晷基座放下在两根木棍上，然后把叉车板升高，再吊起基座，最终安放那个在水泥基座上。

日晷也是如此这般的放在了汉白玉基座上，中间塞了一些塑料泡沫。一是好找平，二是将来再搬动的话比较方便。

安放好后，何师傅又带着工人们用水简单清洗了一下弄脏的部位。现场没有任何灯光，全靠叉车的车灯，以及手机的灯光来干活。刘江主任说，天亮后再找清洁工来清理一下现场，顺便把旁边的一个垃圾桶也挪一个位置，不影响风景。

全部弄利落，已经是凌晨2点了。大家挥手告别，没有了灯光，日晷已经被黑夜所吞噬。

7年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

我走在寂静的校园里，已经没有轻松与喜悦的能力，昏沉沉的疲劳已经控制了我，只是双腿机械顽强的在奔向回家的路。

王红曼老师也去看了，她转达给我几点：一是一定会 有人不喜欢日晷。二是一定会 有人觉得雕塑的质量不够完美。三是一定 有人 认为大家不知道啥是日晷，也看不懂基座上雕刻的篆体字，会有意见。

我和王老师说，作为民大第一件由班级校友捐款而来的雕塑，肯定是不完美的。有了不完美的第一个，就会有更多的，更完美的来。

7月18日，马学军带儿子去美国旅游回国到达北京。下午，我、曹克佳，郭晓红一起迎接马仔来到校园。郭晓红正式调到北京甘肃省驻京办任职了。

这是日晷第一次与捐款的同学们见面。大家都拍了不少留影，都为这尊雕塑感到自豪。

当我看到同学们脸上的骄傲和自豪的笑意，我就很满足了。

晚上，我们在西校门外的中协宾馆餐厅，为马仔接风，大家高兴聚会，喝完了一瓶红葡萄酒。

这个小小梦想，终于在7年后实现了。

巴舞欣



秦海：创业维艰， 一路靠自省

创业百态，我们听过、读过很多成功光鲜的创业案例，但真实的数据是，90%的创业者其实并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创业的真相是，即便拿到上亿美元融资的公司，依然会每天面临各种困境。然而，大时代创小业，每一步前车之鉴都是财富。

85后创业者，秦海。200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金融学专业，先后在苏宁电器、尚品网、海唐公关等从事品牌策划、PR、新闻传播工作，一度赢得360、新浪微博、乐视超级电视等服务客户的良好口碑。

他称自己一直在帮别人的品牌“吆喝”，但是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他决定操刀自己的产品，开始做茶叶生意。2014年底推出第一款产品“每时”手筑茯砖黑茶，秦海绕道互联网营销，成功让产品成为首款仅通过社群探索即实现百万级销售业绩的单品，现粉丝规模达10万人。2015年还登陆CCTV2创业节目获得百万意向投资，创业案例曾被新浪科技、《创业家》黑马营、《重庆商报》等多次报道。

不仅如此，秦海曾在创业一年多时间里，靠着3-5人的团队，一款单品，几乎零成本推广，让“每时茶”实现营收近300万元，成交顾客过万。相比很多年收入达到百万、千万，融资上亿的创业大将来说，秦海只能算个小兵。

不过，“茶”作为一种农产品，与新锐科技为核心的创业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而秦海自己也承认：“人人都成为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是每个创业者都如王思聪、陈欧一样拥有财力雄厚的家世，更不是人人都可以去做大事、玩转资本游戏。

的确，现在创业，白手起家依然占据多数，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创小业者”。

从PR总监到“卖茶哥”，转型穷三年

2013年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也是秦海向自己所任职的公关公司提交辞呈后的第一天。毕业后一直做PR、新闻传播工作的秦海，用圈内的标准看，算是“混得不错”，但他觉得是时候自己做点事情了。

在众多他经手的颇为成功的公关策划、营销案例中，秦海一直是团队信赖的“创意领袖”，但在自己创业的路上，秦海却规规矩矩地选择了“茶叶”这种普普通通的农产品作为创业项目，着实令人意想不到。

秦海说，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一是觉得自己拥有茶的便利资源，他生在贵州，同时又是湖南女婿，两省

都是产茶大省，可以说环境好、产品好，而推广家乡的农产品一直是他自己的情结所在。二是茶本身是一个大市场，对普通创业者来讲，在市场大小、进销存的便利程度上都会优于生鲜、家禽等农产品。同时，秦海也相信，中国农业、中国制造经过30多年的粗放发展，一定会迎来注重品质、兼顾生态安全和科学发展的大时代。

于是，自己出资10万元加上向朋友借来的5万元作为本金，秦海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干起了从安化黑茶源头进茶叶卖货的生意。

以前从来没做过销售，而是靠笔杆子和创意吃饭的他，果然将商场想得太简单，以为卖货就是上网开个淘宝店、微信上叫卖一下，事实上创业没那么简单！在最初的半年内，他的茶叶每月销售收入平均刚过万元线，除去房租，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真的应了那句“转型穷三年”。面对那些要么是柱子、要么是砖块、要么是竹篓的黑茶，秦海一下子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混沌持续了半年后，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想法太多，欲望太多，绝对是大忌。”秦海对《中外管理》吐露心声。他决定从做好一件事情开始！

经过和有经验的老茶农聊天以及向圈子里的前辈咨询，秦海选择了一款在市面上接受度较高，也比较有特点的“安化黑茶茯砖茶”作为“试金石”。经过5个月筹备后，一款以“每时”品牌命名的茯砖茶全新面世。

“幸运的是，这次我总算蒙对了。”秦海笑着说，由于这个单品在包装和理念上的新颖设计，以及良好选品，产品在第一个月就迎来27万的销售业绩。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秦海和团队，仅凭这一款产品就累计卖出了超过百万的销售额，成为茶行业唯一一个敢只做一个产品还仅靠微信社群累计销售达100多万元的“单品王”。

那时候，秦海也慢慢摸出了一些创业的门道，创业大军里，贪快求全、一上来就想做几十亿的产品、数百亿的平台，这是很多人创业之初都会有的梦想。但一件事情都做不好，做其他同样也不会成功。而且，普通创业者根本没有人力、财力、物力去做更多的产品。从先做好一款产品开始，“创小业”依然有大机遇。

创业是个坑，需一步步填充

抱着做好每时茶的心态，作为一个销售门外汉，秦海一直也在琢磨更适合的营销路子。

雕爷牛腩、黄太吉、马佳佳、西少爷们炒火了“互



联网思维”，让很多初始创业者言必谈互联网思维和粉丝经济。与之不同的是，秦海的方式却看上去“有点传统”——用一年多的时间，他通过微博、微信，利用“交朋友”的方式，邀请100个人成为这款产品的开发顾问，为产品的定位、设计、包装、营销、销售出谋划策。实现了在每时首款产品手筑茯砖茶上市时已累计有700人次的用户购买和试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用户无数次的互动，找到了这款茶在顾客享用过程中的关注点并进行针对性的解决，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忠实客户。

在后来的每个环节，秦海在每一款产品推出时都邀请这些用户朋友或潜在用户全程参与，每一个活动都以吸引或瞄准一个人群为主。通过线上发布会和分享传播，后来又通过茶园众筹、让客户认购茶园的方式做反向需求定制。

一步步摸索出来的业绩，让秦海和团队迎来了痛苦之后的小高潮。总结自己的营销经验，他对《中外管理》说：“其实商业不分线上线下，也不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无论是互联网思维还是线下用户体验，商业的本质没有变，只不过是概念在变。而茶是天生具备分享属性的产品，微博、微信恰好具有分享好茶最便利的土壤。但如果需要打造更大的市场格局，则需要更加全面的市场和战略支撑。”

于是，和很多创业者一样，每时茶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也成为秦海接下来不可避免的问题。“当我想像别的行业一样，靠一个好的想法，去投资人那里拿到一笔钱时，投资人基本都会说：‘你做的事情，我非常敬佩。但是这个行业太难了，你们也吸引不来牛人，也不需要牛人，一点点慢慢做吧’。”秦海苦笑说，这真是一个鲜活的“十动然拒”（网络词汇，即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之）的案例。

就在无奈之际，秦海遇到了兼有投资人和演员双重身份的田朴珺，对他说：“在你的身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信赖感，我要投其实是投你这个人。70岁的褚时健可以种出褚橙，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也可以做出茶叶里的‘褚橙’。”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田朴珺的百万投资意向并未变成现实。

再到后来，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网看到秦海的创业故事也表示很大兴趣，并留言“1390xxxx，给我打个电话”。可是，当秦海怀着激动的心情拨通了电话，回答了对方关于“做到了多少业绩、有没有什么好模式”的问题后，薛蛮子的回应是：“这点量还是太小了，再摸索一下。”

“的确，我没有强大的团队，没有资金实力，也缺乏‘忽悠’能力和突出的商业模式，去吸引到很牛的合伙人。”经历过几次类似的“碰壁”，秦海自己也进行了反思、考察，面对这个数千亿甚至万亿的茶叶及茶饮市场，似乎谁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破局办法，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创业者，迈出第一步后，强大的经营能力、打造团队的能力、提炼商业模式、找钱找资源的能力必不可

或缺。

用他的话说：“所走的每一步，都恰如一个坑，需要我一点点去填。创业，天生只属于勇敢、坚韧的人，它公平地锤炼着每一个有梦想的人。跟你曾经地位多高、收入多高，没有半毛钱关系。”

创业“虐心”，核心在于自省

创立每时茶到现在，如果概括创业最大的特点，秦海说会用“虐心”这个词。创业的真相是，即便拿到一亿美元融资的公司，也不一定能挣钱，依然会面临每天被投资公司追要数据的情况，每个生意都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美好。

在他看来，创业过程也似一次孤独的马拉松。这一过程中，有没有外力的推动，有没有人帮助，都不能直达问题的核心。

“核心在于，你是不是能够想明白，创业的目标在哪里，当下该怎样做。给不出来答案，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帮助你。”因此，秦海希望用自己两年多的经历也告诫更多即将走上创业道路的人。

1. 不要轻易选择创业，这不是人干的事。除非你不把自己当人看。

2. 永远不要高估对自己的判断，永远不要对自己的预估过分自信。

3. 千万别得意，你所洋洋得意的自己，未必是你真实的自己。无论你曾经多么风光，无论你能砸多少钱，成与不成都得经受市场的残酷检验。

4. 不管有钱没钱，在创业之外，要具备自己的生存能力。不要因为创业而降低基本的生活水准和家庭开支。

5. 在没有弄明白市场之前，不要盲目扩张，不必投大量资金来测试一个不靠谱的市场。更多的市场验证需要的是对运营和执行力的验证。

6. 一定要想清楚：你是要一种有品质的生活，还是要变得有钱，抑或是要做成一件有价值的事。如果仅追求个人的品质生活，我们在职场上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实现衣食无忧，财务自由，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放到创业成功这个小概率事件上来。

创业维艰，但秦海坚持要说的是“创业虐我千百遍，我待创业如初恋”！他理解的真正创业是一种理性创业的方式，不是追随双创口号去创业，也不是为了追求资本去创业，而是实实在在地用当下这些年轻人的智慧或团队的智慧去做事，利用中国消费品的品质升级产业机会去做事。而追求精细化，追求品质，真正尊重用户的需求，这是值得坚守的。

作为每时茶的创始人，秦海现在领悟到“茶叶”这个行当的确属于“慢”市场，每一个品牌和每一款茶叶的味道，都需要一个受众接受的过程，而实实在在做产品，考验的是耐力。同时，茶行业同样也需要资本的关注，但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一步步慢跑。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难忘的民院往事

自 1956 至 2010 年，我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加上之前 6 年的学生生活，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工作了整整 51 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是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于 1959 年建立文艺系，次年改名为艺术系。艺术系设音乐、舞蹈、美术三个教研室。三个专业第一年共招收学生近一百人。当时舞蹈专业的招生方法是学校老师直接深入到全国各民族地区，在当地的小学六年级至初中二年级学生中进行海选。经过几轮现场测试，从云南、贵州、西藏、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六省区共挑选出十五名男生和十五名女生，组成了艺术系的首届舞蹈专修班。我有幸由舞蹈教研室主任李才秀老师亲自选拔，成为其中一员。在六年的学习生涯中，我们接受了系统的专业教育。舞蹈方面的课程有“古典舞”、“芭蕾”、“少数民族民间舞”、“外国代表性舞蹈”以及“毯子功”和“排练演出”，音乐方面的课程有“基本乐理”、“试唱练耳”和“钢琴”，文化共同课按国家有关规定开设。老师们耐心的教导和在生活方面所给予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这群原本对舞蹈艺术一窍不通的少数民族少年少女得以健康成长并逐步成熟起来，于一九六五年毕业，成为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建系后培养的第一批少数民族舞蹈艺术表演人才和教学人才。中央民族学院舞蹈专业创建初期有许多事值得回忆，作为当年学生中的一员，有几件事使我终身难忘。

人生中的第一次观摩

“观摩”是一门不在课程表里的“课程”。1959 年进校后，教研室给我们三十名学生安排了許多课外活动，其中特别令我们开心的是老师经常组织我们去天桥剧场观摩国外著名的芭蕾舞剧，如《天鹅湖》、《吉赛尔》、《海盗》、《巴黎圣母院》等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能从祖国遥远的边疆来到首都北京上学已经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到北京后竟然又能接二连三地欣赏到一部又一部世界芭蕾巨作，这是何等的难得和幸运！虽然当时的我们对芭蕾艺术还处于懵懂状态，但心里也还明白：芭蕾是高雅艺术，俄罗斯芭蕾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芭蕾。“观摩”令我们大开眼界，它使我们从进入舞蹈专业的初期就享受到了艺术名著的熏陶。几乎也就在同一时期，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一次又一次的进京演出又让我们有幸欣赏到了辽阔草原那丰富多彩的蒙古族民间歌、舞、乐。简陋的舞台上，马头琴演奏员将椅子当作骏马，又说又唱、又舞又奏，一专多能的表演欢快活泼、丰富多彩，悠扬的长调饱含着浓郁的草原气息，万马奔腾的马头琴声令人心醉啊！那种激情、那种奔放、那种潇洒和幽默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我的眼前，“乌兰牧骑”演出所塑造出来的是马背骄子矫健的身影，所展现出来的是阳刚、活泼、热情而豪放的性格。

这不正是我们东方民族所共同追求的那种美感和人生状态吗！在感受蒙古族舞蹈艺术魅力的同时，“乌兰牧骑”更引领我走进了艺术领域中另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那就是蒙古族草原音乐的天籁世界。草原音乐将我的心带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北方大草原，让我领略到了蒙古民族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蒙古族人民对人性美的追求以及他们运用音乐旋律和音色创造艺术美的聪明才智给予我内心以极大的震撼。二十年后，我创作的男子群舞《奔腾》出现了一段“好来宝”音乐以及一段性格悠闲、动作挥洒自如的“走马”舞蹈，其创作灵感正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观摩“乌兰牧骑”演出时所留下的那些难以磨灭的印象。

艺术生涯中的第一次排练演出

“排练”在教学计划里是一门比较灵活的课程。有的学生多一些，有的学生则少一些。记得是1959年冬天，也就是开学刚几个月的时间，赵自铎老师安排我与“舞训班”的藏族师兄们一块排练贾作光先生的《牧马舞》和《鄂尔多斯舞》两部经典作品。《牧马舞》里有一组动作是在踮着半脚掌状态下的“九十度吸腿接撩腿”。从基本功角度上说，我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胜任这种难度的舞蹈，每当排练和演出到这组动作时，不仅吃力而且很有些紧张。在情感和表演方面，与表现力极强的藏族师兄们相比更是相差甚远。但是，参加剧目排练与没有参加剧目排练，参与了舞台演出与没有参与舞台演出，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通过经典作品的排练和舞台演出实践，先不谈自己水平的高低以及提高的程度如何，至少在我启蒙时期的头脑里已牢牢的植下了一个鲜明的概念：“舞蹈的终端形式是舞台表演，演员舞台表演依据的是舞蹈作品。优秀的舞蹈作品与演员精湛的表演是舞蹈艺术的最高形式，两者缺一不可。”几十年来我习惯于对自己的作品不厌其烦地进行反复不断的修改，对演员给予耐心却又严格的排练，锲而不舍地追求作品和表演的完美，其根源应该就是五十五年前赵自铎老师给我的那次使我感到有些吃力和紧张的排练演出机会。对我从事舞蹈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门课——“钢琴课”中央民族学院舞蹈专修班最早的课程设置里，“钢琴课”是一门必修课。根据教研室安排，我们每三至四个学生有一位共同的钢琴老师。我的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林栓莲老师。虽然我的主业是舞蹈，但林老师却完全按照音乐专业的标准来要求我，每周两次会课，雷打不动。会课时，林老师会非常认真仔细地听我的弹奏，指出存在的每一个问题和瑕疵。为了达到林老师严格的要求，我几乎每天都是五点半起床，练习一个半小时的钢琴再赶去上舞蹈专业课或者文化共同课。从下午四点到晚间熄灯前也是我练琴的时间，平均每天练

琴在六小时左右。三年下来，我的钢琴弹奏有了长足进步，在同学中小有名气。应该说，钢琴将我带进了音乐艺术的圣殿，更为我此后从事舞蹈创作在音乐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犹如给我增加了一对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翅膀。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音乐是我体现创意、落实结构并借以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在我的观念里，音乐蕴藏着无限的、可以转换成无数人体动态的艺术元素。音乐的曲式、配器、和声、复调以及节奏、旋律、音色乃至音量的强弱无不 是舞蹈艺术至关重要的要素和编舞时必须注意的环节。一个编舞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音乐家。编舞家可以不会作曲或者演奏某种乐器，但他至少应该在曲式、节奏、旋律、音色和音量的强弱关系方面有尽可能高的修养和水平。否则，他将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有艺术性和有艺术生命力的舞蹈作品。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在我后来主持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工作期间，在为民族大学首届舞蹈本科专业制定课程设置时，便不假思索地将“曲式”列为了必修课。当然，还增加了“民族舞”、“现代舞”以及“舞台色彩与灯光”等课程。我的老师、我的前辈在1959年为我们第一届专修班开设了钢琴课。四十年后，我为舞蹈本科生设立了“曲式”课程，这应该是对我的老师——李才秀老师、赵自铎老师教学思路的一种延续和继承吧！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向民间艺人学习 1965年毕业后，我开始了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民间舞教学生涯。一开始，我有幸跟着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赵自铎老师和白莹老师



到少数民族地区学习、收集、整理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民间舞蹈，为建立适合培养高级民族舞蹈艺术人才所需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教材建设进行前期工作。当时，我参与和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对傣族民间舞蹈的学习和收集。我们走访了德宏和西双版纳的许多村寨，向众多的民间艺人请教、学习。记得是1972年吧，经过李才秀老师的批准，我又先后两次单独回到云南



拜访了著名傣族民间艺人毛相，与他一块相处了将近一个月。一边跟他学，一边仔细观察毛相跳舞时的动态、神态和心态，体会他心中的那种独特的审美观念。去的最多的另一个民族地区则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科尔沁草原以及呼和浩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的内蒙古之行，更多的是广泛接触牧民、体验牧区生活、在弥漫着旱烟的说书厅聆听“好来宝”说唱、在大草原接受刺骨寒风的吹拂、迎接沙砾的挑战、尽情感受蒙古高原的博大和蓝天的无际。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面学习和收集民间舞蹈，一面考察和了解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生活习俗，研究他们经过长期的劳动生活而积累和沉淀下来的、那种蕴藏在他们心里、只能靠感觉和面对面地心灵沟通才能领悟的那种独特的情感、心态和美学观念。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教研室的民间舞组在赵自铎老师、金艺华老师、白莹老师的主持和带领下，对各民族的各种民间舞蹈的基本动律、动态以及节奏型进行了认真、严谨的梳理、分析和研究，确立了编创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教材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此后几十年的民间舞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于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少数民族生活环境，特别是少数民族美学观念的学习、理解和探究。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当年的田野调查，使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深入生活对于民族舞蹈教学、特别是对于民族舞蹈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重要意义。舞蹈艺术创作中的想象、联想和创意无不得益于对生活、对历史、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解。

我的第一次创作

“这小伙子有出息！”是教研室主任李才秀老师于1966年春在学院礼堂舞台侧幕旁同钢琴组黄顺娥老师讲的一句话。这是因为他们刚看完了一个舞蹈节目，那是我留校任教后的第一个作品。一个毛头小伙子刚参加工作就搞创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并不多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那个舞蹈其实很单薄也很幼稚。老师的表扬在本质上是一种鼓励，意在激励和提倡青年教师的创造性。然而，正是这种提倡给了我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增强了我继续从事创作的自信。我们今天做个假设，假设当年李老师讲的不是这句话，而是另一句，比如“这算什么东西啊！”那么，后来的《奔腾》、《草原茫茫》、《马背旋风》、《草原深深》、《生命在闪烁》以及《一代天骄》和《东方朝阳》等三十多部大小作品也许就不一定会出现。对于学生，有时需要严厉的批评，有时更需要热诚的鼓励或者称赞。一句冷言冷语可能会浇灭一个青年人最

初的某种创造新事物的热情，而李才秀老师那一句的称赞的话促成了我在教学和创作的双轨道上一直走了几十年。几十年来我难忘的不是那一句称赞的话，难忘的是李老师不刻意的、在各个关键节点上随意表现出来的那种胸怀、那种境界和那种高尚。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充满了艰辛和享受，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胸中那股创作的激情却像火焰般一直在心中燃烧，并且整整燃烧了四十八个年头。

让历史记住他们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会心潮澎湃，一种幸运感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当年，我们在中央民族学院第一代老师们的关怀下成长，又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跋山涉水、深入民族地区学习、采风。我们耳闻目睹到的种种民风、民俗以及与少数民族生活、民情共存的那些民间舞蹈的场景已在历史的岁月中渐行

渐远，创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的开拓者、奠基者也都早已离休或者退休。曾经的他们也都是些充满朝气的热血青年。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无私的献给了培养少数民族舞蹈艺术人才的教育事业，更将自己呕心沥血所创建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教学殿堂交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自己则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而更令我深为感慨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当少数民族舞蹈教育还处于零状态、在国内外没有任何少数民族舞蹈教学范例可供参考、可资借鉴的年代，他们就能高瞻远瞩的想到并构建起了以“古典舞”、“芭蕾舞”、“外国代表性舞蹈”、“毯子功”和“排练演出”等为基础课程，重点发展“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少数民族舞蹈艺术人才培养的科学架构。与此同时，在保证文化课达到普通中专和大学专科水平的基础上，设置了“基本乐理”、“试唱练耳”和“钢琴”三门音乐方面的课程，切实有效地保证了舞蹈专业人才应该具有的音乐水平和音乐修养。这种“基础扎实、知识全面、重点发展少数民族舞蹈”的办学思想、教学架构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至今仍滋润着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园地。至少对于我来讲，我在他们之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不同他们——那些引领我走进少数民族舞蹈艺术殿堂的、我的老师们以及他们确立的教学架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种不可复制的经历和珍贵的历史记忆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并影响了我一生的教学和创作活动。一转眼，五十六年已经成为过去。然而，第一代老师们开创少数民族舞蹈教育明媚春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历史会记住他们！

马跃

扒一扒历史系八八级



一转眼，我们已经毕业 24 周年了，一群青葱少年已经成了大叔大妈；然而，中央民族大学的那四年，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无法忘怀。

四年里，有许多事情发生，我只能择取那些难忘又可以讲述的一些片断与大家分享。

转系风波

历史系八八级有两个专业，中国史专业和民族史专业，两个班一共有 46 位同学。这是最后一年分两个专业招生，再以后专业就没有这么细分了，只剩下历史学专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大历史系在全国高校中以其鲜明的特色独树一帜，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厚的名师，



拥有中国民族史博士点，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等硕士点。

那时候在民大，说起学校的学术地位，人们必须要提的是以林耀华先生为首的民族学专业、以王锺翰先生为首的民族史专业和以戴庆厦先生为首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历史系也以学风扎实、考研比例最高，在全校为人称道。

入学的第一周，中国古代史专业第一次上课，邱久荣老师问我们有多少人选择了历史专业做第一志愿。46 个人面面相觑，大概只有三四个人举手。课后，大家互相询问彼此都是报的什么专业，结果大都是经济、法律、新闻、中文这些实用性强的专业，大部分同学是被调剂到历史系的。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极为活跃，人们的选择开始多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用



收入的多寡来衡量、来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入时合宜。因此，历史、哲学、数学、物理这类长线专业、基础学科开始变得冷门起来，少有人问津。

尽管有一肚子的委屈，尽管有许许多多的向往，但是，绝大多数同学在牢骚过后也就按部就班地进入角色，开始投入到历史专业的学习之中。

然而，平地起惊雷，1989 年 2 月底，也就是第二学期一开学，民族史班的冉燕飞突然成功转系到了法律系。

一石惊起千层浪，经过了一学期的专业教育，本来已经安定下来的心又燥动起来。听到消息的当天，有七八个同学就跑到本系及相关系科提出申请，以种种理由要求转系。

那阵子，那些同学每天不是去历史系办公室，就是到经济系、汉语系、法律系，磨了这个磨那个，经过十天半个月时间，一个个都黯然伤神，铩羽而归。

经过这次事件，大部分同学也就安分守己，彻底断了念想。有的人开始转移兴趣，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也有人不求专业有多好，只求平安过关不被抓补考。

当然，还有极个别同学一直保持着理想的追求。比如，酷爱文学创作的苏新红，大学期间在《民



族文学》《南方文学》等期刊发表诗作多篇；蓝建洪同学一直悄悄参加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1992年本科毕业的时候顺利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

五花八门的课程

大学课程不外乎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公共课，当时历史系的专业课很严谨，而公共课就有些参差不齐了。

那时，大学英语入学有一次分级考试，根据成绩分成一级、预备二级、预备一级、复旦英语四个班次，我在一级班，就是成绩最好的那一班，教我们班的是廖老师，一位五十多岁似乎是广东人的男老师。这位老师讲课随意性比较大，讲不到点上，讲课非常不吸引人。于是，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往后排就座，看一



些和课堂无关的东西，或者干脆睡觉。如此一来，成绩自然不会好，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好几位男生就降到了预备二级。

大二最后一学期，我们英语班的同学要考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那一学期我已经丧失了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民院当时也不要求学生必须过国家四级，只要过了校内四级甚至二级就可以毕业。1990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国家四级考试，在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考了57.5分。这个成绩让我意识到，我过四级应该很容易。

之后的一学期，没有了廖老师的英语课，我依靠自学，反而成绩突飞猛进。1991年1月，第二次参加国家四级英语考试，以82分的成绩通过。

公共课中最搞笑的是计算机课，学了一学期的计算机，没有一次上机课，连计算机的毛都没摸着。老师对着讲义讲二进制、讲BASIC语言、讲硬件设备，讲了一堆对文科生屁用没有的知识。貌似没用的还有高等数学、行政管理学、教育学，这些课大都是考查课，随着学随着忘。工作以后，真的要当老师、做管理，还要从头学。教教育学的是一个朝鲜族的女老师，有特别有东北口音；教高数的肖老师温文而雅，是数理系留校的，讲得还不错。而行政管理学，是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师，有着浓重的口音，行政读成“横政”。

说起专业课，历史系的很多老师学养深厚，课讲

得很精彩，比如讲中国历史文选的徐庭云老师、讲明史的陈梧桐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史的邱久荣老师、讲中国近代史的陈理老师、讲世界近代史的王勤榕老师、讲藏族史的陈楠老师。这些老师之所以受同学欢迎，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课讲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而且课上课下都乐于和同学互动交流。

徐庭云老师教了我们两年的《中国历史文选》，当时她应该将近五十岁了，上课总是一袭长裙，化着淡妆，非常有气质。徐老师博古通今，讲课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我们听得是如痴如醉。徐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她精选了《文选》中的若干篇目，要求我们能够背诵默写。一开始，同学们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几次课堂提问、默写测验，大家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文章背的多了，自然有所触动，对自己的思想也潜移默化产生了影响。我记得，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热血豪情在胸中升腾，之后每遇困厄景况，常以文中词句激励自己。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再多背诵一些文章就好了。

徐老师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专业课老师，不是班主任，在系里也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在课下依然很关心同学的成长。大学期间，徐老师曾经几次邀请我和其他同学到她家中吃饭。当时，徐老师的先生客居海外，她和小儿子劲劲住在家属院，每次到徐老师家中，她都会一个忙着做饭，我们就和劲劲聊天。我当时有很多思想上的困惑，都是徐老师帮助解决的。

毕业之后，我还去看望过两次徐老师。后来，她也随先生客居海外，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亚运会志愿者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民院有很多同学加入到了志愿者团队当中，有的做翻译，有的做火炬手，有的做开闭幕式群众演员。我和七八十位同学一道参加的是闭幕式



的合唱。

大一的时候，社团纳新，我考入了学生合唱团，指挥是许直老师。那两年，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要上合唱课，许直老师带着我们从最基础的发声开始练起，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演唱能力。当时我在男低声部，声部长是法律系的盘金顺，在我们声部唱得好的还有计算机系的肖朝虎、物理系龙宪林。我音色好但是不识谱，每次新歌谱发下来，总得让声部里的其他同学辅导一下。

许直老师特别强调民歌的合唱，他经常说，民族学院的合唱团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民族的特色。我们排练的很多歌曲都是民歌改编的，或者是新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歌曲。比如1989年冬天，我们参加第三届首都大学生理想之歌合唱节的曲目《天山深处赶巴扎》就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间声音的特色。那一年，我们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

大二的下学期，我们接到了团市委的指令，要参加亚运会闭幕式演出。从六月开始，我们就认真准备，排练的次数逐渐增多。暑假只休息了十几天就赶回学校继续排练。

某一天下午，中央电视台要来学校采访暑期坚持排练的合唱团员，许直老师点了几个声部长，让他们



做好准备。记者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礼堂前面站好，其中准备接受采访的同学已经换好了民族服装（比如盘金顺同学穿上了壮族服装），我们这些没有任务的同学则穿着平常的服装作为背景。记者采访完了那几位穿着民族服装的同学之后，又随便问了几个问题，正好我离记者比较近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晚《新闻联播》播出了有关我们合唱团的节目，但是没有盘金顺，而有我的几十秒的画面，字幕上打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壮族学生（其实，我是蒙古族，记者把我当成盘金顺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新闻联播》中露面，当时在故乡根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们认真排练了几个月，临到演出的时候，我们被通知到时候是放录音，我们对口型即可。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但是因为能参加到大型活动当中，我



们还是很兴奋的。在10月7日的闭幕式上，我们演唱的最后一曲是《下次相逢在广岛》，这首歌的几个声部，到现在我还会唱。

毕业实习

1991年暑假，我们八八级两个班的同学去湖南桑植县进行为期两周的社会调查，也就是毕业实习。

那年，同学们放暑假先回家，然后再到桑植。东北、西北的很多同学都要到北京中转，办理同一天同一车次的中转签字手续是一个大问题。

那一年，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先返校，然后，同学陆续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他们的车票和学生证收上来，然后一起到北京站的中转签字窗口办手续。八月中旬，正值暑运高峰，北京站广场人山人海，窗口秩序混乱，我竟然是在人们的头上、肩膀上爬过去，挤到窗口办手续。

当时，我们的系主任要去湖南开会，也要和我们





同行一段，他年纪较大，需要做卧铺。那时候买卧铺都在西直门售票处，我和两个男生是前一天晚上去排队，人们怕夹塞，一直是一个人抱着前一个人的腰，在那三伏天，没有空调的售票厅，我们简直要虚脱了。第二天早晨买到那一张卧铺票时，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几回。

当时，在桑植，我们分成了六个组，分别到六个乡进行社会调查。下乡之前，县里教育局和各乡镇打了招呼，吃住都由乡里负责。

桑植是老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在汨湖乡，我们住的是招待所，条件是最好的。王勤榕老师带队的是到最偏远的上河溪乡，他们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里，男生女生用一个布帘子隔开。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肉，就是炒青菜和米饭，并且菜总是不太够，只好拼命加辣椒。

实习虽然吃的住的不好，但同学们的心情是快乐的。

我们组有七个人：桂燕玉、杨军、雷丹丹、陈承激、



于世林、靳勇和我。当时，雷丹丹的脚崴了，走路不敢着地，陈承激等几个人就轮着背她吃饭、上厕所。实习快结束的时候，雷丹丹的脚也好了，最后一天，乡长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我们喝着米酒，唱着歌，聊到深夜。

实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到了张家界、葛洲坝，四十多个同学在秀美的山水之间恣意畅游，纵情歌唱。9月初回返程的时候，在火车上我们坐了半截车厢，同学们分成了民歌组和流行歌曲组，一起赛歌，看那一组最后无歌可唱。我们唱着闹着，一路欢声笑语回到了北京。这样的好时光，今生只有那一次。

最是伤感毕业季

进入到大四不久，就开始了综合测评工作，按照15%的比例确定可以留京的同学，我们班可以留6个人（常戎、保向东、吴辉军、张志刚、罗厚和我）。

那时候，学校包分配，但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单位，



两条腿走路。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在北京到处找工作，其他的同学则是准备考研和回地方找工作。

1992年4月，考研的结果出来了，陈小强、周海泓、余志清、杨卫方考上本系的研究生，吴应泉考上藏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蓝建洪考上北大的研究生。说到考研，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当时，少数民族的外语分数线是30分，汉族是45分。班里的于世林同学是汉族，总分很高，但外语不过线，没考上；苏新红同学报的是汉语系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总分和外语都上线，但是他们还是选了本系的学生。

进入5月，毕业论文大都完成，基本上没有了课程，工作也有有了一些眉目，得空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喝酒的时候都在叙旧，结开了好多不应有的误会，也互相知道了当初的很多秘密。

可是，那时候学校出了一个禁酒令，严禁在校内餐厅、宿舍饮酒。某一天晚上，杨宪和唐魁两位同学每人拿了一瓶啤酒，在草坪喝酒聊天，他们是班里遵纪守法的模范，四年一贯的好学生，但那天偏偏被保

卫处的老师给抓了现行，给了一个通报批评（好在毕业前撤销了这个处分）。



离校的日子到了，毕业聚餐是在湖南餐厅，四十几个同学喝得乱七八糟，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抱成一团。

接下来就是送别，说好了留京和考研的同学最后离开。

第一个走的是唐魁和陆海波，他们是回南宁，隐约记得发车时间是晚上 10 点多，一帮子同学一起去车站送他们。当时，有一位同学还带了吉他，我们在站台上说说笑笑，还唱着《大约在冬季》。等到他们上车以后，大家围着车窗拉着他们的手，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等到开车的铃声响了，车站工作人员不停地催我们站在黄线外面，而我们还是舍不得分开，最后是工作人员强行分开。

然后就这样一个个送着，两天后，当我离开的时候，班里只有两个人，黎林和我。黎林是广东人，他感情丰富却不愿意表达，他早就定了回广东，单位是国土局，没有必要留下来，但是他却要送走所有的



同学。那天，黎林把我送到 16 路公交车，我从车上回头望去，公交车站上只有他一个人落寞的影子……

历史系八级，入学 46 位同学，毕业 44 人（退学 2 人，转系 1 人，八七级病休转入 1 人）。当年 46 位同学来自 23 个省、市、自治区，现在他们分布

在 13 个省、市、自治区和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

24 年过去了，我们都健康平安；24 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聚在一起，只不过变成了微信群里的家长里短、逗贫耍宝，情意依旧……

魏胜利，男，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 1992 届毕业生。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艺节目中心副主任、高级编辑。





在狂风暴雨中飞翔

——回忆大学生治安服务队

记得刚到民族大学那会儿，每天晚上或重大节假日、政治敏感日时总是看见一队队身着迷彩服的学生模样的人在学校花园、教学楼、博物馆及学生公寓来回巡逻，当时看见后心生好感，觉得他们给学校创造了安全的环境，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在校学生，是一个叫做“大学生治安服务队”的学生组织的成员。

后经过班主任介绍并考核选拔后，我于1999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这个学生组织。原来，大学生治安服务队是由学校学生处管理、保卫处和校团委共同指导的，以贫困生为主的学生组织，他们以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的方式，面向全校各个专业招募，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力，人数较多时曾达到60余人。我在大学生治安服务队度过了难忘的两年时间，直到2001年毕业离校。

投身校园文明建设 维护校园文明和谐

大学生治安服务队成立时的初衷，是以

成员为骨干并带动身边的同学，积极投身于校园文明建设，并具体在一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将成员分成7个小队，每周从周一到周日分别由一个小队负责当天的校园巡逻工作，并按照学生公寓、教学楼、学校花园、图书馆、食堂等区域设定的路线进行，在巡逻过程中及时制止吸烟、酗酒等不文明的行为；二是在常规巡逻过程中，要将学生公寓、食堂等自行车摆放较多且乱的区域进行整理，将自行车码放整齐，并对未上锁自行车推放到保安队等区域进行暂时保管；三是在重要节假日时，配合学校保卫处做好大门的门卫管理工作，所有队员都要排班参与门卫的执勤，特别是有重大活动要在首都体育馆举办时，队员们要参与校园及周边区域的巡视工作；四是大学生治安服务队还完成了寒暑假期间的一些工作，比如我们曾牵头组织2000年中国跳水队赴悉尼参加奥运会的壮行大会，组织了56个民族的200多名学生到人民大会堂为跳水健儿们壮行。又如，2000年寒假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校看望师生员工，大学生治安服务队还组织了一场少数民族学生的联欢会，与中央领导联欢。



各民族学子共同参与 加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各族学子组成的队伍，大学生治安服务队队员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大家在平时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交流，增进了了解和理解。首先，在给小队分组时，按照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原则进行分组，这样就形成每个小队6名成员中，至少有三个民族的成员，为增加了解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共同制止不文明行为的处理中，大家能齐心协力，不仅增强了热爱学校的荣誉感，也为促进队员之间的友谊典型了基础；三是作为传帮带性质比较浓厚的一个学生组织，随着老队员的退出和新队员的加入，大学生治安服务队“争做校园文明卫士”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各族学子在日常工作中进一步交流交融，深入了解了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优秀文化，为促进整个校园的团结和谐奠定了基础。

丰富阅历 增长各民族青年的知识和才干

尽管在大学生治安服务队的时间不算长，但作为具有社团性质的大学生治安服务队对学生个人的成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在学校有重大活动之前，大学生治安服务队要担负起校园秩序的维护工作，特别是在具体活动开展前，主管学生工作或保卫处的校领导要亲自作动员，在动员中对文明校园建设的意义、大学生治安服务队的巨大作用、学生投身文明校园建设工作方式方法等等会作详细的讲解，对队员给予鼓励和支持；二是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学校会第一时间想大学生治安服务队通报情况，如2001年1月23日，“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后，学校第一时间向大学生治安服务队通报情况，让队员们第一时间认清了“法轮功”假丑恶，进而坚定了正确的立场；三是除了日常巡逻、执勤之

外，大学生治安服务队还会举办征文比赛、小队清理废旧自行车比赛或外出参观交流等活动，不仅增长了队员的知识，也增强了大家的能力。

难忘的治安队 难忘的友谊

尽管毕业离开学校十多年，但回忆起在大学生治安服务队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特别是与队员结下的友谊仍保持至今，不仅是校友更是共同的治安队人。队员们毕业后犹如一颗颗种子，飘在祖国各地并生根发芽，有的继续深造留校工作，有的进入公安系统，有的成为IT精英，还有的回到了老家。一是作为共同的“民大人”，在学校里养成爱党、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将伴随终身，并身体力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二是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治安队人”，始终牢记学校的教育之恩，特别是在学校或者校友的发展需要帮助时，都会不遗余力的伸出援手；三是因为有共同战斗的经历，“治安队人”有着合伙人的天然基础，有几名队员合伙创业后，事业发展的风生水起，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如果说母校给了我们飞翔的翅膀，治安队则给了我们在飞翔中与狂风暴雨战斗的技能。我爱母校，我爱治安队。

毛发虎

那份工作，那间小屋，那一群人

——记在民院广播台的日子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这是我的好朋友，已故著名诗人汪国真写得一首小诗，也是我在大学期间经常背诵的一首诗。每当回忆起在大学时代的生活，想起那些让我无法割舍的人和事，便会想起这首诗。其实，二十多年来，每次想到中央民族学院广播站，心中涌起的总是最真的情感，充满感激之情。感谢，在大学期间课余从事的那份工作；感谢，广播站播音室的那间小屋；感谢，那群一起工作的老师和同学。

感谢，那样一份工作

我是1987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的，我的初中和高中生活可以用乏味单调来形容。所以，一走进民院，满眼都是新鲜和新奇的，音乐舞蹈系的演出，美术系的展览，院系组织的各种活动，可以说是目不暇接。

记得是1987年12月，学校组织“诗歌朗诵大赛”，经班级和系里两级选拔，我被推选参加校赛，在校赛上我一举获得第一名。走下舞台时，一位高年级的女生拦住我说：“你的声音条件不错，你愿意到广播站来工作吗？”我当时刚走下舞台，紧张的情绪还没有舒缓过去，便回答说：“我愿意。”她笑着说：“那你明天下午四点钟到三号楼广播室来试试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知道这位师姐就是我们学校广播站著名的女播音员张佳伟。

第二天下午下课后，我怯生生地走进学校广播站的那间录音室，吴敏学老师让我录了《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自己感觉效果不理想，毕竟是第一次录音，找不到感觉。老师说等消息吧，便把我打发走了，我以为这事儿就算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们系86级的于池通知我去广播室，吴老师对我说：“开始我们觉得你的口音有些重，后来因为我

们广播站的很多同学都听过你的朗诵，觉得你的声音条件特别好，积极推荐你，我想你通过努力，把一些口音上的毛病改掉，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播音员的。”

借吴老师的吉言，我走进了广播台。从此开始了一段足以影响我一生的经历。

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很多人才华横溢，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播音经验，而且编辑策划能力也非常强，他们还在学业上成绩优异。最关键的是他们对我的无私帮助，使我很快地熟悉了播音工作，掌握了播音技巧，而且还担任许多编辑策划工作。

在那里，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归属感、成就感和自信心。我像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尽情地挥舞并不丰满的羽翼，一次又一次在期待和鼓励的目光里试飞。在一个个晨曦初微的早晨，在一个个下课铃声响过的中午，在一个个落日余晖下，听着校园广播里回荡着自己的声音以及经自己亲手写成或编辑的稿件，心中的快乐就像一片片骄傲的羽毛，在充满希望的身体上生发。感觉那个青葱时代，满眼都是绿色的。

再后来，我担任广播站站长同时还担任校学生会的常委兼文化部长，策划组织过一系列的大型文化活动，当时的学校周报头版头条作了报道。毕业后，我开始了自己20多年的媒体生涯，做报人，出书，写电视剧，撰稿电视专题片，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财经评论员。所有这些经历的起点，都来自于大学时期在中央民族学院广播台的播音和编辑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我一向觉得，在广播站的日子，不仅是我大学生活中最耀眼的亮点，也为我的人生事业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感谢那一次不期的相遇，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不弃，感谢那一份工作的经历。

感谢，那一间温馨的小屋

民院广播台的录音室是一间20来平米的小屋，被隔成两部分。里间是调音和录音台以及值班宿舍，外间是播音间和安放功放设备的房间。隔断有透明玻璃，里外间看得很清楚。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后，广播站的同学就按照值班表来这里编辑录音，然后在沟通下一期的节目内容回去准备资料。



虽然是一间 20 来平米的播音室，虽然每次在一起工作 2 个来小时，但是这里就像广播站同学们的心灵港湾。在广播站赋予的自由空气里，恣意张扬着属于我们的青春个性，对自己真正付出过努力和情感的这份事业，包括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倍感珍惜。总觉得自己是这些节目成长的见证人和监护人，不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和破坏。更多的是忙碌的工作中老师、同学结下的铭记一生的友谊和情感。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广播站的同学不论是不是自己值班时间，一有空就到那间小屋坐一坐，聊一聊。甚至有些上了研究生或工作后，来到学校时也愿意去那里坐坐，聊聊。那间播音室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家，大家像兄弟姐妹一般凝聚在广播台这个特殊的集体中。每个人都保持着一份纯真的热情，对广播台的热情可能会在蹉跎岁月中稍有磨损，但是我们对广播台的情感早已根深蒂固。做久了，自然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

感谢，那一群人

每每想起，那些与声音一起走过的日子，都牢牢地铭刻在我的心里，难以忘怀。每当想起在广播站时的那些老师和同学，内心便会涌起温暖和感激之情。

任中夏、崔立群两位老师作为学校党委宣传部的领导非常关心广播站的工作，经常找我们座谈，也关心我们每位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特便是在我毕业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至今难忘。

吴敏学老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工作，为广播站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年华。他待我如兄弟，我还经常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他总是嘿嘿一笑了之。

85 级历史的张佳伟，85 级新闻的再军他们不仅播音水平高，而且学业精湛，89 年在那个凤毛麟角的时代被保送研究生，实属不易。是他们把我领进广播站的大门，又无私的教授我播音技能和知识。他们在读研究生时期，还经常来广播站录音，指导学弟学妹，可见他们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广播站。

86 文学的于池、86 新闻的周丽燕、86 历史的雷洋、86 朝鲜语的崔丽红这些师哥师姐工作起来认真负责、精益求精，而且播音风格各具特色，他们的节目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87 历史的文泉是一名藏族，7 岁才开始学系汉语，但是他特比热爱播音，独具特色的声音在同学中拥有很多粉丝。87 维文的苏晓春是一名北京女孩儿，普通话非常标准，经常校正我们的发音。

88 蒙文的斯琴、88 外语的沈一鸣，这两个来自内蒙古的同学，母亲都是著名的艺术家，他们与生俱来艺术素质和修养为广播节目增添了很多色彩。

还有后来的皮均、赵鹏程、张卓、关悦、王冬梅等师弟师妹，他们把节目做得更加丰富多彩，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为广播站吹进了一股新风。

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阵地，校园广播是校园的一个符号。从过去到现在，校园广播如同校园里一道永不凋零的风景，愈久而弥香。也许，曲终人散的时候，离开的离开，忘记的忘记。但是，记载了蓬勃的青春与梦想的校园广播，早已留在了彼此的回忆里。

而那些校园里忙碌的广播人也许有些同学还依稀记得他们的声音和名字，我想他们也许会把这段经历永远的记住。记得在一次我们广播站老同学们的聚会上，一位同学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些在广播台的时光，那些快乐的记忆，不会随风吹走，它们将随风印在我的《青春纪念册》里。我想，他的话也是我们所有中央民族大学广播台人的共同心声。

感谢那段旧时光，
感谢时光的记忆中依旧清晰的人。
感谢民大。

刘彤，笔名：额鲁特·刘彤。

蒙古族，1987 年就读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任企业管理出版社副社长兼国务院国资委主管《市场观察》杂志社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国学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MBA 学院导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财经评论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影响力中国盛典组委会秘书长、第六届北京市青联委员。曾任《中国企业报》社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先后获得国家级新闻奖三次。著有《守正出奇》一书，获得国际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的好评。《大变局——中国企业新闻启示录》一书获得“走向卓越丛书”优秀作品一等奖。担任中央电视台拍摄《走进中关村》、《终极访问》大型电视专题片、大型电视情景喜剧《候车大厅》撰稿人、策划人。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哲学系的故事



现在，我每天面对自己店铺里成百上千款式的鞋子，服务购买这些鞋子成百上千的顾客。有时候我会想，这些进到我店里的鞋子就像我们考进哲学系的学生前途未卜一样，被顾客穿着去走它们千差万别的道路。有的鞋子在平坦大道上纤尘不染舒适优雅的行走；有的鞋子行走在崎岖坎坷泥泞污浊的小路；而有的鞋子一生都很少发挥走路的功能，只是偶尔从办公室走上汽车，从酒店走到办公室，然后安静的躺着舒服的



休息；还有的鞋子却行色匆匆风尘仆仆昼夜不息。像《闻香识女人》一样，我养成了看鞋识人的习惯，打理这些鞋子，做好这些鞋主人的服务，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我已经满怀喜悦的热爱这些鞋子和它的主人，已经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与鞋子密不可分的生活和工作！在我 1994 年满怀憧憬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现在的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销售鞋子的商人。

考进民大的时候，北京各高校哲学系已被裁撤得没几个了，全北京几十所高校，保留有哲学专业的只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和中央民大四所高校，哲学褪去它神圣的光环纳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了，这可能正好应验了马克思那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经济法律生物化学等学科改造世界的功效可能更立竿

见影直接有效，哲学专业的就业不再有八十年代那样需求广泛，招生数量也一减再减。我们那一届民大各个院系里，我们系的招生人数几乎是最少的，在招的哲学和宗教学两个专业里，哲学专业 24 个同学，宗教专业只有 19 个同学。但是具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是，我们这届的宗教班是建国以来国内高校培养的第一届宗教本科专业。班级的同学大多来自祖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哲学班 24 个同学分别来自 24 个不同的省，分属 24 个不同民族。入学报名那天，我从去火车站接我们的大巴上一下车，就听见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着热情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这首歌曲，我知道我读的是民族大学，但也没有想到全班同学没有一个的民族是相同的，一个宿舍八个同学就是八个省份八个民族的代表。由于当时哲学专业毕业就业的工作收入待遇都不如实用专业那么好，所以报考哲学宗教专业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94 级全部 43 名同学，报考这个专业的同学居然只有一个，其余全部是通过院校调配和专业调配过来。不过，无论什么原因来到哲学系，我们都是哲学宗教学的有缘人，或许正如流行的一句佛语所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们这样的相聚，不知道前世是怎样的因缘。

哲学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小。系楼的办公面积小，系学生老师少，系内活动组织少。每天早晨，全体同学排在田径场早操的时候，我们左边是经济系，右边是中文系，全系几十人被两边上千人的系围在其中，如果迟到了想找到本系的队列，是挺不容易的事情。那时候经常做的梦就是，早操迟到了去找系的队列怎么也找不到，着急得从梦中醒来发现广播正吹着起床的号角。由于人数少，学校各类竞技活动，我们都很难取得好的名次。学校的活动，在其他系都是大家挤破头轮番淘汰才能参加，而在我们系却成了学生干部寻找参赛选手的难题。记得 96 年，学校传统的秋季足球联赛开赛了。我们系 93 级只招了读三年的专科，他们正好在 96 年毕业，新招的 95 级人数也不多且竟然没有一个踢球的人，92 级的老生忙着毕业各奔东西无心联赛。全系就剩下我们 94 级的同学参赛！

所以人数虽然凑够了但却是一只没有一个替补的球队，成绩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们的最大目标和后来2002年国家队来进世界杯后是一样的，就是能赢一



场球。这个愿望在4:0输给生化系，8:0被研究生队血洗后，4:0输给朝文系后，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实力孱弱语言不通的留学生队了。我们分析留学生队来自不同的国家无法有效沟通，场上一定各自为阵没有战斗力，但就这样一只队伍，我们也被他们2:0凌辱。在学校大型活动里的憋屈，由此可想而知！到了97年秋季年赛那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鲍中同学付出一条大腿被踢骨折的代价后，才终于一洗前耻，战胜干训部队、研究生队，战平留学生队后史无前例的进入了决赛八强。据留校的同学透露，直到今年，哲学系在足球联赛的最好成绩也还是我们那一届为主力的同学创造和保持的。当时的系党支部书记李东光老师非常高兴，大大表扬了一番，带大家到魏公村的餐馆饱餐了一顿。不过在某些校内竞赛中，哲学系还是有强大实力的，学校的辩论赛，冠军和最佳辩手经常都是我们系包揽。我想这主要源于辩论赛组队的队员不多，我们劣势不明显的原因。哈哈……

不过小有小的好处，小有小的优势，系小的最大优点就是全系的老师同学关系紧密，相处融洽，感情也比较深。2014年我们当年的辅导员宝贵珍老师到重庆开研讨会，特地找留京的同学问我电话约我见面。近二十年的分别重逢竟然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她还如当年硕士刚毕业一样充满热情和朝气，也一如年青时那般直接简单把我的生活工作情况问了个遍。记得刚入学时，她也是工作后第一次担任辅导员感觉责任重大，到宿舍把我们全班同学的家庭个人情况问了个清清楚楚，哪些同学家庭困难，哪些同学有什么思想问题，都了如指掌。北京的冬天，对我们南方去的同学是一个陌生的体验，我们都没有关窗户的习惯，结果一次降温，南方同学的宿舍里好几个都感冒了，上课缺席了大堆人。她到宿舍来探望我们，一进宿舍就感觉温度很低，伸手去探摸暖气片发现也很热，最后才发现是宿舍没有关窗户，一问我们，连晚上睡觉

也没有关，就非常着急，她亲自给我们关上了窗户。晚上开班会，她在班会上做自我检讨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我们自责难过。其实，那个时候她也不过只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这一次在重庆久别重逢，不知怎么一下就想起这件事情。我已是在社会中百炼成钢的四十多岁的人，但是那一刹那，自己心里还是非常感动！非常温暖！学校有专门给贫困生发放冬季的棉衣，可是数量有限。班上的同学谁家困难需要这些棉衣，其实她当时心里已经非常有数，不过为了让大家不至于有意见想法，她开班会让我们自己说谁困难谁需要。结果班上的同学大家都举手说需要，当时她就急了，非常生气，把大伙的自私自利狠狠批评了一顿，把棉衣给了真正需要的几位同学。直到这次见面我才告诉她当时的实情，其实大家并不是真的在抢那几件棉衣，当时大家想，如果直接让困难的同学报名说需要棉衣，这些同学可能会觉得面子上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大家商量就一起为那几个同学做掩护，最后一定是要把棉衣送到困难同学手里去的。了解了这个蒙她20几年的真相，宝老师不禁感慨万千！我问起系里老师的情况，得知张元东教授已经去世，不由得遗憾万分，难过得不能自己！张元东老师给我们讲授《天文学》，他是建国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的第一批学生，当时那一批学生很多都已经成为国内天文领域的领军人物。由于天文课的实践活动很多，仅仅课堂传授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但是系里的教学经费也非



常紧张，很多实践课程都需要学生自己掏钱去补贴。张元东老师就联系他在北京天文馆，北京古观象台的同学，让他的同学帮忙让我们免费实习天文器械操作，观察天文现象。记得那一年百武慧星二号经过地球刚刚被发现，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千载难逢机会，非常想带我们班的同学去亲眼看一次彗星。但这是教学计划里没有的内容，自然就没有这笔活动经费，于是他联系在河北省兴隆天文台任台长的同学，让我们用兴隆天文台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天文望远镜观





测百武慧星。可是，去兴隆天文台的食宿路费，对我们贫困山区的学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系里还担心长途远行会有安全意外事故发生，但张元东老师努力和系领导沟通保证，最后由他和宝贵珍老师两人带队去天文台实习，实习的食宿路费，没让我们学生掏一分钱，全部由他在国际期刊《自然》发表论文的稿费支付，大概是一万多人民币，在我们月生活费只需要200元的当时，那绝对是一笔巨款。我们全体同学得以在漆黑的兴隆天文台山顶，认识天上的星座，用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观测百武慧星、月亮和牛郎织女等星座的星星。兴隆天文台那次活动，几乎成为我们这个班大学经历里最奇特最美好的回忆。现在久居喧嚣都市的我，已经很少能有机会再看见满天繁星。一次我到个乡镇去跑客户，汽车中途抛锚停



靠在荒野的公路边，我一抬头，看见满天的繁星，瞬间回忆起兴隆天文台的那个夜晚，不由感动万分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天文台观测结束，经费还没有花完，张远东教授和宝贵珍老师临时建议又带我们去临近的承德避暑山庄，见习那里的藏传佛教建筑和宗教活动。我的人生如果有最美好的回忆，我想一定是这一次张元东教授捐款，由他和宝贵珍老师带队的见习考察活动。本来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去北京能去看望他老人家，给他送一双我的皮鞋，不想这个夙愿竟然永远无法实现了。在他的身上，我真切的体会到了老一批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对工作的认真，对学生无私的爱！也是他们用为人师表对我后来生活和工作的最好德育！

哲学学科深奥而严谨，也绚丽而迷人，我们渐渐沉浸在哲学的世界里。哲学系很多老师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张继选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陈亚军老师，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珍老师，讲授《形式逻辑》的李小克老师……然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教授《物理学》的杨钰老师。由于哲学发展与科学水平的密切关



系，在哲学系的课程里，有很多理工类课程。我中学时就是因为理科成绩糟糕才选择读了文科，没想到躲不掉的终究会来，到了大学还得学当年学得最差的物理化学。由于没啥兴趣，也没怎么认真听课，更没有去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到了考试前，杨老师担心大家过不了，特地针对考试内容做了专门的复习讲解，悲剧的是我还是没有考过。这门课一直到毕业反复补考，我也考不过去，我成了那届学生中唯一的肄业生。离校后，自己无心去国家分配的单位工作，自己找了个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有很多时候，我经常遇见一些学生毕业后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对考试挂科科目的授课老师多数都心怀芥蒂抱着成见，但我从不附和他们的观点。我非常赞赏杨钰老师这样严谨治学的精神，在科学的领域，对与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毕业是令人遗憾的，但也给了我哲学专业最后一个教诲，这个教诲让我在离校后的生活工作中，更努力严谨。这个经历，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激励。

四年学习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哲学本身的知识学习，也在于这些哲学老师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道德示范，还有那校园生活青春激昂的欢乐。这段宝贵的经历，帮助我把生命和心灵在世界妥当放置，让我在工作生活中少了些许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专业哲学研究工作，但在闲暇时候，我还偶尔拿起那些哲学经典来阅读，这些阅读，让我仿佛又回到了民大哲学系上学的那段快乐时光。

青春不老

春花冬雪小花园

上大学时就爱瞎跑，北京的高校去过不少。也去过上海，武汉的。这十几年游走海外，去过剑桥，牛津，斯坦福等名校。但在我心里，哪一所高校，也无法和民大相比。

民大的校园不大，但静谧优美。

我最喜欢图书馆、民博馆之间的那片花园。我经常在那里晨读英语。周围是好闻的植物的芳香。我喜欢每种植物上面挂的小牌子，让我的好奇，我感到的神秘找到它的归家。后来我去纽约、蒙特利尔等植物园看到那些牌子，我就会想起我的母校那些细心的标牌，为爱好植物的我，打开最初的窗。

这不大的花园，在我的青春，幽香地开放。

除了花园，民大各处都有鲜花。4月，丁香开放。坐在教室里，就能闻到隐隐的花香。我们女生在丁香丛里寻找六瓣丁香。传说能找到六瓣丁香，就能找到幸福。

大瓣的紫玉兰，落地时，还洁白芬芳。

5月，黄色的刺槐开在大礼堂旁，把古香古色的大礼堂映衬得更加端庄。

秋天的时候，学校给每个同学发橘子。满校园好闻的香味。

劳动课上，我们摘柿子。男生爬到高高的树上，女生，在树下坐等。

落雪的校园，像我们的初恋。

我们全班，在校园里打雪仗。

民大的三个门

我进校时，一般会走魏公村站那个大门。边走边看操场。

我们班各方面都优秀，包括运动。运动会时不管奖牌数，还是精神文明，都名列前茅。

我负责写稿子。我不擅长写“运动场上逞英豪”这样的豪言诗；但给我的任务，我就得努力完成。

4乘4接力少一个人。最后决定让我上。我天生不擅长运动，但为了集体，就得上。何况那三个跑得快，我有什么怕的？

那个帅小子，运动会的主持人，丢下话筒，上场

陪我跑。

接过他话筒的姑娘，用广播，喊我的名字，给我加油。

早上，我们要起来做广播体操。在小操场。

在那里，我们上过网球课。网球当时打得最好的峻峰，现在还打。有次说起，说感谢民大给了她这么一个陪伴终生的爱好。她现在成了中国冬奥会的一个官员。

在小操场，我还参加过篮球比赛。也属于矧子拔大个被选上的那种。因为其他队友强大，我们班得了女子第一。

我总是旁门左道。偶尔，会走民大的正门。去首体，北图，紫竹院公园。

我们在首体看“文学之夜”。在学校的大礼堂，我们也搞过文学之夜。平时我只写稿子，别人朗诵。不知那天为什么，让我上台表演。

按设计，是先出现我的剪影。音乐、灯光起，我再站起。可我坐在那里，时光凝结了。音乐，灯光都没有。我不知怎么办。灯光起，我站起来，开始朗诵。这时候，音乐来了。我重新朗诵就好。可是，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再起来。台底下哄笑。因为这个，郁闷了几天。后来在科特迪瓦遇到战争，在突尼斯遇到国家变革，都能微笑面对，心平气和。我们总得慢慢成长。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在紫竹院公园对面。站在12层，紫竹院的景色一览无余。清清湖水，亭亭荷花，熟悉得让人心惊。我们摄影课时，曾去那里拍照。那时天是那么蓝，那时青春年少。

我们全班也曾去圆明园。在有大大月亮的晚上，玩的游戏，有些像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

我们骑车去植物园。我那时就笑话百出。先是一个跟头摔在卧佛寺，卧在那里。然后上山时，班上一男生捡了个鞋跟问“谁的？”我开玩笑说我的。我一路毫无觉察，最后下山时发现真是我的鞋跟。我这么好面子的人怎么能坡脚而行？我当即决定自己返校。找到自行车一看，车铃竟然没了。从海淀开始，拐着脚，进一个个商店买车铃。第二天，借我自行车的同学说“某某某，你给我车还回来了吗？”我说放在你们楼下了。结果，我是把另外一辆车从植物园给骑回来了。





那钥匙能插进去可不能怪我啊。

我和三个女生骑车去稻香村公园。路上人少，我们换着花样骑车。我说“只要车不爆胎就什么不怕。”正说着，发现车没气了。不是别的，车胎爆了。

“每次跟你出门，不出意外，才是意外。”白菜说。她跟我回过我家辽宁。我跟她去过她家广西。

在广西北海，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

“手别摸上去。”看到礁石她警告我，看到我的手，已经冒血了。

我们骑车出去玩，骑着车，我发现，我胸罩的带子断了。她笑得差点背过去。

在肯尼亚，参观凯伦——《走出非洲》作者的故居，在我为东非高远的蓝天白云而感到人生壮阔的时候，我拿起电话，准备打给白菜，祝福她的生日。

我的心沉沉地下落。她已经不在这世上了。我总是忘记这点。

你真的爱一个人，ta不管走多远，都会在你身边。这就是传说中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吧。我们班会不会受了什么诅咒呢？我偶尔会想这个问题。33个同学，三十七岁时，已经离开3个了。今年，心惊地得知有人又染重症。

今年大聚，我从中美洲转英国回北京。我说了，不管我远在哪里，只要我在，你们聚，我就一定回去。

老权又弹唱吉他，我们轻轻唱和。那是我们班人人会唱的班歌。

雪梅设计的蛋糕，插着33个标签，写着33个名字。

在我们心中，我们班永远是33个人。你们永远在我们心里。是的，你成为暗物质，都会影响我的轨迹。

今年，格格的大爷，中国最后一个亲王去世了。一直被大爷视为女儿的格格，感到悲伤无助。峻峰等几个赶去陪伴她。让格格在葬礼上的发言体面周全。

曼妞被送到医院急救。老八扔下重要的会议赶去。

今年夏天我在中国科技馆讲座。当我接待完热情的观众，看到不远处向我微笑的，是雪梅一家三口，还有丽艳的孩子，我心里是那么感动。

我们一起分享，共同担当。我们团结一心，即使有诅咒，也会开始破解。

认识你们真好。若不是有你们走过，我的人生将如此浅薄。

入校的第一个月，我往《同心圆》投了一篇诗歌，发表在新生之页上。那是冰心提名的院刊。

她的先生是我们校历史系的教授，他们一家住在我们学校的高知楼。

有时，我们会穿过西门，去高知楼老师的家里。我们班普遍喜欢的老师有乌日娜，孙建军，紫薇。

教外国文学的乌日娜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老师。典雅大方，深栗色的卷发，有些像外国人。我觉得由她

教这门课再合适不过。因为喜欢老师，也就更喜欢外国文学。

有次，老师给我们班每个同学借一本外国文学名著。我是学习委员，由我借出，收还。有两个同学不小心，将书弄丢了。一想到这事，我就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想到去新华书店把这两本书买回来，补齐？后来我的书进了高校的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又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时，我想，有机会，我要给母校的图书馆捐一些书。

孙建军老师是我们班很多女生的男神。他个子高高的，很儒雅。生硬的古汉语被他讲得生动有趣。

紫薇老师很秀美，有五四学生的神韵。

大学四年，我们换了4任班主任。我最喜欢的是吴晨。他个子高高的，很帅。他和几个同学去内蒙玩。黄昏落日时，他们坐在沙丘上，诗情画意。他说“可惜燕喃不在，没有诗。”

那时的师生多么单纯。他当着全班的面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笔记本，说“我们班好几个诗人，我个人最喜欢解燕喃。我送她一个笔记本，希望她新年写出更好的诗。”

之前，我把自己写诗的本子给他看。他用不干胶把一些快散落的页面仔细地粘好。

吴晨，消息遥远，你可一切安好？

那个写诗的本子，班上好几个人看过。他们把自己的诗题在上面，也把树叶贴在上面。

我们班也写班日志。每天由一个同学负责写。

树根在上面写“今天黄昏，见解燕喃穿一紫色绸裙，美丽如新娘一般。”

彘寒说“树根，是什么样的距离，装饰了你的色盲？”

我穿的是蓝色的裙子。

有人住院了。我们不顾这是传染病，也赶去医院看望。

那时北京没有椰子。盈雄就从海南背了四个给每个宿舍一个。椰子，多重的东西啊。我们尝了，不好喝，像马尿。

大三时，男生在龙潭湖参加北京高校的赛龙舟比赛。抓了鸭子，可以带回去。男生在宿舍煮鸭子。请我们女生，也请班主任。我们把班主任灌醉，向他套考试题。

在玉渊潭划船，我们把一条船上的桨抢走了，任由船在水上漂浮。任性的曼妞，把老驴的鞋子扔到湖里……

那一个个回忆都在。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18岁的四月，我从六瓣丁香的阵阵芳香里抬头，看到的不是别的，是你，向，我，走来。

洛艺嘉

我的大学生涯



我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第一代学生，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在特殊历史阶段由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辈学者、专家、教师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的一批新人，是由新中国教育路线所培养的“走又红又专道路”的大学生。当退休之后来回顾当年的大学生涯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无愧于新中国的培养、教育和期待。

我是1960年8月底至1965年7月间上的大学。所以我的大学生涯，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这批毕业于1965年的大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在大学阶段的一些所见所历。

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完整地接受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指引下新中国的17年学校教育。因为我们是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而连续读完了6年小学、6年中学和5年大学。所以，我们这批人曾在颠倒是非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指称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

我就读的大学，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即原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在我们入学不久，就遇上了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三年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像后来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因为吃不饱、饿肚子而过着愁容不展的日子。

我觉得，在那段时期，我们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是充满希望、满怀理想的，是生机勃勃地勤奋学习的，是和谐团结、共同进步、愉快幸福的。

那时候，我校各族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卧薪尝胆、同甘共苦地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物资稀缺等困难；同仇敌忾、步调一致地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这批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本领，被培养成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人才，而且也让我们这批青年学生，留下了五年充满幸福回忆的大学生涯。

一、我考上了全国一流有特色的历史系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在我报考大学的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以其拥有数量众多的正副教授，及其所设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专业，为当时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从而跻身于全国一流的历史系。

1、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大城市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历史专业的学生。但她在最初的几届招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和从少数民族地区来的“调干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到了我报考时的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次扩大了在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江苏省等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招生，而且招的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在上海市，所招的是历史系的两个专业：民族历史和民族学；同时，都招收高中毕业生。

其实，我当时对中央民族学院，及其专业设置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凭着当年高校招生专业介绍，我毫





不迟疑地将自己的第一、第二两个报考志愿，分别填报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民族学专业和民族史专业。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被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录取。

该系1960年入学的我班同学多达80来人。其中，有不少同学来自全国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例如，在我们班上来自包括中央民族学院预科和附中的北京市学生就多达十二三名，来自上海市的有8名，天津市的2名，江苏省的5名。另外，还有从东北的哈尔滨市、沈阳市，以及西南的重庆市等大城市来的学生。

我们这届80来名的新生入学后，不仅使历史系学生人数大增，让历史系首次实现了五个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班的完整团聚，而且实现了历史系学生来源结构的变化。

2、我经过两天两夜才到达中央民族学院

我是1960年8月25日下午三点钟，乘上海铁路局专开的赴京入学新生专列，离开从小长大的上海。因为那趟火车是学生专列，所以开得很慢，要常常等让其他列车。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运行，我们在当天晚上天黑了才到达南京。

那时候南京还没有修造长江大桥，直到第二天早晨天色亮时，列车车箱才被分开来，拉上长江渡轮，摆渡过江。到达长江北岸后，又将火车连接起来，上午八九点钟时，火车才重新向北开动起来。下午三点左右在不到安徽蚌埠的野外临时停车，立即拥来一批妇女、孩童，伸手向车上的我们讨要食物，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刚受过灾的灾区。

在火车上又过了一晚，到第三天的27日下午，将近四点钟时，我们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了。不巧的是，中央民族学院设在火车站的迎新工作人员大多返校了。记得有两三位语文系的朝鲜族同学在那里守候，他们招呼我们八名刚下车的上海籍学生，告诉我们坐公交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乘公交车到学校去报到。

赶到学校后，新生报到处的工作人员也都下班了。随后跟着学校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先去学生食堂吃了到北京后的第一顿晚餐，接着又到12号楼找了一间房屋，安排我们七个男生过夜。第二天上班后，去历史系的新生报到处正式报到。这样，我们才算到了新家，开始了在历史系的五年大学生涯。

二、名师云集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院校经过调整后，到60年代初我国知名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甚至许多

大学历史系，都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历史专业。

1、我青睐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

当时，在我们一般考生的心目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历史和外国古代史专业、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春秋战国史为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专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等，都因为有自己的特色，成为报考历史专业的考生们所争抢报考的热门历史专业。

然而，我却是因为在那几年频繁看到反映少数民族文化和风情的电影，银幕上所展现的少数民族迥然不同的生活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优美的风景，从而青睐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

事实上，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作为全国第一流的高校历史系，主要也是因为它所设立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确实是当时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是一门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历史专业。

2、忆以教书为己任的历史系名师们

我们入学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就已经有了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雄厚资力量中，众多的正副教授们都同样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两个专业区分。

那时候，我们历史系众多知名正副教授们，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居的教授是不同的。在我们上学的那几年，历史系许多教授都是以教学为第一己任的，除系主任翁独健和副系主任林耀华外，其他诸如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以及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程溯洛、陈永龄、邝平章等众多教授，都是亲自上讲台给我们上课的。

给我们上课的历史系知名教授们，都以各自渊博的知识和专长的学问，以他们多年钻研的学术心得，对我们进行殷切的教导和仔细的指引。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和指点，一直是我们这批学生此后数十年各自在发展道路上永不休止的前进动力。

特别是，当时我们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才华横溢中年讲师。他们都已登上教学第一线，风采万分地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传授知识，他们的讲课也深受我们的欢迎。兴许是因为年岁稍近的原故，这些中年老师平易近人的态度，更容易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例如历史学方面的李文瑾、孙钺、苏晋1961年作者留影于北京八达岭长城仁、贾敬颜等老师，民族学方面的施联珠、宋蜀华、黄淑娉、朱宁、王辅仁、

吴恒，以及傅乐焕先生的夫人陈雪白老师和陈凤贤等老师，都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每次返校必然要去拜访的师长。

需要一提的是，因为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具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历史系的许多教授们，也同时有历史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的区分。比如在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中，在历史学方面



的有：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邝平章等教授；民族学方面的有傅乐焕、石钟健、程溯洛、陈永龄等教授。此外，当时历史系还有一些担负着研究等任务，一直没给我们上课的知名教授，如：历史学的胡德煌教授，民族学的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教授等。

3、在迎新会上初见知名学者

大约是1960年8月30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召开了迎新晚会。当时中央民族学院，除了语文系有几位教授外，其他的教授几乎全都云集在历史系。历史系拥有众多正副教授的雄厚师资力量，让历史系尤其显示其俊杰毕至、名师云集。所以，学校和系的领导，对我们这届新生入学的迎新会分外重视，特意让历史系的教授们全体出席。于是，这次隆重的迎新会，给我们这些刚步入大学的青年学生留下刻骨铭心的终身回忆。

在迎新会上，对我们青年学生影响最深的，当然是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专家教授们。尤其是历史系主任翁独健先生优雅的风采，他那风度翩翩的雅量趣谈，让我们至今历历在目。只见他身披风衣、手持烟斗、挺身站立、侃侃而道：我叫翁独健，就是一条腿“独健”。顿时之际，发出一阵

轰堂大笑。

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与对之尊敬仰慕的莘莘学子、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与求知若渴的芸芸学生、众望所归的校系领导和他所领导的师生之间，顷刻之间融为了一体。

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到南池子住所造访原系主任翁独健先生时，还曾与他谈及当年入学时的事。老先生依然如故地和蔼可亲，风趣依旧地微微一笑道：你还记得这么真切！那个时代的大学问家，就是这样真有学问却毫无架子的。

4、亲聆知名学者的授课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在当时是属于全国第一流的。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得以聆听许多知名专家教授的亲授。他们对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受。

学校十分重视对我们的基础课教育。历史系为了加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门通史课的教学，由张锡彤老先生亲临教授我们的世界古代历史，徐宗元先生亲临教授我们的中国古代历史。这是两位教授都是学问渊博、功底扎实的老专家，更是两位令人钦慕、受人尊敬的学者。

世界古代史专家张锡彤先生

张锡彤教授是驰名的世界古代历史专家，由他翻译出版的苏联专家柯斯文著《原始社会史》，至今仍是中国这方面的权威专著。当时年近60的张先生讲课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而且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十分好记笔记。许多邈远朦胧的世界远古历史，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述后，让聆听者难以忘怀。

四十多年后的2008年，当我和老伴去埃及时，面对古老的卢克索克尔纳克神庙，以及雄伟昂然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时，正是浮想起当年张先生所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知识，才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埃及古代文明与我们华夏古代文明之间的关联，进而做出一些比较研究，撰写出几篇比较研究的文章。

中国古代史专家徐宗元先生

相比于张锡彤教授，当时的徐宗元先生才四十出头，显得更为年轻有为。据说，徐先生是在三十多岁时就被评上了正教授，是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正教授。徐先生专攻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远古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他能将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讲述得非常生动有趣，所以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只是他那风趣诙谐的讲叙，经常弄得我们乐滋忘情，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自己记笔记的手。往往是听到下课铃声响后，才又后悔没能记下这一堂精彩的中国古代历史笔记。

尤其难忘的是，徐先生常常会在讲课时，时不时地在堂上提问。内容就是他刚教授过的重点，这样做，



一方面是检验他自己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们的听课情况；另一方面也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样的课堂上交流，也是我们欢迎徐先生的原因之一。比如，他有一次就通过课堂交流，向我指出我的老家“无锡”之名的来由。不过作为后生学子，我却一直不好意思向他回应，我的祖籍并不是他所误以为的泰伯所至梅里，而是越王所辖的东海滨地。

徐先生对于有些上课经常思想开小差、看小说，或做其他事情的学生，也是洞若观火的。通常，他对这样的学生，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对他们看上几眼，以示和蔼的招呼。但有的时候，兴许是某位学生表现太过分了，先生会向他提个刚讲过的问题，请该生起来回答，若回答时不知所云、或者“答非所问”，先生就会让他在自己座位上暂且站一会儿。

由于徐先生的出色教学和悉心指导，我们班上立即产生一批酷爱中国远古历史的同学，我和有些酷爱中国远古历史的同学一样，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深奥的中国远古历史的研究，也是在浓厚的兴趣促使下，就在上大学不久的一年级时，经常利用课后时间，去图书馆查阅和收集“正史”之中有关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史料。

正是我在大学时期，得益于徐先生的悉心教导，打下了一定的中国远古历史基础，才让我在退休之后，能够专注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居然得以自己之力，梳理廓清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线索，勾勒出了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轨迹，撰写出关于中国传说时代伏羲、女娲和炎帝、黄帝、蚩尤等华夏始祖的系列文章。连贯系统发表了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古代炎黄子孙与不同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互相学习、彼此汲取，共同融合，如同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从古代华夏逐步发展壮大，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后，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形成现代汉民族的学术论文。

5、令人难忘的老教师们

那时历史系的老师，普遍受到学生的拥戴。因为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学生，不像如今有一些“教师”（“叫私”）那样，常向学生索取。当时几位教学颇有特长、对学生亲切入微的老师，会令我们长久难以忘怀。英语教师徐先伟先生，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时刻想念的一位老师。

英语教师徐先伟先生

1960年入学历史系的，我们这个80来人大班中，大部分同学是在中学里学习俄语的，只有14人是在中学里学习过英语的。所以，每当上外语课时，

60多人的大部分学生，自然占了平时上课的大教室，而只有14人的英语班，就只好到2号楼语文系的小教室去上课。这就在无形之中，显得我们这14人的英语班与人数众多的俄语班有点不同。

我们英语班的“不同于众”，主要还是因为给我们上课的英语老师徐先伟先生，是位不同于众的好老师。徐先伟先生不但是位英语口语流利、英文功力深厚、教学有方的、赴美多年的归国学者，而且更是位为人谦和、待人亲切的慈母般师长。

令我尤其难忘的是，正是徐先生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才让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英语水平跃升班上前列。在徐先伟先生鼓励式的教学下，我的英语成绩几乎是从班上的末位，飞速跻身到班上的前茅。徐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我难改浓重的吴语越音，加上受“洋泾浜”式英语的发音影响，着急时有些音会发不出的情况。于是，他就在教学中不让我像有些同学那样花



大力气去注重口语朗读，而是指引我下功夫进行书面阅读，通过阅读去掌握大量的单词，再进一步来提高阅读能力。就这样，徐先生让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英语的方法，使我在大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每次英语考试成绩也稳居大多数同学之前。

在徐先伟先生的教导下，我们英语班14个同学亲如兄弟姐妹。每个星期大家都特别期盼上英语课。几乎是上着的英语课还未下课，又在期待着下一次的英语课了。徐先伟先生很关心我们的成长，看到我们课余演话剧的海报，也会高兴地与我们交流一番。

我特别记得1962年的春节，徐先伟先生特意将我们英语班的七八个没回家过年的学生，邀请到她在中关村的家去，为消除我们过年时对家人的思念，专门给我们介绍西方美国人的过年情况。因此，在我们毕业时的1965年8月，我们英语班的14个学生，谁都没有忘掉已经有三年没给我们上课了的徐先伟先

生。我们特意在离校前，专门找到这位尊敬的老师，与她合影告别。至今我仍珍藏着这些与徐先生的告别合影。

世界民族志老师戴可来先生

还有一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师，是当时的青年教师戴可来先生。戴先生是历史系学识广博、才华横溢的一位老师，他好像是1958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参加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后，来到我们历史系的。他在1964年9月作者（前右一）与戴可来（前中）等同学在广西实习期间留影于桂林七星岩那时给我们开设的“世界民族志”，是一门从无人上过的、开拓性的新课程，从上台讲课到编写讲义，都是他一人的亲力亲为。至今我还收藏着他当年编写的《世界民族志》讲义。

他曾带领我们到广西百色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实习调查。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他一个一个瑶寨、一个一个壮乡，查看我们的实习村落和生活状况，从中择定编写的家史和村史素材。

书稿写出后，为节省实习经费，他便和我们一起住进县政府礼堂的后台。天天挑灯夜战，并将完稿的家史、村史，亲手刻成蜡版，油印成册。

直到我毕业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偏远的广西竟然不知深浅地向他索要“评法批儒”的资料。戴先生费心地给我邮寄了一些当地少见的资料，还婉约告示我怎样阅读这类材料。

尊敬的戴先生，我一直铭记着我们的相处，更期盼着您的再次面命耳提。

三、我们大学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

我认为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高等院校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社会上好像有这样一种现象：是不是有些人总喜欢怀疑、或者是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于不愿承认过去行之有效的、正确的事情？他们动不动就对自己以前所经历的、或者所做过的事，都要拿出来批判一番才好。

其实，高等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这原本就应是高等学校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一项基本工作和重要手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毫不动摇地“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

1、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

回想起来，在我就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高校，都是非常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而且，当时学校对大学生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是丰富多彩

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取得的成效也是十分明显的。

拿那时中央民族学院对我们这批大学生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来说，许多内容至今仍令人难忘。我们这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夕毕业的、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的在校大学生，大多都经历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党所发表的方针政策，以及学习“反修批修”的革命理论；听取过一系列生动活泼的形势报告及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报告；经历了国家遭遇暂时的物资缺乏等困难，经受过各种考验；而且还参加过当时以“四清”名义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运动。

我们这批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不仅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克服了当时遇到的各种困难，经受了各种考验，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为革命而学习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让我们这代人确立了以讲贡献为荣的奉献精神，以及对待工作认真、忘我的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形成，从而深刻而久远地推动着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

2、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我们上大学不久就遇上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正式出版。于是，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活动中，我们立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深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活动。所以，我们大学第一学期开学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成了我们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刚上大学时购买于1960年11月9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每当看到这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就揭开了我们当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时的美好回忆。

当时我们把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简称为“学毛选”。那时候是每周六天工作制，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上午均是上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各门课程的教学。而六个下午的安排则是：两个下午政治学习、两个下午业务学习、一个下午文体活动，以及星期六下午的自由活动。

有很长一段时期，每星期二、五这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主要就是学习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方式是按小组，一人读，其他人跟着边听边看，有时也由个人阅读。这样的学习，确实有着“立竿见影”似的显著效果，特别是由于年轻时的记忆力强，有些毛选四卷中的文章至今仍未忘怀。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代人中有不少人都能随时背诵着毛主席著作，来批评别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3、革命前辈教导我们克服暂时困难

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我们当时政治思想教育，还有常态化的理论学习。在1960—1962年，也就是我们上五年大学的前三年，遇上了被人们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是，即使是在那时食品匮乏、物资供应单调的形势下，我们这些并没有吃饱肚子的大学生，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埋怨、厌世和怨天尤人的消极情绪，甚至丝毫没有愁容不展的面目出现。相反，我们这批大学生自始至终地满怀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树立起美好的理想，努力地勤奋学习革命理论，愉快而生机勃勃地生活。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上大学时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请革命老前辈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来教育我们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教导我们青年学生要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要树立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远大革命理想。

20世纪60年代的中央民族学院，拥有许多经历长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革命老前辈。当时这些被我们尊称为老红军、老八路的老革命，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爱戴。所以，面对食品和物资匮乏、学校伙食单调等困难的实际情况，学校经常请校内外的老红军、老八路，讲叙他们的革命生涯，指引我们树立革命理想，接好革命事业的班。

那时全国各地城镇一度粮油紧缺、食品稀少。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的米面粮油和禽肉蔬菜等食品，突然难觅其踪迹。不过，国家很快就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国城镇居民的粮油肉蛋等主要食品，以及布匹棉花

等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有计划的定量供应，有效地保障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供应。但在定量供应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食品供给。当时即使是有钱，也从未买到计划供应外的食物，不要说我们这些没有收入的学生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三年中似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每天在学校吃的饮食，基本上都是五个玉米窝头加两盘煮白菜。那就是：中餐和晚餐各两个窝头加一盘煮白菜，早餐时一个窝头可配有一两大米粥。过了一些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星期好像有一两次正餐，会在煮白菜里加了些动物性的荤菜。当时听说，这是有一位可敬的学校领导，向西北某地要了一些骆驼下水，来改善我们青年学生的伙食。

在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确实是遵循了革命前辈们的教导和激励，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卧薪尝胆地克服了粮油和物资缺乏等暂时困难。也正是因为革命前辈们的教导和激励，才使我们这一批在当时正处于体力旺盛、食量亢进时期的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每天吃着贫乏单调的食物，听着自己的饥肠辘辘之声，却没有出现怨天尤人和愁容不展的情况。

4、老专家激励我们树立理想，走“又红又专”道路

在学校请来给我们作报告的革命老前辈中，有时任农业部长的陶如笏、团中央书记的王照华，以及国家民委和许多部委中受人爱戴的革命老前辈。这些革



命老前辈，同样也是当时中央部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这些受我们敬慕的领导，大都是以自己的革命亲历来给我们做怎样树立革命理想的报告。所以他们的报告对于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时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些生动活泼、令人难忘的政治思想教育，当时对我们这代大学生来说，的确起到了引导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树立了为革命而学习的宏大理想。所以同学们都精神焕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满怀着自己的理想而勤奋努力地学习，生机勃勃地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在各级领导的理想教育鼓舞和要求下，同学们为了克服国家暂时的物资缺乏等困难，纷纷在学校的安排和组织下，都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寻找空地“开荒种菜”。其实，像这样的开荒种菜等劳动，对我们这些来自城市、从未经过农事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种在精神上带来愉悦的教育。同学们通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种菜活动，享受着的主要是劳动带来的愉快。

在各民族师生有共同理想的氛围下，各民族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姐妹，课堂上老师生动地讲课，学生们安静地认真听课。课余时间虽然学校考虑到人们摄入的食物较少，人体产生的热量不足，不主张同学们进行体力消耗量较大的赛跑、足球等剧烈的体育活动，只是提倡做做广播体操。不过，无论在教室还是在宿舍，还是能经常听到同学们昂扬的歌声。这就是我们当时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所产生的卓著有效的实际成果。

理想教育让学校各民族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通过各级领导的理想教育，我们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民族同学，认识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学最大的共同理想之所在。

学校除了聘请的校外革命老前辈以及苏克勤书记给我们做报告外，我们历史系领导也经常请校内其他的革命老前辈和老专家，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

记得历史系领导聘请的几位校外前辈专家对我们进行理想教育时，就有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先生这两位史学界的前辈老专家。他们给我们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我们走“又红又专”道路，而不要只红不专、或者是只专不红。

韩儒林先生是与我们历史系主任翁独健先生齐名的，这是两位南北齐驱、驰名于时、名闻海内外的蒙古历史专家。也许是出自他们两位是至交，那次韩先生的报告，似乎还是在他紧张的旅途中见缝插针地安排的。多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夜间，我

在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北京市某招待所拜见韩先生时，谈及那年他来民院历史系做的报告，老先生还记忆犹新地数谈起当年的事来。

不同于担任领导干部的革命老前辈多着重于革命理想教育。这几位学有专攻的前辈老专家，则是根据当时历史学科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具体而深入地教导我们，必须要在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掌握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料，深入周到地钻研历史。要求我们既不要做空头政治家，更不做只研究历史而不讲政治的人。要努力将自己培养成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

正确的革命理论和扎实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这代人以历经久远的影响和启迪。上世纪60年代对我们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对我们这代人提高思想认识，正确对待并克服当时遇到的暂时困难，起到重要的作用。它还进一步指引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

回想起身为革命老前辈的这些领导们，以其亲历亲为和言之有物的生动报告，不仅让我们在当时接受他们的报告，而且他们在报告中用生动语言讲出的，至今仍令我们记忆犹新、浅近而又深刻的哲理，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5、难忘校党委书记苏克勤先生的教导

学校内的许多革命前辈，也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对我们言传身教。今天回忆起来，其中给我印象较深、也是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时任院党委书记苏克勤笑容可掬的音貌。

苏克勤书记是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老革命，在我们青年学生中声誉很高。我们确实很喜欢听他所作的报告。因为他的报告不是空洞无物的“泛泛而谈”，而是确能为我们解惑、释疑的，有很大针对性的报告。

当时有一阵，只要是接到去大礼堂听报告的通知，我们总是兴致勃勃的。因为那很有可能就是诙谐可亲的苏克勤书记作的时事形势报告。他言传身教式的报告，不仅言之有物，更是妙语联珠。他那生动诙谐而有针对性的报告，常让人们听着、听着，会不时爆出哄堂大笑。

记得有一次，他坐在大礼堂的高台上作报告，出于关心地对我们说道：现在你们进食少，最好是少活动、少喝水。正巧，他却端起面前茶杯想喝水。但马上又放下杯子，还风趣地说：像我今天这样喝水可不行啊！台上台下顷刻之间便爆发出会意的大笑。

当时还曾听说，也就是这位可敬的学校领导，为了我们这批青年们的健康和成长，通过关系向西北某地要了一些骆驼下水，来改善我们青年学生的伙食。那时，端着碗里飘散着些许黄色油花的菜肴，兴高采烈的喜悦丝毫不亚于如今吃着大鱼大肉。



不料，这位受人尊敬的学校领导，在那个年代居然为此遭遇了举报，因而受不公正的待遇，被调离学校。有一年，我们去藏传佛教名刹塔尔寺，当我途经他调至工作所在地的城区大街，见到路上满眼的“人遗失”时，不无感慨地向同行的老伴叹息世态不公之至。

后来，过了四十多年，到了200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这位早已失去了当年英气、显得步履蹒跚的前学校主要领导人，被会议主持人介绍后，他面向我们站起来之时，却受到我们这批如今也都老态龙钟的、当年的青年学生们所发出的长达近十来分钟的、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

这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何尝不是向大家、尤其是向下一代人表明了，经历过艰难时期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认定自己心目中早已确定的老前辈、老专家及可尊、可敬的学校老领导们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永志不忘的革命心情。

6、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当时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还有及时传达和学习讨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像当时党和国家公布的有关农业、工业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一些政策调整，以及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等，都是我们政治思想学习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好像从1961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与前苏联及东欧等现代修正主义国家及其政党，以及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政党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矛盾。我们党和国家在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反修防修”的教育。因为，随着矛盾的激化和斗争加剧，以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的深入，党就开展了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育，以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就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的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样，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注入了新的重要内容，那就是及时学习党和国家发表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诸如：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反修文章。

先是在我们刚上大学后的1960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1957年11月，第2版）。此书的内容包括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

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参加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利用在莫斯科的机会会见的讨论各党关心问题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平宣言》，以及附录——《伟大意义革命宣言》（人民日报社论）。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开始后，我们党就发表了许多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

到我们二三年级时的1963年，连续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合写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连续九篇被号称“九评”的著名反修文章，把反修修的斗争推入了一个新高潮。尤其是这些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发表，往往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葛蓝这样的老资格的优秀播音员，以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中时，大家感到十分振奋。

直到1965年6月4日，当我们毕业离校的前夜，还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络绎不绝的理论学习中、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度过了自己大学生涯的。我们也是名符其实的把毛主席著作和革命理论，从入学一直学到毕业的一代人。

不算是结束语的话

到了我们大学生生活的后两年，也就是从我们大学三年级开始，全国各地城镇居民，特别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民的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观，各种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供应，已经逐步丰富起来了。

回忆上大学时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确赶上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代。我们看着新兴的共和国在成长、在发展；我们在经受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全面教育后，也愉快地分别奔赴到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单位去了。我们是无愧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承上启下的新一代。

徐亦亭

预科二十年碎忆



我是八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到中央民族学院预科工作的，开始做行政秘书，后来任系副主任。迄今自己退休虽已有十六年之久，但常常魂牵梦绕的还是在预科工作时的那些人和事。刚到预科时自己就了解到，预科创办初期条件曾十分艰苦，预科教职人员是白手起家编写各类教材和完成教学任务的，五十多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各类人才。这些情况深深教育和激励着我，也使我决心尽快适应预科工作需求，在本职岗位上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做出成绩。

我到预科后，先接替了郝天职同志的行政秘书工作。他是一个纯朴而又非常能吃苦的藏族同志，自建校初期就参加了学校工作，且一直负责管理藏族学员和学生。据他介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预科二部招收藏族学员逐年增加，到1960年年初人数达到一千多人，那时被称为预科办学的“第一个春天”。但当年所招学员成分较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结构差别大，因而培养目标和学习时间也长短各异。其中有一批藏族学员刚入学不久，就响应号召返回西藏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的运动。另外，那时每期学员中总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因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患肺结核病，给管理工作带来困难。但郝天职同志不辞辛苦，常深入学员生活，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他的爱人阿旺同志也是预科的藏族老师，夫妇俩携手学员管理工作，多次往返西藏北京接送生病的学生。文革后阿旺同志在预科管理资料，遗憾的是她退休不久就去世了。在预科工作中，姬达老先生亦是我学习和崇拜的对象。他是回族人，待人和气没架子。作为

管教学的副主任，他对预科工作了解很深很细，具有多年的管理和教学经验，经常和马树钧、陈雅阁等教授细心研究教学和教材问题。姬达老先生也是建校初期来的，编写预科历史本该是他执笔。但为了锻炼我，他有意让我来写，由他负责介绍情况。老先生文笔很好，许多行文、报告材料从不打草稿，总是一次成文。对此，我特别佩服，也决心把这个本事学到手，但这谈何容易！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我也只是学到皮毛而已。姬达老先生早年身体欠佳，中药吃了好多年，退休后不久就又病倒了，一直未能康复。其间，我去看过他多次。1996年他临终之时，我在他床边，亲眼见他吐血而逝，甚是悲怆。他享年才七十岁，走得似乎太急了。预科的任吉声老先生待人谦虚和蔼，是我非常尊敬和怀念的朋友。我到预科后，任先生负责学员和老师们的生活管理工作。当时他已年近六十岁了，住在城里，每天早早地来到学校，从未迟到早退过。他的书包里总装着大串的钥匙，每日奔走于学生各宿舍之间，为学生解决一个又一个困难。他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不管哪位老师求他办事，他都是有求必应，包对方满意。见他太辛苦，我和李希元同志就主动帮忙，脏话累活就一起干——我们毕竟比



他年轻许多！李志慧、刘采繁和侯英杰同是教汉语的女老师。她们在教学中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她们是退休的女老师中年事较高但身体还不错的几位。志慧老师还经常见面，不管多忙，见了面总要多说几句。我老母在世时和她很说得来，并反复嘱托她要对我多加帮助。所以志慧老师二十年来没少帮我。





预科新生与本科新生不同。前者到学校后并未真正进入本科的门槛，学习、生活也没有缓冲期，加之刚刚步入首都大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事情都需要老师的具体和耐心指导。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预科教学有了新的模式。从1984年开始，除计划内学生外，新疆还送各类、各专业的学生来预科学习汉语和其他基础知识，且人数逐年增加。到八十年代末，预科接收新疆各类代培生和计划内学生已达六百多人，在校生人数为学校各系科之首。这是预科办学以来的又一“昌盛”时期，被称为“第二个春天”。学生多了，管理任务加重了许多。当时预科主任是接替王超同志的郭广瑛同志（郭主任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经验丰富，考虑问题周到细致），预科总支书记是接替沈昌荣同志的居玛洪同志。居玛洪同志是维吾尔族，他和郭主任一党一政配合得很好，如在选择班主任工作中大胆启用年轻有为的老师和行政干部。记得“全国班”有何桂兰、黄宁、李松、孙桂玲、揣素清、屈



平平等人，而“新疆班”有阿布拉江、艾加尔、阿米娜、帕夏克孜、佈仁巴择尔（寒青）等。还有几位教新疆同学汉语言的老师如陈作红、徐建等。我也管过一个新疆干部学习班。该班学员都是略懂一些汉语的基层干部，入学后一直由我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和各项活动。为了使他们住的舒适些，我费了不少力气腾出一些暂时闲置的房间，打扫干净让他们住宿。佈仁巴择尔是蒙古族，又名“寒青”。他十六岁来民族学院时还“一个汉字不识，一句汉语不会说”学生，毕业时已是汉语流利的优秀学生。1971年他被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录取，十年后又转业到民族学院。他的语言天赋极佳，在长期与新疆同学接触中虚心好学，又善于交流，逐渐掌握了维语，故而很快能胜任新疆班的班主任工作。学生们很乐意与他交心、畅谈，他的激情也不时地感染和鼓舞着学生。因工作表现突出，1988年他被调到民族学院外语系任党总支书记。

三

预科的行政人员除领导干部外，总保持在十三人

左右。他们承担着教学、生活、财务、共青团、资料管理等多类工作。大家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遇有急项工作就同心协力共同完成。比如，为了改善工作环境，大伙亲自动手粉刷办公室。有些重活脏活还多亏刘铁军、黄卫平等男同志。行政人员中不乏优秀的文艺骨干，先有寒青、宋杰和李松同志，后有董秀芳同志。故预科曾以《希望的田野上》、《英雄儿女》、《前门情思大碗茶》、《长征组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歌曲演唱以及迪斯科比赛第一的优异成绩享誉全校。刘希敏主任也是个多面手。她接替郭广瑛工作后各项开展的很活跃。在学校历届运动会开幕式上，预科方队步伐一致、服装整齐、精神抖擞，屡受校工会表扬和其他系老师们的赞许。预科老师中亦不乏体育积极分子，如李松、揣素清、柴会铮等。他们跑前跑后，发动群众，人人报名参加项目，比赛总分每次都在前三之列。文体活动也是我的长项，我当然得认真组织 and 带头参加。在行政干部中，我要特别写写我的同事李希元同志。她比我来预科稍晚，接替我的行政秘书工作。因工作耐心细致，领导又把计算教学工作量的任务给了她，等于让她行政教学“双肩挑”。她毕业于太原机械学院，山西人，有较重的山西口音，待人谦虚、和气、有耐心，作风严谨正派，与同志关系融洽。不管哪位老师有事求她，她都竭力去办。因为有她，我的担子减轻许多。

四

预科至今已走过53年的光辉历程，培养各类学生近两万人。1978年后，民大预科生先后被送往全国六十多所重点大学七十多个专业学习深造。如今，从民大预科走出的毕业生已遍布全国多地，而人数最多之处还得数新疆和西藏。

在1993年民大预科成立40周年之际，为了改善预科的教学条件，我曾撰文汇报民大预科的教学成果和基本情况，发送给各大区民委、教委以及有关院校，以求得到支援。此举收到了十几万元的赞助。为了开阔眼界，我曾组织预科老师到过天津南开大学及山东济南等地参观游览，均受到当地民委的热情款待。我退休之前，阿布拉江同志又组织预科老师去新疆旅游一次，也受到新疆教委的热情接待。我从预科退休后，除李希元外，很少与预科其他退休同事接触了。最近几年因老伴生病，我也很少外出，闲暇之余的回忆难免有误，但绝无沽名钓誉之想。在预科工作的二十年里，我不求名利、尽力而为，做的都是责任所在的事，好在没犯大错，心已足矣。这就够了，尚有何求？正所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2016年夏至

高栋昆

从这儿打开新闻之门

——回忆中央民院八十年代的汉语系新闻教育点滴

一回首，告别校园已经二十多年，母校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无数的人才。每个学生的经历、成就都会不同，相同的是：都忘不了理想发芽地方——中央民族（学院）大学，从这儿我们打开新闻之门！

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创办于1984年，在那个年代新闻专业比较少，人大、复旦是第一档次，再就是中央民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北京广播学院（采编专业）和极少数省的院校例如河南、江西有新闻专业。少而热门，很多同学把新闻专业作为自己的首选志愿，录取分数自然高。师资和教材的缺乏是当年大部分院校新闻专业的普遍问题，院领导十分重视新闻专业，大量从校外聘请老师，一些教材是由老师编写的油印教材，在教学上舍得投入经费，支持教师开展学术研究、大胆探索，鼓励学生动脑、动手，让人记忆犹其深的是：以自办报纸的形式学习新闻业务。

当年由汉语系学生主办一刊两报：《同心圆》是文学类刊物，《大学生报》由教务处出经费汉语系学生主办，后由于经费问题停刊。院学生会提供经费的《麦克风》也是由汉语系学生主办。这两份报纸都是侧重于新闻，是同学们放飞新闻理想的练习场。

记得我刚进校的时候，85新闻的师兄师姐们要找一个会摄影的人，我就从许兰师姐的手里接过了一台旁轴取景的华夏相机（其实我也只是初学），拿着它就开始拍摄校运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我们班的李晓东同学从师兄师姐的手上接过了《大学生报》报纸主编的任务。当时的教学内容和采编实务有很大差距，一年级主要学的是新闻理论、新闻史等。如何选题、采访、写作……那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还好当时李晓东同学家里有个好老师——他父亲李耀宗先生，李先生在中国文化报工作过，当时在院出版社做领导。晓东同学聪明好学，从父亲那儿学了一手，编辑部的组织架构、任务分配、采编印刷等按照报社的样子依葫芦画瓢。我记得画版就是他教大伙儿的，连画版纸都是他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当时觉得很神奇，怎么可以将文字按照想排的样子放到框里不多不少呢？还有“报头”、“报眼”……一堆新名词，让我们好奇、





兴奋，干劲十足。报纸的印刷无法按照正规报社的做法——制版印刷，我们就到院印刷厂找赵立新同学的妈妈（段阿姨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第一代歌唱演员，当时在印刷厂任书记），她给我们安排工人打字。我们再把打印出来的文字剪下来，到民族研究所用复印机缩印之后剪成各种形状，贴到一张16开小报大小的纸上，再复印成报纸。照片直接复印效果略差，也还凑合。制作成本高，复印的报纸数量有限，主要用于张贴在校园的各个显眼位置。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一张反映身边事的四版小报确实让学生们“喜闻乐见”。

快速学习新闻写作的“老师”是一本全国历届优秀新闻作品选，介绍了各种类型的新闻作品，还可以模仿各类报纸，比如《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等，一般动态类的新闻易写，但每一期报纸如果没有通讯和言论似乎说不过去，这恰恰是最难掌握的。我记得李晓东同学在我们接手《麦克风》的第一期写了篇言论《糜不有初，鲜克有终》，表达了我们要不仅要开好头，还要保持热情，把报纸办好并一直办下去的决心，回想起来这也是当时写得最好的一篇言论。我们的报纸贴近生活，思考现实，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是学与做结合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段办报经历为大四的实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积极参与办报和采写新闻的同学，进入新闻单位上手快，独立采访的能力较强，发稿量也大。汉语系的大学生报还吸引了其它系的新闻爱好者参与，法律系的同学李勤写过一篇通讯《“织”起来和“砌”起来的世界》，反映了当时女生爱织毛衣、男人爱打麻将的现象，提出思考：我们的大学生活是不是应该这样渡过？在学校里引起强烈反响。

民院新闻专业的研究和教学有自己的特色。当时大部分老师从外面聘请，记得教我们新闻理论的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老师，没有教材，但学生感兴趣，笔记勤。老师讲了美国的新闻理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淘大粪者”、“水门事件”……以至于后来我们有点看不进隔壁大学教授写的《新闻学》。当然，我们记得最真切的一句话是“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从此扎根。

我的班主任白润生先生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第一人，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新闻一线工作，民院新闻专业创办后才转为教学，是第一批本院的新闻专业教师。白先生对学生亲切和蔼，对教学一丝不苟，他的专长是新闻史研究，当时他的《中国新闻史》还未成书，给我们授课用的是油印本。课堂上我们知道了《邸报》是中国第一份报纸，《伊犁白话报》是中国第一份少数民族报纸……白先生对历史研究深、古

文功底厚，讲话写文章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厚积薄发，让我们感受到学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想起一件趣事：我班有位同学经常在早晨背古诗，没起床的同学嫌吵不高兴，结果是你一首我一首，斗起诗来，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可见一斑！

教新闻采访的刘向群老师注重实际技能、别出心裁。他借来摩托车教学生，让我们提前学习驾驶技能，还打算争取让系里开设汽车驾驶的课程。尤其是野外生存的训练，刘向群老师教我们在如何野外辨别方向、如何在黑夜里看清道路和地形……当年的海淀还有农田和村庄，在一个只有微弱星光的夜晚，刘向群老师把学生分为三组，分别到指定地点找到纸条，再看哪一队先到集合点，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依旧。当时好多大学的新闻教学是没有电视摄像课程的，更不说剪辑。刘老师不知从哪儿摄像机来，教同学们了解掌握基本的摄像技术，阿不力米提同学在电视台实习过，成了他的“助教”。刘老师还从院电视台请来摄像，让我们体会采访和被采访的感觉，当时好多同学对着镜头要不就不说出话来，要不就是不敢看镜头说话，旁边的人掩着嘴笑。

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新闻摄影专业和图像专业的大学之一。从一开始学校在摄影教学上就舍得投入，海鸥DF相机两个学生共用一部，有专门的摄影实验室（其实就是暗房），用的胶卷是刘多老师用盘片自己装的筒卷。我们第一次集体到圆明园拍摄，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没几个人的曝光准确，因为没有配测光表，相机也没有测光功能。甚至好多人对焦都对不准，相机也拿不稳。要想获得曝光准确、影像清晰的照片已不易，更高要求的构图、光影、主题之类那就看以后的修炼了。相比现在，当时摄影确实首先是一门技术，门坎较高。给我们上课的摄影老师有杨曙光、凌飞、李建中等，他们十分鼓励学生从事课外实践和学习，1988年1月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展出，老师要我们去观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那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新闻摄影的大门，要知道那个时代国内的新闻摄影还停留在摆拍、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上。

一回首，告别校园已经二十多年，母校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无数的人才。每个学生的经历、成就都会不同，相同的是：都忘不了理想发芽地方——中央民族（学院）大学，从这儿我们打开新闻之门！

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87级新闻专业 马操

不可复制的 进藏招生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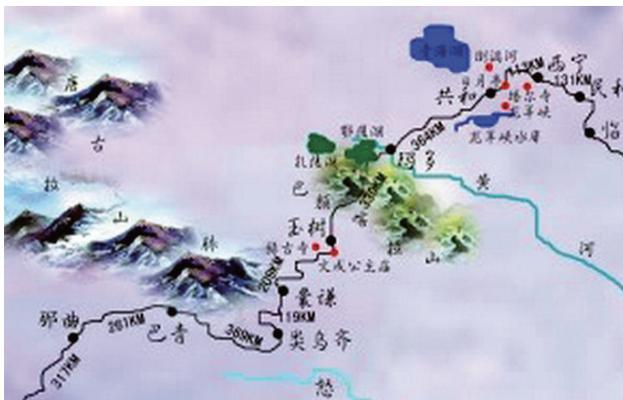
1962年，为了给西藏歌舞团培养乐队队员，系领导安排我和何金祥老师去西藏招收学器乐的学生（预科班）。具体任务是从当地小学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名额约三十人。领导告知我们有问题到拉萨后与西藏歌舞团领导商量，别的什么都没有交代。当年，我们只听说参加西藏叛乱的残余分子还在暗地里活动，西藏的经济情况也不怎么好。由于我们对西藏的特殊习俗、自然环境和高原反应等情况一无所知，故而没有做好进藏的物质准备与精神准备，只带着一心完成招生任务的热情，像往常到内地招生一样匆匆出发了。

一、艰苦的行程

当年7月，我俩一道从北京坐火车先到了兰州，在兰州的西藏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两天，又坐火车整整一天（火车开得特别慢）到了酒泉瓜州的“柳园”。柳园没有楼房，只有汽车站与招待所。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很早坐上汽车，中午到达了敦煌汽车站。我们在敦煌的招待所住了一天，又坐上了一辆拉物资的解放牌卡车赶路。经过当金山口时，我们看见一条“长线”——戈壁土路在拉长。在这条戈壁土路上，我们整整跑了一天才到达了位于青海的大柴旦汽车站。这里原是苏联援建的较大城镇，苏联专家撤走之后，这个城镇几乎就荒芜了，没有门窗的楼房

一大片，只剩下没有多少工作人员的汽车站。只见远处有一面较大的湖，那是雪山上流下来的水形成的。湖边围绕着一片草地，还可以看见羊群。第二天很早我们又出发了，汽车下午时分经过察尔汗盐湖。一眼望去，附近似乎有一片被开垦的土地。可司机却说：“这里挖不到半米就有盐，一根草都长不起来。”汽车开到一段路后，司机停下了车，也让我们下车看看。只见他拿一把铁铲，走到十几米处一块翻开的白色“大冰板”（盐）前停住脚步，用铁铲把“大冰板”弄碎，然后一铲铲地往麻袋里搓。在继续上路后我问司机，麻袋里的盐做什么用？司机说藏族人的饮食中要用这种盐。

下午很晚，我们才到达了格尔木。格尔木城市不大，但有树，有马路，有楼房，汽车站也较干净。城里的楼房看上去很分散，但有医院，还有商店。街上老百姓不多，解放军较多，偶尔可辨识出有塔吉克族牧民。我与何老师沿街走，竟发现了一间挂牌子的朝鲜族私人医生诊所！进屋一看，小小的屋子里堆放得很满。我用朝鲜语问候这位医生，他很吃惊。他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从北京来，去西藏出差。”我问他：“在格尔木还有朝鲜族吗？”他说：“没有，就我们一家。”我又问：“有人来看病吗？”他说：“很多塔吉克族牧民来看病，他们没有现金，看病就拿几只羊过来付诊费。”我继续问：“他们为什么不



去大医院？”他答道：“可能没有钱的原因吧！”之后，他让我留下来，说请我喝酒。我心里想不明此人底细，觉得还是谨慎些好，便客气地说自己还有事，没有时间了，便离开了他家。

我们在格尔木汽车站招待所休息了两天，适应高原气候后，继续乘车向西藏进发。汽车爬山开得很慢，跟快要坏了似的。我们心情很紧张，开始头痛，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了，难受得不得了。当时若有巧克力、阿司匹林、氧气袋就好了，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司机是从上海来的小伙子，多年跑运输物资已适应了高原气候，任何反应也没有。

傍晚时分，我们总算到了一个汽车站（站名记不清，可能叫“纳赤台”）。我感到自己呼吸都困难，头痛得很厉害，晚饭也不想吃。当晚在汽车站内，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我觉得躺下呼吸更困难，便把被子当靠垫坐起身，这样感觉稍微好一些。深夜，我突然发觉何金祥同志快要断气了，便急忙起来想为他找医生。我敲汽车站里两位食堂师傅的门，求他们找医生。他们正在睡觉，只听其中一位在被子里面大声告诉我：“往下走两里路有解放军汽车站，那儿有医生。”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我忍耐着自己身体不适，朝师傅所指的解放军汽车站慢慢走去。到达解放军汽车站时，医生也是正在睡觉。我向这位医生说明了来意，他迷迷糊糊与我一起来到了我们住的汽车站。医生简单地看了何老师的病情，便要求我和他一起回站里取药。当夜，我又从解放军汽车站拿了药，一个人返回到所住的汽车站。何老师吃药后睡觉很好，而我却经这么一折腾一夜没睡。

第二天很早起来吃早饭的时候，食堂厨房的师傅出来问我：“昨晚去是你去找医生的吗？”我说：“是我，有什么事吗？”师傅说“你真是好运！这里夜晚常有狼群出没；碰上狼群，你骨头都留不下。”听了师傅这一番话，我心里忽然一阵后怕。饭后，我们上汽车继续向西藏前进。途中，司机夸赞我说：“金老师，你为同事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何老师听到了这话，便向我表示感谢。但此时他依然头痛，一路都处于半迷糊状态。路上，我忽然看到车两旁有几百头藏羚羊

在和我们乘坐的汽车一起跑，过了一会，又来了一大群藏羚羊跟车跑，远处还能看见野驴群。司机对我说：“有时候还能看见野牛群哪！”

晚上，我们到达了青海玉树的“楚玛尔河沿”汽车站。汽车站的被子脏得很，但在此过夜又无法不盖它。汽车站的条件很差应当理解，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非常困难的年代。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汽车上看楚玛尔河，河面较宽，水很清，流得也很快。祖国母亲河——长江源头那么干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从“楚玛尔河”开始，我们行程中弯弯曲曲的山路更多，细小的河川更多，汽车走啊，爬啊，马达声仿佛也大了起来。也许是海拔更高的原因吧，近处的草地间还可以看见雪迹。草地上的鸟儿飞得不高，飞一会儿、停一会儿。我问司机“那是什么鸟？”司机说：“那是雪雀。”在汽车的行进中，我还发现地上有许多小洞，一种像兔不是兔、像鼠又不是鼠，看起来比老鼠大好几倍的东西从土洞里出来又进去。司机告知那是鼠兔，并说“晚上雪雀和鼠兔在一个洞里过夜”。

下午两三点时，我们经过唐古拉山口，公路海拔最高处有五千多米。路旁有一个似“天池”的湖泊，虽不是很大，但很好看。在雪地上，我们偶尔还可以看见雪莲花。我们到达安东站时天已很晚，在这里休息过夜后，第二天很早我们就上路了。从安东站出来后我感觉汽车速度很快，便问司机原因。司机说：“过了唐古拉山就是下坡路，车自然就快了。”走啊、走啊，我们从汽车两旁开始看见了牧民和牦牛群、羊群，绿绿草地的远处是雪山。下午，我们早到达了“黑河”，这里见到的人都是藏族。广阔的草地间却看不见一棵树木。

第二天早上，我们向拉萨出发。中午经过羊八井时，司机说：“这里到处是温泉，现在白白浪费。以后开发了，就是大好地方！”一路上，下坡的汽车似乎是与急流的江水一起奔跑，两边都是高高的山。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拉萨。

这一路确实很艰苦。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拉萨整整





花了十一天！其间，住宿、饮食条件虽很差但总可以克服，我们最难受的是高原反应——缺氧、头痛、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加上土路上的汽车颠簸，肝脏都似乎要移位了！

二、难忘的招生

到达拉萨后，我们住在西藏歌舞团里。这里原来是一个寺院，给我们安排的住房是喇嘛曾住过的房间，墙壁、柱子上画的怪兽令我有点儿害怕。当晚，何老师睡得很香，我却躺下了很久也睡不着。

第二天中午，来了一位团领导看望我们。他让我们先适应这里的气候，休息一个星期，可一面休息一面看一看拉萨，同时还为我俩安排了一位二十多岁的藏族小伙子当翻译。此后，这个小伙子一步也不离开我们。在西藏歌舞团里，有很多藏族表演艺术家，也有不少从内地进藏的汉族同志。大家对我俩都很热情，还给我俩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当天下午，我们首先参观了所住的寺院，寺院大殿的佛像很壮观。该寺院的规模也很大，据说曾有几百名喇嘛。翻译小伙子还领我们参观了大觉寺、八角街。大觉寺前有许多藏族老乡，站起来、又趴下去，不断地重复，嘴里还虔诚地念着什么。我靠近过去一看，好几块那么大的石地板上都有因人常年触磨而形成的深深凹痕，好几个大石板上都一样有洼痕。在大觉寺里供奉有“文成公主”的塑像，神案前点燃着几百盏铜制酥油灯，据说几百年都没有熄灭过，有老百姓天天补上酥油。可见藏族群众爱戴和信仰“文成公主”，大觉寺也成为历史上藏汉人民团结互融的象征。八角街是拉萨市的中心，也是一条商务街，来来

往往的人很多。山上的布达拉宫建筑群很高大、很宏伟。当时，布达拉宫没有开放，我们只能在街道上看看它的外貌。

在拉萨住了两天，我俩都适应了气候，虽然身上还没劲儿，但头不痛了，因此决定招生工作提前开始。从拉萨的小学里，我们看到藏族小学生都很聪明、活泼。孩子们虽然没有专门学过音乐，更没有学过什么乐器，但乐感很好，大多会唱歌、跳舞。我们的招生是以面试

为主：听唱歌，作简单的听力测试，还要看相貌和看手的条件。此外还要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与生活表现。在拉萨小学生中，我们选拔了二十多名男女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藏族孩子。这些孩子要到拉萨市人民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合格者才能成为录取对象。

拉萨招生工作结束后，按计划还要到日喀则和江孜去招生。翻译小伙子陪同我俩一早就登上了前往日喀则的卡车。车上乘客多为藏族老百姓，还有几名进藏的汉族干部，大家都挤在一起。因为是上坡路、爬山，汽车行驶得很慢。当天下午到达了麻站的高原草场，我看到几顶藏族牧民的帐篷、许多牦牛和羊群。晚上，我们和几名进藏干部就住在离帐篷不远的汽车站里，而乘车的藏族老百姓就露宿在站外的草地上。只见他们很习惯地捡一些干木柴和干牛粪点燃火堆，围绕着火堆吃和睡下。这情形对内地人来说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当晚，汽车站的食堂师傅用二十多个砖茶为我们这些住宿干部换来一头牦牛，并由牧民帮助宰杀。牦牛肉留在汽车站食堂，而牛头、牛皮、内脏等送给了牧民。汽车站食堂没有素菜，只能炒牦牛肉，主食是馒头，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是第一次吃到牦牛肉，感觉很香、很好吃。第二天临别时，汽车站的师傅给我们带上一大块牦牛肉，让我们在路上吃。他们对进藏干部的照顾和关心使我们很感动。在去日喀则的路上我希望能看见喜马拉雅山，但没有看到。汽车下午到达了日喀则，我们住进一家条件很差、卫生不好招待所，也没有小卖店。翻译小伙子对我说：“到老百姓家里可以买到青稞酒，两元一斤。”我便出钱买了两斤，但觉得这酒没有酒劲。晚上饮酒，何老师不喝，我只好与翻译小伙子对酌。没想到半夜里我闹起肚子，





一夜没睡好。

来到日喀则的第二天我俩就着手招生工作，但来报名的孩子很少，仅招了几名学生。当送这几个孩子到当地部队医院体检时，我发现有一名朝鲜族护士。我问她是怎么来到日喀则的？她说：“我们部队原先是志愿军。

我爱人调到这儿，我也就来了。”这是我进藏后见到的第二个朝鲜族人。

在日喀则期间，我俩参观了这里的班禅寺庙，看到了宏伟的九代班禅灵塔，各代班禅灵塔的样子都差不多。据说塔顶上的佛像是用金银和宝石镶成，这些贵重材料是用几千头牦牛和羊去到印度换来的。寺庙里有几百盏酥油灯常年不灭，路上时常见到走几步一磕头的藏族老百姓。翻译小伙子告诉我，藏族普通人家男子中必须有一人要从小出家当喇嘛。可见藏族宗教信仰的全民性和根深蒂固性。几天后，我们按计划又去了江孜招生。江孜是藏族人民英勇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名城，它让我心中充满敬佩。我们在日喀则和江孜招收了五、六个学生后就返回了拉萨。

在最终确定录取的27名藏族学生中，有三名是贵族出身的孩子。其间有人问我：“贵族子女能招吗？”我说：“只要他们家人没有参加叛乱，拥护解放军，学生本人在校表现良好就可以。这符合党的政策。”这样，我们从西藏带回了27个孩子。为把孩子们安全带回北京，我们包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虽然是卡车，但后车厢有帆布盖着，里面很暖和。何老师坐进驾驶室的副驾，我则同全体孩子坐在一起以便照顾他们。当时已是八月底了，但路上仍旧可以看到雪迹。一路多下坡，感觉汽车跑得很快，约四天时间就抵达了柳



园，由此改乘火车驶往西安。一路上这群藏族孩子激动得不得了，而且对什么都好奇。

顺利到达西安后，我们住进了西藏驻西安办事处招待所的三层楼客房。孩子们在房间里第一次看到水龙头和自来水，感觉很新鲜，便无所顾忌地玩起水来，弄得满地都是湿漉漉的。招待所的负责同志发现这一

情况后很生气找到我，让我“管一管”。当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时，果然看到他们正在玩水，便急忙制止和大声训斥，并吓唬他们“谁再玩水就把谁退回家去”。事后，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招生教师，不该情绪失控地对学生嚷，应该理解他们的好奇原因；纠正孩子们的过失或错误，尤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可以说，对这件事的反思使自己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获益几十年。



在西安，我们领这群藏族孩子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们大开了眼界。到达北京后，给他们分配了学习专业并开始上课。记得由我负责教的有一名叫强巴扎西的藏族孩子很聪明，进步也很快。多年过去后，这批从西藏招收的藏族学生均已完成学业，其中一些人很快成为了西藏歌舞团的乐队骨干。

三、不尽的感言

1962年的进藏招生之路历尽艰辛，在当地所见还不乏旧西藏农奴制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景象。例如，无论是拉萨还是日喀则、江孜，都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街道也是很脏乱的，走路都得小心翼翼。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如今西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已焕然一新。就交通状况而言，就令人对今昔巨变感慨不已：从北京到拉萨实现了航线、公路线和铁路线的“三线直通”，从拉萨到日喀则乘火车更为快捷……可以说，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进藏招生体验，早已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了！

金在清

阿佤山实习纪行



1954年3月1日上午，北京的天空细雨蒙蒙，还夹杂着小雪点。这时，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有一支中央民族学院赴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习的学生队伍，正整装列队准备登车。而我就是其中一员。

一、离京

那天，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有宗群、葛殿玉、武耀芝、李春芳等院系领导和一些老师。当南行列车缓缓启动、渐渐地离开站台时，他们挥手向我们道别。此刻，回响于我们耳边的话语，仍然是师长们的关怀与叮嘱——到了云南贵州，听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安排，有事多向他们请示汇报。

火车驶出北京开始提速，奔驰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我们兴奋地透过车窗观看车外的景色，田野和村庄从眼前飞驰掠过。为了保证特快列车畅行，我们乘坐的车次常要在一些车站或地段中途停车，等特快通过后才能启动继续南行。

次日，火车到达武汉。我们须换乘渡轮过江到达彼岸，然后再次登上火车，继续南行。在汽笛声中，我们经过湖南、广西，窗外绿树葱葱，一派南国风光。火车到了柳州换车，我们上街观光，听叫卖“王老九”，不知它是何物，不敢冒昧品尝。后来听说，它是一种当地居民祖传的解暑凉茶。

随后上车，到了金城江，火车停驶。听列车员说，这里是南行列车的终点，铁路没有了，需要下车换乘汽车，方可继续上路。数日后，我们带上行李乘敞篷

卡车。在崎岖山路上，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车外美景，尽收眼底。途中有同学晕车呕吐，卡车停下休息。

晕车的同学靠在路边的树上，因样子有些狼狈而被其他同学调侃。群起的笑声使晕车的同学也跟着笑了，大家疲惫随之遁去。

一路颠簸，终于到达贵阳。我们受到省民委的热情接待，被安排住进八角岩招待所。此时，贵州实习队的同学算是到家了，而云南实习队的同学还要继续南行。在贵阳，省民委组织我们参观名胜古迹。我们在花溪公园拍下一张卡瓦语班（本文以下统称为佻）实习组的合影照片。

二、分道

几天后，我们佻语班实习组的同学乘坐老式客车，离开贵阳向昆明出发。途径黄果树大瀑布，我们下车休息，观赏瀑布。佻语班李培江老师给同学们拍照留念（可惜照片找不到了，只留下美好的回忆）。老式客车比敞篷卡车稍好一些，但密封性能很差，一路灰尘飞扬。朝发夕至——我们途径安顺、晴隆、盘县、沾益等县最后到达昆明。

三月的昆明阳光明媚、山花浪漫，一派春城风光。我们受到云南省民委的热情接待，被安排住在翠湖宾馆。当地领导组织我们参观了西山龙门、滇池、大观楼等古迹名胜。其间，云南省副省长张冲来看望我们。他说：云南横断山脉，河流交错，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出门上路，要“晴带雨伞，



饱带干粮”，才不会挨冻受饿等。他的话让我们受益匪浅。

其间，我们去拜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傅懋勳先生。被他接见的有陈学明老师和李培江老师，学生是周植志、颜其香、罗之基、王敬骝、陈相木、黄同元、邱锷锋、聂锡珍、余静儿和我。傅先生说：“你们是第一批到阿佤山去的人，除学好口语外，还要做些调查研究。”他的话同样使我们受益匪浅。

4月初，我们乘坐一辆老式客车离开昆明，向阿佤山沧源出发。第一天歇脚朱家寨，那里只有一家饭店，几栋民房。饭店白天供旅客就餐，晚上收起餐桌铺上床板，便是大通铺客栈。经过数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滇南名城“普洱”（今称宁洱）。

普洱是滇南茶叶收售的集散地，从那里运出的茶叶，在“马站”为乡亲带出土特产，捎来日用百货。所以，马帮深受沿途乡亲的信任。马帮的头叫马锅头，拥有马队。马锅头接受任务后，便雇佣赶马人，组成马帮。他们随身带有炊事工具和生活用品。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毡子，既能遮雨，又能御寒。马队中的头马，体型高大，头扎红绸，通称为“普洱茶”。实际上普洱并不产茶。它的茶源，来自勐海南糯山、勐海布朗山、双江勐库、景洪大渡岗、澜沧景迈等地。那些山区的茶叶经过初加工，由人背马驮送到城镇深加工，再驮运到普洱，经过马帮转运带到省内外，或送上“茶马古道”销往国外。普洱是云南茶马古道的起点，也

是内地马帮采购茶叶的集散地。

从普洱北上，乘敞篷卡车到景谷。夜里，有同学听到虎啸声。次日，听执勤的哨兵讲，在树木繁茂的城外听到虎叫不足为怪。

在景谷，我们坐马车进城观光，看见集市鸡蛋串起来卖，有幸目睹“云南十八怪”中的一怪——“鸡蛋串着卖”。经联系安排，我们要跟随一支马帮从景谷出发，踏上可能长达九天的艰苦行程。

三、随行

马帮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河流，脖挂铜铃，走在最前，带领群马上路。马帮出发那天，马锅头举行祭山仪式，祈求沿途神灵保佑。

马帮旅途都有距离不等的“马站”。有时，走大半天就歇脚；有时，走到月亮升起才止步休息。我们跟随马帮前进，它走就走，它停就停。每天，跟随着马帮，翻山越岭，行走在红松林里，穿行在山谷间。中午，马帮休息做饭，卸下马驮，放马于山林旷野，让马儿自由分开，快活地觅食。赶马人拿出铜锅，就地取来柴禾、泉水做饭，而我们则躺在山地上休息，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午饭后，马锅头向山野发出口哨，群马闻声从四方八面归来，驮上行李。头马识途，带领群马继续上路。

四月初的滇南天高气爽、山花烂漫，悠悠的马铃声伴随着我们前进，赶马人的即兴小曲不时回响于耳边。我们跟随着马帮从一处山坡走向另一处山坡，从一个马站走向下一个马站。沿途景象，处处生机勃勃。在赶马人的指点下，我们尝到坡地上的“黄泡果”，也尝到了山野中的“橄榄果”。野生黄泡果是多年生小灌木（属于蔷薇科植物）的果实，外观像蓝莓，成熟时呈红褐色，味酸甜。野生橄榄果是多年生小灌木（属于橄榄科植物）的果实，外观绿色、圆形，大如小板栗，其味先涩后甜，回味无穷。

我们跟随马帮走边疆的9天行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经



作者（后排右一）参加的低语班实习组师生在花溪合影



沧源的岩帅佤寨。佤族村民崇拜的保护神“木依其”（mouig）就住在寨头那片树林里。

历莫过于以下几次：

其一，第一天。清晨，跟随马帮从景谷启程路过傣寨时，看到一位背着小孩的少妇。只见她左手负着婴孩，右手拉着房梁上的绳套保持平衡，在竹楼的偏厦下舂米，令大家叹为观止。

当晚，我们住在一处寨边的羊圈，解开随身的行李，铺睡在羊圈楼上。透过稀疏的屋顶，看见浮云在移动，月亮在浮云中穿行。看着月亮和浮云，很快就进入梦乡。半夜，我们突然被一阵骚乱惊醒。经询问才知道是马帮的食材里有一方腊肉散发出的香味，引来“不速之客”。直到“来客”被赶马人驱离，一场虚惊才得以解除。此时，天色已发白，我们索性起床，洗漱完毕后跟随马帮上路。

其二，路程最长的一天，是跟随马帮过了大磨刀河和小磨刀河。我们爬山下坡，直到傍晚月亮升起时才赶到马站。接待我们的人是马站“勐嘎”村委会的主任——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干部。她一面和我们一一握手，一面说道：“肚子饿了吧？马上做饭，一会儿就得了。”

见灶上炖了一大锅萝卜，里面还有一块腊肉。而灶前烧火的人，正是我们班的颜其香大姐。很快，饭菜做好。我们饱餐一顿，洗脸洗脚，铺床休息。第二天一早，大家又继续跟随马帮上路了。

其三，我们过了景谷南边的永平镇，开始进入双江县境内，随即下坡，到达小黑江边。江的对岸，是阿佤山区的边缘地带。

小黑江适逢旱季，河面虽然只有十来米宽，却没有桥，也看不见渡船，这让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此时，只见伫立岸边的马锅头解下背上的长枪，向空中连放两枪。转瞬，对岸树丛中就有了动静——一架竹筏被推到江里。只见几位赤身裸体的汉子跳入水中，擎住竹筏，匍匐于水面，以双脚弹水推动竹筏向前，直达

我们站立的岸边。我们惊讶地目睹此景，又感叹不已。

此时，马帮把行李卸下装在竹筏上，汉子们便转身匍匐于水面，又双脚打水推动竹筏返回，到达彼岸后卸下行李。如此反复多次，将马帮的行李全部运完。而后，我们分批走上竹筏，由他们照此方式将我们送到彼岸。

最后是马锅头赶马下水，群马游过小黑江到达彼岸。当晚，我们和马帮就住在竹筏汉子的寨子里。从言谈中我们知道了他们是布朗族。

次日清早，我们跟随马帮出发，一直在翻山越岭，当天终于到达实习目的地——沧源的岩帅。在这里，我们受到当地区委和区政府的热情接待。至此，我们从景谷跟随马帮的九天旅程顺利结束。

四、认知

岩帅，佤话叫“央帅”（yaongsoi），源于建寨人的名字。这里的民居为竹茅结构，分布于平缓的山梁。寨头有一片树林，据介绍是佤族祭祀、招魂和送鬼的场所，而他们崇拜的村寨保护神“木依其”（mouig）就住在那片树林里。

区委的同志在介绍此地时，特别说到一件趣事：解放初，组织参观团去北京。有位来自本寨的代表问北京有多大？比岩帅大吗？参观回来后，这位代表见人就北京非常大，比岩帅可大得多好多！当日，他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态度热情，当即拿出自酿的水酒招待我们，表示非常欢迎。

我们的实习地点被安排在岩帅大寨旁的一个叫



沧源县的翁丁村如今是阿佤山最后一个佤族原始在灶火正旺的厨房，我们看部落风貌遗存，现为“佤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贺南”的佤寨里。“贺南”直译出来是河水的源头。这里的佤族居民信奉耶稣教，同时也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宗教习俗。

佤族跨中缅边境而居，主要居住地被称为“阿佤





佤族村寨“翁丁村”村口

山”，其中心区域主要是佤族中的拉佤人村落。我们听说那里还残存着“砍人头，祭旱谷”的陋习。阿佤山中心区向外延伸的边缘地区，是佤族中

的佤人、布饶人的村落，他们相对进步一些。我们实习的沧源岩帅佤寨，属于佤族中的布饶人居住区。

进驻贺南的第一天，我们每个人就被当地佤族人逐一“取名”了。取的名字有nyikuad，直译出来就是“名字叫庚的人”；有yeixga，直译出来就是“名字叫癸的人”等等。这标志着我们已被接纳为佤寨新居民。

关于佤族人名，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性别词，男女分开，分别排列。男性排行从一到八，佤语分别叫“艾”(ai)、“尼”(nyi)、“三木”(sam)、“赛”(sai)、“奥”(ngaox)、“罗克”(loug)、“杰提”(jiad)、“贝提”(bied)，当地汉语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和老八。女性排行从一到八，佤语分别叫“叶”(yeix)、“依”(i)、“阿木”(am)、“欧克”(oug)、“依亚提”(iad)、“偶”(voux)、“依黑”(ih)、“吾”(u)，当地汉语分别叫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和小八。

第二部分来源于汉语的天干名序。汉语天干的“甲”佤语叫“嘎普”(gab)，“乙”佤语叫“那普”(nab)，“丙”佤语叫“热艾”(rai)，“丁”佤语叫meng，“戊”佤语叫bleeg，“己”佤语叫gad，“庚”佤语叫kuad，“辛”佤语叫roung，“壬”佤语叫dao，“癸”佤语叫ga。这十个是固定的名字。天干名序用于人名，汉文史籍上早有记载。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现今云南佤族的人名，无论男女，仍然保持和流行着远古汉族以天干命名的习俗。

第三部分，即姓氏。岩帅佤族有几个姓氏，如：佤族姓“央弄”(yaongrung)，当地汉语称作姓李；佤族姓“央耕”(yaonggaeng)，当地汉语称作姓田；佤族姓“赛索”(saiso)，当地汉语称作姓赵；佤族姓“司古”(simgu)，当地汉语称作姓陈；佤族姓“司内”(siniex)，当地汉语称作姓肖。但在

毗邻的澜沧佤族姓“司内”(siniex)的，当地汉语称作姓魏。澜沧佤族姓陈的，当地佤语称作“各恩饶”(gonrao)，与沧源佤族姓“司古”(simgu)的不同。

佤族人给我们取的名字，如：“尼夸提”(nyikuad)，直译出来是一个名字叫“庚”的男性，排行为老二；“叶嘎”(yega)，直译出来是一个名字叫“癸”的女性，排行为小大。而我们的姓氏，则被他们通称为“北京”，如“尼夸提”北京、“叶嘎”北京等。

五、融入

沧源岩帅，地处亚热带雨林区，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月明星稀的晚上，一堆篝火升起于寨子中心场地，三五人拉着手、围着篝火即兴起舞。随之，人越来越多，舞圈越来越大，其间有人领唱、众人相和。



梳理秀发的佤族姑娘

如领唱者高唱“月亮出来好跳舞，民族团结一家人”，众人则随之和唱。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常参加其中，与他们共舞到夜深才散去。

但散舞后，佤族小伙子会三三两两去“公房”“串姑娘”。公房一般修建在村寨的边缘区，佤语叫nyixngrom，是小伙子和姑娘交朋友、谈心的地方。有个别的寡妇家若自愿接纳成年的小伙子、姑娘的聚



佤族姑娘的“甩发”舞蹈

会，也被称之为公房。出于好奇，我们有同学偶去公房，便会受到热情接待，主人常以碳爆蚕豆或豌豆待客。去公房的同学都是稍坐一会儿便起身退出。这时，现场的佤族小伙子和姑娘总是热情地说：“有空再来串！”

岩帅地处阿佤山边缘，区委安排我们集体居住，选在寨子中间。内房住女同学，外房住男同学，兼用火塘炊事和开会学习。因为住房不大，抽出三位男同学借住在小学校内。全体同学统一参加活动。

这所小学有两位内地支边老师任教，分别担任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课程。那时候的佤族小孩大多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入学时只得由老师来判断。老师判断的标准是，让孩子举起左手或右手，绕过头顶，去触摸另外一边的耳朵。摸得着的就让入学，摸不着的就让明年再来。这就是那时候流行在佤族地区的收录学生入学的规则。

我们同学之间轮流担任炊事员。在“轮炊”中，两位老师和四位女同学做饭口碑甚佳，但是六位男同学做饭却实在不敢恭维。其间，有位男同学做饭时竟自作主张，将肉切成12块煮进菜里，说是“一人一块”好分。大家对此只得一笑了之。

佤族取水的工具是葫芦和楠竹筒。如果一长楠竹筒装满水，我们是扛不动的。所以，老乡给我们制作的取水楠竹筒较短，大约1.2米左右。有人将“山中无长物，竹筒取水来”镌刻其上，诙谐生趣。

初入佤寨同老乡交往中，我们由于发音不准，出了一些误会。比如，去借扫把，老乡抱出一个南瓜给我们。因为，扫把佤语叫nbih，南瓜佤语叫nbi。发音接近才容易闹出这样的笑话。为练好口语，我们在实习中的方法有六：一是“见物问物”（这叫什么？

那叫什么？）；二是“辨”，分辨语词的声韵母和松紧；三是“记”，使用国际音标记录；四是“学”，口耳相传，心领神会；五是“校”，不断练习，不断矫正；六是“用”，反复运用，牢固掌握。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我们的口语能力不断提高。

佤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其中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后来，邱锷锋、聂锡珍同学用国际音标系统记录了佤族关于人类起源的口头文献“司岗里（siganglih）的故事”。它的内容涉及到佤族的历史、迁徙、生活、生产、习俗、语言发生、火的利用、谷物起源等方面。

关于“司岗里”（siganglih），学术界有三种解释：其一，“司岗”是崖洞、石洞；其二，“司岗”是葫芦；其三，“司岗”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而“里”（lih）则是“出来”之意，即人从“司岗”出来的故事。从语义学上分析，石洞和葫芦，应是民俗学上的雅语。“司岗”就其所言，无疑是对女性生殖器崇拜。

六、考察

到了1954年12月，我们圆满完成了实习任务，与佤族乡亲们告别。他们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寨外，一直目送到我们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山路上。根据沧源县委安排，我们要先到县上集中，然后求得边防部队的支持，准备去中缅未定界地区的拉佤人村寨考察。

我们离开岩帅，途经贺勐佤寨下的小干河，须涉水到对岸。适逢旱季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河面也不宽，可以蹚水过去。于是，我们两三人一组，女同学在男同学中间，手拉着手过河。有位女同学身材较矮，



佤族村寨的老人和孩子

走到深处，河水已漫到她的胸前，两侧的男同学反应迅速，赶快把她的身体架空起来，安全到达彼岸。

到了沧源县城勐董，我们受到县委的热情接待。沧源县城勐董地处中缅边境，未定界区的拉佤人常来





这里赶集。他们带来一些土特产，买回一些日用商品。在街上，有拉佤人背来一些黄果出售，一角钱一个。你右手给他一角钱，他左手从麻袋里拿出一个黄果给你，右手接过钱去，交易就算完成。如果你没有零钱，给他一张五角钱币要买5个黄果，他就摇摇头，让你换成5张一角的钱给他，否则交易被终止。

中缅未定界区是中缅两国边界的缓冲区，那里主要的居民是佤族中的拉佤人。如前所述，佤族分为拉佤人、佤人和布饶人三大支系，而拉佤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中心及毗邻山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边界后，缓冲区才被解除。

当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从县城出发，翻越城南大山，到达永和佤寨，当晚歇息在那里。第二天清早，我们跟随边防部队一指导员李中秀前往中缅未定界的央让前哨站。李指导员是河南人，大高个，腿长步快，我们几乎小跑才能跟上。中途经绍怕、黄果、莫斯美、勐班等村寨，当天下午我们到达央让前哨站，食宿都在部队里。

在前哨站，据李指导员介绍，央让的佤族部落含5个小寨，至今还残存着“砍人头祭旱谷”的陋习。与它毗邻的木邦部落、完冷部落和山通部落，也残存着这种陋习。部队有一位战士，与央让部落的佤族群众关系较好，被他们亲切称为“岩”（ai），即老大。他同意明天带我们下寨去看看。次日，我们几位同学跟随战士“老大”去央让部落，一路心情多少有些紧



佤族村寨外的“人头桩”遗存

张，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接受拉佤人的“头祭”陋习。从哨站出发，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央让大寨。寨里的头人见到陌生的客人，表情很凝重，也难解。他伸手从凉台旁的地里拔出两根甘蔗，挥刀砍去头尾开始占卜，以祈求神灵示凶吉。占卜的结果是蔗节显双数，说明来客是友好的，他的脸上开始展开笑容。于是，我们拿出事前准备的针和线表示一点心意。他欣然接受并拿出水酒招待我们。水酒是用谷物发酵和通过泉水稀释制成的，后劲较大。所以我们不敢贪杯。当我们提出想参观“鬼林”时，头人欣然接受并引导我们前往。鬼林在村寨的上方，一条小路通向其中。

那里树林茂密，光线阴暗，不少人头桩、半身人像、持刀全身人像隐现在杂草灌木丛中，目测竖有人头很多，难以计算。

当天晚上，我们听到远处传来低沉浑厚、节奏有快有慢的木鼓声。我们不解其意。李指导员告诉我们：佤族认为木鼓是人与神传递信息的使者，木鼓也是村寨之间信息互通的工具。一般是二月“砍人头，祭旱谷”而敲木鼓，八月是送旧人头去“鬼林”而敲木鼓。今晚的木鼓声究竟传递的什么信息？只有部落里的人明白。

12月25日，我们有幸碰上中缅两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致礼日，双方要吹号互致问候。为了方便现场观看，李指导员让我们都穿上军装参加。当天一早起床，早饭后发给每人两块压缩饼干和一壶水作为当天的午餐。据说这种被称为“坦克酥”的压缩饼干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同学们感到新鲜。有的同学吃了一块，还剩下一块，要留作纪念带回北京。

七、尾声

这次考察结束后，我们又在李指导员的带领下离开前哨站，经“莫思梅”、黄果、绍怕、永和等地返回沧源县城勐董。在县委的安排下，1955年元旦后，我们再次跟随马帮上路——这是踏上返程。我们经勐角、孟定坝子到双江，途经勐库到达临沧，从这里搭乘老式客车返回昆明。到昆明我们仍然住在翠湖宾馆，修整数日后，再次由老式客车换乘火车北上，回到北京时已经是元月下旬。

我到云南阿佤山的实习经历已过去了62年。众所周知，如今那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再前往当地，无论道路还是交通工具都可任选快捷。抚今追昔，那“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常感叹当年跟随马帮踏上实习之路的我们佤语班10位同学中，现已有6位乘鹤西去，而在世者均已步入耄耋之年。应庆贺我们的老师陈学明今仍健在（李培江老师不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后失联）。回首以往岁月，总有更多欣慰，因为大家都是为佤族语言文化研究做出应有奉献的一代人。◆

李道勇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领域为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代表作有《佤汉简明词典》、《布朗族文化史》等。）

中央民族大学 新闻学科的前世今生

中央民族大学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创建于1951年6月11日，原名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1997年，学校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1999年1月，又通过了“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立项审核。中央民族大学现已进入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的行列。2004年又跨入了“985工程”，成为全国38所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之一。

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新闻教育始于1961年创办的新闻研究班，学制2年，学员30人，由当时语文系副主任徐垠（已病故）负责，何报琮协助管理。在这个班级任教的有于枫、来春刚、郭景哲、伍承民等6名教师。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这个班的学员结业后，没有继续兴办新闻研究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根据国家民委重新调整民族院校办学方针，“大力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教育部批准，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创办四年制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更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创建时，有教师2人，学生40人。中文系新闻学本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即由人文科学的通识、汉语言文学基础、新闻学理论基础、新闻学应用知识与技能以及新闻学专业综合实践训练为知识结构与专业功底的新闻人才。培养过程强调学生的人文素质、文字功底、思维方法及为民族地区的服务意识。同时，还办过一个新闻摄影班，学生毕业后奔赴各地从事新闻采编、新闻摄影工作。到2001年，已有12届毕业生，学科建设日臻完善，也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社会输入了480多名专业

人才，不少学生已成为中央和地方的新闻传媒单位的业务骨干。新闻专业本科生被免试推荐攻读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中国传媒大学）及本校硕士研究生的有10人，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本校的硕士研究生约30人。在校生获“韬奋新苗奖”的有6人，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工作的本科生中，获国家新闻奖的2人，省部级新闻奖的3人。2001年新闻专业教职工9人，其中专业课教师7人，计算机房2人，具有硕士学位者5人，并聘有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专家杨正泉、格来、艾丰、何梓华、任一农、刘建明等人为兼职教授。开设的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有新闻理论、新闻事业概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传播史、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广告学、摄影理论与实践、广播电视业务、中国摄影史、新闻心理学、舆论学、报告文学概论、摄影美学、新闻美学。此外还设有计算机常识与应用、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等新兴的实用课程，以培养具有专才和通才素质的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中央民族大学是我国56个民族团结友爱的象征，是我国民族工作的窗口。她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干，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现已成为中国民族问题及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家高等教育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创办以来，在学校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始终坚持和发扬民族性，突出民族特色。新闻专业创办伊始，就有明确的宗旨和任务，为56个民族培养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新闻院、系、专业不同的是，学生在校学习4年后，有相当一部分要回到民族地区去发展和繁荣当地的民族新闻事业。为民族地区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的宗旨和任务也就决定了该校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都必须根据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发展





的需要进行设计，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更不能照搬其他大学新闻院系、专业的现成经验。

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自198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根据当时形势，挂靠民族学硕士点，招收攻读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学生。民族新闻研究在民族大学具有开拓性质，犹如在处女地里耕耘。但作为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民大进行这门学科的研究，较其他院校有先天的优势。如前所述，中央民大是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先后开设过藏语、彝语、纳西语、景颇语、傣语、拉祜语、哈尼语、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苗语、瑶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满语、朝鲜语等20多个语言专业。民族学、民族语文、民族历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有众多的学者、专家、教授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优势是其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所不具备的。它为研究生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数量与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先后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概论、民族摄影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务研究、影视民族学等课程。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为重点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历史沿革、兴起、发展、繁荣的演变规律及其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评价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贡献。配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民族报刊研究文集》（以上著作作者为白润生）、《民族新闻纵横谈》（作者马树勋）等公开出版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概论”，探讨和研究民族新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讲授民族新闻研究的对象、民族新闻的地位、民族新闻的共性、民族新闻的内容和重点、民族新闻采编的几个基本问题、民族新闻的写作特点、民族新闻事业概况（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少数民族语文新闻媒介的特点和发展、民族新闻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民族新闻工作专业人员的培养等几个问题。配有《民族新闻学导论》（白克信、蒙应著）、《民族新闻研究与实践》（理论、探索、思考）第一卷（余正生主编，内部发行）等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民族摄影学”是民族学与摄影学的交叉学科，它在大学本科已有民族学和初步掌握摄影技术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摄影的特征、规律、技法和手法，即如何运用摄影的造型技巧，深刻而又生动、完美、艺术地表现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生活习俗、服饰工艺、节庆游艺（包括体育、舞蹈、节日活动等）及地域风光等。学习民族摄影学，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形象地体现各民族团结、平等、发展的思想，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门课一直由著名摄影艺术家、理论家龙熹祖先生授课。他时任中央民族大

学图象研究所所长。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务研究”，主要内容是民族新闻和民族地区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特点与基本要求、方法与技能，以及编辑、出版、发行业务的特点和规律，技能训练与提高，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配有《民族新闻探索》《民族地区采访经验谈》（以上著作作者马树勋）和《民族新闻研究与实践》（作品、评述、报人）第一卷（余正生主编，内部发行）等教材与参考书目。

“影视民族学”现统称影视人类学。它是在人类学和电影学电视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这门课融该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训练为一体，是民族学、新闻学、电影电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课程。主要内容有影视人类学的概念、特征、发展历史、人类学片的摄影、影视人类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等专业理论与知识。在教学中，根据教学的具体需要，还要安排人类学片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参考教材是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影视民族学》，作者是美国的卡尔·海德，译者是田广、王红。多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原馆长、中央民族大学周报前主编李德君研究员为本书的中译本作序，并且是该书的特邀责任编辑。他为研究生讲授这门课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影视人类学的专家在该校不止李先生一人，此外还有庄孔韶教授、张海洋教授等，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他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影响蜚声海内外。

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有的著作和论文在新闻学术界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教育部和北京市的优秀成果奖。

研究生教育从1989年算起到2001年已有10余年了。五届毕业生人数达13人，其硕士论文多已公开发表。这两年还有来自新华社、北京经济报等单位的3名在职研究生通过了国家考试获得了学位。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承认。1997年《新疆新闻界》第4期封三以《我国民族新闻研究人才的摇篮》为题，发表6幅新闻照片予以报道。

到2000年经过反复论证，被北京市主管部门批准具有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这进一步说明在全国各新闻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与帮助下，中央民族大学以民族新闻研究为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

2002年执行学院建制，新闻专业归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领导，从1984年到2014年已创立30周年了。当前新闻专业在人才培养中，倡导知行并重，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体系，构建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路径，培养学生具有较为宽广

的人文素质和社会科学基础，为其奠定终身教育与发展的基础。2004年学院增设广告学本科专业。教师（新闻学15人，广告学16人）31人，正高3人；副高8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占教师总数的52.38%。2014年在校本科生454人，硕士研究生83人（新闻学61人，传播学22人）。硕士生导师11人（新闻学5人；传播学6人）。2012年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逐步形成了与中国语言文学、民俗学齐头并进的学科布局。

新闻学本科专业主要为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宽广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视野，掌握新闻传播学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具有新闻职业精神，能够在新闻、宣传、出版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宣传、策划、经营管理工作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自198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新闻学专业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专题研究、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媒介批评、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新闻法与媒介伦理研究、民族新闻专题研究、电视编创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富有特色的学术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新闻学科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3项，出版专著近20部，在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全国第一个由国家主管部门（民政部）批准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二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本学科。

原为新闻学二级学科的传播学专业，自2012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形成以中外传播史论（含少数民族新闻史论）、传播学基础理论为先导，广播电视研究、广告传播研究为支撑，跨文化和民族文化创意传播研究为特色，辐射人类传播研究、社会传播研究等新兴、交叉研究领域的学科架构。出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30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术研究、教育教学、新闻媒体、宣传企划、行政管理等行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大多毕业生成长为新闻界的精英，获得了包括“范长江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和“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众多奖项。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在90%以上。

三

中央民大新闻专业的发展历史还再次证明民族新闻学是一门有“史”、有“论”、有“学”、有“术”的自成体系的科学。所谓有“史”，就是通过少数民族新闻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史实，总结内在规律；所谓有“论”，是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界、学术界人士从20世纪80年代不断研究探索，反复实践总结并

逐渐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所谓有“学”，是指其“学”有对象、“学”有体系、“学”有规律，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所谓有“术”是指兴办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有自己的章法，即独到认识、理念、规则与谋略，其采访、编辑、言论、通联、广告、发行等具体业务技术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和专业，其“史”、其“论”、其“学”、其“术”，发展均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还应坐下来，老老实实、潜心研究它，使它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并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因此，虽然从2008年新闻传播学学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211”“985”建设行列。遵循“主流、特色、前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2011年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但是距离学界业界的“朝着建设成熟的独立学科的目标前进”（丁淦林语）的期待，还相差甚远。据我所知，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已经培养和正在培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博士生，申报博士点，培养高层次人才，必须有知名的专家，并形成团队。作为全国唯一进入“211”“985”工程的少数民族重点高校，不能直接为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输送高层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可以说是一大缺憾！我们希望在办好本科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办学层次，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由中央民族大学首先申报博士点，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早日成为独立学科，为我国的新闻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新贡献！

今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科将在发扬民族新闻特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强与各高等学校新闻院系的联系与交流，进一步适应我国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新闻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白凯文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

教育学院举行 民族教育学科建设高级论坛



线上线下



本刊讯 12月1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民族教育学科建设高级论坛暨《哈经雄的研究与实践》发行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内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及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等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今年适逢民族教育学学科正式成立20周年，本次论坛不仅是对该学科成立20年来的审视，探讨总结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所面临的新挑战与革新，更是为进一步研究该学科今后的发展与创新集思广益、开拓思路。

会议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苏德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在国内最早对少数民族教育开展研究。1991年，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2003年改为教育学院），首创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科，在全国最早设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点。2000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国内“985工程”大学中第一个以民族教育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为民族教育学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发展。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在致辞中表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科学研究创新体系是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在以哈经雄教授为首的老一辈民族教育学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民族教育学成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的一个独立学科组。建设一个与国际民族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科学研究创新体系，是我国

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和战略目标。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他说，经济上的供给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供给看，需求方是社会的需求，如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政府政策制定等，供给方是教育、教学学科的设置，我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差异性和交融性



特点非常突出，民族教育学应该从这些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做好学科建设方面的供给侧改革。

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司长田联刚，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副司长郭岩，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张强等到会发言。论坛上，来自国内各高校和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就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民族教育学科知识的反思与重构、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教育人类学的时代转型和路径创新以及基于互联网思维创新民族教育实践模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会上还举行了《民族教育 岁月峥嵘——哈经雄的研究与实践》首发式，与会领导为新书揭幕，标志着新书的正式发行。

彭砾

“2016 中国城市品牌建设研讨会” 召开

本刊讯 12月9日,由我校经济学院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研究平台共同主办的“2016中国城市品牌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城市品牌及国标制定和评价体系的建立等议题建言献策。我校副校长青觉,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致辞。

研讨会上,青觉在致辞中表示,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中国城市品牌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愿意同各合作单位一道为中国的城市品牌建设添砖加瓦。他强调我校将充分发挥科研与民族地区学术优势,在经费和人员方面全力支持中国城市品牌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品牌价值提升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而推动民族地区城市乃至中国城市品牌管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刘平均主要阐述了当前国内外城市标准化研究的发展态势和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性机遇。他在致辞中指出,在国际品牌推进过程中中国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五要素”理论获得了全球绝大部分成员国的认可和高度赞同。中国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进程;同时国标的制定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适应全球品牌经济发展的需要。

杨开忠在发言中认为,整体标准体系要具备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从目前的城市产品中遴选评价指标,比如基础设施、生活品质等;在功能上和情感上为城市居民带来的效益,侧重在形成产品的品牌要素。

中国标准研究院蔡华利副主任对中国城市品牌国标目前的工作进展进行了介绍,当前我们制定的标准不同于欧洲的评价方式,中国的城市品牌标准可以采取国际通用的分制,但是评价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通过对评价流程各种指标和数据的界定、收集和验证,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精准设定一二级指标,通过科学建模分析和对数据的加权重和计算出精准的结果。同时,他还对“城市品牌评价标准”的构成做了释义。

我校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城市品牌国标起草工作的支持。她同时指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地区其所在城市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品牌,是中国城市品牌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将充分发挥中央民族大学的科研和学术优势推动民族地区和全国城市品牌建设,让品牌精神融入城

市的每一座建筑之中,促进城市社会、文化、经济加快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纷纷为当前品牌城市国标评价体系指标建言献策。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认为,可以增加参评城市的信用评级体系,以及对城市信贷投放量和人均信贷投放量的考核,这对城市经济潜力的预测比较可靠,还可增加联合惩戒项目的内容。

在专项指标讨论中,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黄春表示,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国家快速推进大健康 and 全民健康战略,这也包括对健康城市建设的要求。城市品牌评价标准也必然包含健康城市的概念,对城市医疗体系和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要求。同时,平均期望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指标在全球的国家整体健康评价体系中也是基础评价指标。

经济管理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品牌专业委员会主任杨世伟着重谈了创新的要求。他认为,标准里面包含的技术创新非常符合城市品牌的评价要求,但是城市发展动态的过程,创新能力显性要素需要加入进去。创新投入、产业集群建设、创新环境等方面的指标对城市品牌的评价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校经济学院教授、城市品牌国家标准起草小组组长解树江主持会议,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与会的中通诚资产评估公司副总裁张树帆、中国城市报副总编辑霍诺、中国城市报品牌专刊主编常量、河南省永城市政协副主席刘正良等专家学者都相继对城市品牌国标的起草工作做了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城市品牌是城市生态形象、文化形象、经济形象、政府形象和综合实力的客观展示。它既是城市内部人员对城市的真实感受;城市外部人员对城市的认知印象;又是影响城市发展、竞争力提升和居民幸福指数提高的重要因素;是促进城市社会、文化、经济加快发展的一大动力。城市品牌国标制定和评价体系的建立是品牌价值提升工程的重要内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城市品牌国标起草工作组的第四次联合工作会议,也是在城市品牌国标通过国家标准立项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线上
线下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 高层论坛在我校举办



线上线
下

10月29日至30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高层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行走与思考——少数民族电影与民族文化”为主题，包括学术研讨、民族题材电影及纪录片展映和导演工作坊三个单元。降边嘉措、尹鸿、郑茜、左衡等来自全国六十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麦丽丝、刘湘晨、景宜、大海等来自业界知名的导演、制片人，以及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政策制订者约150人参与了论坛的讨论、交流与对话。14位主旨发言、30位专题发言、2场导演工作坊呈现出了多元化、多维度的思想碰撞，针对民族影视政策、创作与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与瓶颈、机遇与创新等进行了实践性总结与学理上的探讨。论坛期间，还不断有从外地、校外听闻会议讯息赶来旁听的“激动不已”的参会者。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尹鸿教授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价值和意义”的高层论坛，用“学术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对本次论坛予以了高度评价。本次论坛体现了多学科交叉，来自美学、电影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与会提供了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又极具现实关切，直面并关注当下的民族电影创作困境，并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思想与观点。三个分论坛的专题为“少数民族电影：影像叙事与主题表现”“少数民族电影：功能、认同与建构”“少数民族影视：问题、发展与创新”，分别对他者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叙述与呈现、人的民族与民族的人、全球化话语下少数民族影视面对的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矛盾与困惑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坦诚的交流。

论坛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主任钟进文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青觉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国家民委文宣司副司长、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指导办公室副主任钟廷雄先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陆亮处长、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主席、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主任牛颂先生、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民族影视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欧阳宏生教授分别致辞，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对少数民族电影的未来与发展表达出更多期许。

青觉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我校是培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杰出人才的国家重点大学，学校近年来在人才培

养质量与学科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他强调媒介影像化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用影像对文化进行记录和反思是弘扬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他希望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依托和整合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力量，形成开放式跨学科研究平台、创作孵化平台和高素质人才培养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钟廷雄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国家民委在民族电影方面有四个主要的关注。第一个关注是对民族电影基本情况的把握。民族电影从无到有，走过艰辛的发展道路，有过辉煌的历史，进入新世纪后，受到电影市场化的影响，发展式微，当前需要深入调研民族电影发展的新路径。第二个关注是对民族电影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第三个关注是如何推动顶层设计的问题。未来将继续争取有关方面对民族电影特殊的扶持政策。第四个关注是如何抓好实际工作的问题。近年来针对少数民族电影题材创作弱化、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电影的情况，国家民委会同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部门，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

论坛还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影视银皮书”项目，展映了《背山》《大河沿》《侗族大歌》《额吉》《和田玉传奇》《诺日吉玛》《英雄江格尔》《永生羊》等12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和电影。

本次论坛承办单位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2016年6月成立，由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成立。研究中心整合既有校内外研究资源，并希望打造学界与业界互动的协同创新基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方面形成科学研究平台、创作孵化平台和高素质影像人才培养平台。中心组织结构包括顾问团、专家团和中心研究员。顾问团和专家团致力于为民族影视研究与创作提供权威意见、独立声音与可行性预判、评估。中心研究员由汉、藏、回、维吾尔、蒙、壮、侗、朝鲜、裕固、拉祜、羌族等多民族学者组成，中心的基本价值理念基于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化，遵循影视创作的规律。此次会议也是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次高层论坛。

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2016 中俄能源论坛 暨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成立仪式在京举行



本刊讯 12月2日，2016 中俄能源论坛暨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京举行。我校校长黄泰岩，商务部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副会长李庆文，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韩文科，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俄罗斯中俄国际经贸关系发展协会主席奥列格·杰米好，俄罗斯能源金融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费金等中俄双方代表出席论坛并致辞，还共同为我校中俄能源研究院的成立揭牌。

黄泰岩在致辞中阐述了中俄能源研究院的办院宗旨，即与兄弟单位一起，助力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服务中俄两国政府能源战略决策和能源政策制定，能源企业合作与发展，能源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能源高新技术与装备产业化交流与研究，为中俄两国乃至全球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安全作出贡献。他还表示，将利用中央民族大学在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优势，助力中俄能源贸易。

李庆文在致辞中传达了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对中俄能源研究院的殷切希望，并表示研究院的成立将推动中俄能源战略进一步向扎实具体实施迈进。

奥列格·杰米好宣读了俄罗斯能源部的贺信，对中俄能源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期望中俄能源研究院在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能源研究院的同时，为中俄能源发展提供助力。

韩文科在发言中表示，中俄在水电、煤炭、油气等资源开发领域和能源产能合作方面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在此背景下深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和能源产能合作，需要对合作理念、企业走出去方式、合作模式

等作进一步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合作的理念和模式更加适应世情区情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趋势。他认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既要依赖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为平台，也要注重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自主作用。要避免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即政府间热，民众间冷；政府间热，企业间冷的情况。同时，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理念，对传统能源项目加大创新力度和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管；对清洁能源和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项目，尽可能地考虑本地制造能力提升和本地资源利用等。在具体项目上，建立与相关利益方及当地民众和沟通和谐相处的渠道和机制。要避免仅重视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的行为；避免仅与地方当局沟通，打通关节，忽视与地方民众沟通，忽视地方民众关切和利益的行为。

弗拉基米尔·费金院长在演讲中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表示看好，也表达了对中俄能源研究院的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认为，中俄之间能源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双方的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油气贸易领域，合作的空间和方式还有待继续拓展和深化。他建议，第一，应该鼓励中俄企业共同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加大与中国企业在油气等资源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扩大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资源的开发，也将大大有助于提升俄罗斯能源企业的资金与技术保障，从而稳定和扩大俄罗斯的油气产量；第二，加强两国在能源技术、服务和装备领域更加富有成果的合作。加强两国能源装备和油田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有助于降低俄罗斯油气开采成本，稳定油气产量，实现中国设备制造和油气服务与俄罗斯企业的产能合作；第三，推进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的管道建设。推进俄罗斯与整个东北亚地区之间油气管网的建设，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俄罗斯油气出口市场，提升俄罗斯在亚洲油气出口市场的份额。

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也在演讲中谈到其对能源领域的三点思考：一是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待改善；二是石化领域的能源安全尤为重要；三是化学工业是新能源的重要支撑。他认为新能源的发展，无论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未来的氢能，都离不开化工新材料和特种化学品为其配套，太阳能的光电转换介质、太阳能背板的绝缘膜、风电的叶片材料及其粘





合材料都是化学品和化工新型材料，生物质能、燃料电池以及未来氢能的储存都需要化工新型功能材料。所以，石化行业在不断提升油气保障能力、大力发展清洁替代能源、非粮燃料乙醇、生物燃料等清洁能源的同时，还要加大化工新型材料和功能材料的创新与产业化，为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华能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赵勇在演讲中表示，首先希望加强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合作，在前沿可再生能源技术、清洁煤电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实现资源和经验共享，共同提高能源科技创新水平。其次，推动海外市场拓展合作。希望联合俄罗斯相关能源企业，利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两大战略对接的机遇，

积极寻求在中国、俄罗斯以及第三方市场投资开发合作，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利用各自独特资源，有效应对风险，实现互利共赢。最后，在智库建设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解树江院长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众人拾材火焰高，相信在各界领导、专家的关心和支持下，中俄能源研究院定能走得更远、更好。”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近代中国的族群、民族与边界” 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 12月9日上午，“近代中国的族群、民族与边界”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文华楼1304会议室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中国族群边界的形成与变迁、近代国族建构与民族政策、近代国族、民族观念的传递、民族识别的国内外经验等主题，从不同学术角度进行跨学科讨论，并为中国各民族协同发展献言献策。研讨会由我校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跨境民族与边疆社会稳定研究团队、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主任祁进玉教授主持会议。

开幕式上，科研处处长乌小花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学学院院长麻国庆教授、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丁宏教授分别致辞。

研讨会上，研究院（中国台湾）黄克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分别做了主题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本部与边疆”和“如何认识跨境民族”报告，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杨圣敏教授对主旨发言做出评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希恩研究员、中央研究院（中国台湾）吴启讷副教授与访问学者赵树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教授等18位学者就“中华民族建设与民族识别”、“族群政治格局的形成与中国的近代转型”、“文化碎片与跨越边界的行动理性：族群互动中的新纽带、新机制及新主张”、“湘西苗疆与族群边界”、“甘青民族走廊地带的文化、宗教与族群性多样性研究”等专题进行发言，与会人员除以上学者参与外，还有来自陕西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年轻学者进行专题研讨，中共中央党校胡岩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台湾）黄克武研究员和我校张海洋教授、丁宏教授四位学者对专题发言做出评议。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会” 在我校举办



本刊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实施意见》精神，激发全市高校师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进一步提升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素养，市委教育工委主办，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孙英名师工作室”、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典著作研究会）承办的2016年度“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会”活动，于12月9日在我校文华楼西区一层报告厅举行，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京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余名思想政治或相关专业和领域的师生汇聚一堂，共同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读书会中，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从背景及文本结构、主要内容、重要理论问题等三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了深入全面的主旨解读；北京大学白雪秋教授从问题的提出、唯物史观在《资本论》研究中的运用、《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验证和深化等方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进行了拓展解读；清华大学王传利教授结合现实情况，分析了当前学界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的不恰当倾向，提出在马克思经典著作学习和研究中应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在“化”上下功夫；北京师范大学马

振清教授分享了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体会；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孙英教授介绍了马克思的两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分析了对五种社会形态分类的诘难。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相关问题，参加活动的师生与现场嘉宾进行了热烈讨论。

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朱雄全出席读书会活动，并在发言中简要回顾了我校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典著作研究会）开展活动的情况，重申了高校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典著作研究会）自2013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各位专家的指导支持下，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活动开展得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经典品牌；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全面加强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取得了很大进展，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典著作研究会）首创和坚持原原本本地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堪称是首都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亮丽风景线；在刚刚胜利闭幕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针对性；他希望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和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典著作研究会）进一步发挥优势，发挥出更大的协同效应和引领作用，开创中央民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为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做出贡献。

读书会由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士庆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线上
线下



文传学院举办 “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

本刊讯 2016年11月25-27日，由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大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等三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共提交论文46篇。开幕式由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傅承洲教授主持，我校文传学院院长钟进文和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分别致辞。

大会举行了两场主题报告和两场小组讨论，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探寻古代小说的丰富意蕴；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版本文献与作者研究；从思想内涵、结构、叙事、人物等方面入手，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致解读和阐释；古代小说的批评（包括评点）、改编与传播研究四大主题。

在从文化的角度探寻古代小说的丰富意蕴研讨主题中，中国人民大学张国风教授《雅俗之辨与〈儒林外史〉的隐性评价体系》详细梳理了雅俗之辨在先秦、两汉、魏晋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意义，以及雅、俗两种文化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进而将雅俗之辨视为《儒林外史》中隐形的价值评价体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山海经〉的巫文化解读》从巫师、巫术活动等角度梳理、分析了《山海经》所反映的上古巫文化；安徽师范大学俞晓红教授《唐人小说寺院游寓故事的文化解读》通过对唐人小说中寺院游寓群体及其多种活动、目的的探讨，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唐土寺院游寓文化。

研讨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版本文献与作者研究的主题中，辽宁大学胡胜教授《〈西游记〉与“目连戏”渊源辨》考察了目连戏与《西游记》的渊源关系及各自的动态演进过程，认为二者在同台演出中相互借鉴、交融；傅承洲教授《关于〈西游补〉的几个问题》考述了《西游补》的作者和刊刻年代，并在界定该小说补书性质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西游记》的承变；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李汝榛及其〈阴晋异函〉考论》论述了清人李汝榛的生平，及其编撰的志怪小说集《阴晋异函》的成书年代、编撰体例、内容特点和其中关于《聊斋志异》的信息。

从思想内涵、结构、叙事、人物等方面入手，对

小说文本进行细致解读和阐释讨论主题中，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老残游记〉三论》分析了作者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清官、时局的认识和对太古学派思想的宣传，认为该小说所写实为老残发现社会病源、探讨医方的过程，亦写出了作者的一段心路历程；我校文传学院曹立波教授《生日与〈红楼梦〉婚恋故事的艺术构思——从芒种饯花与怡红寿宴谈起》从贾宝玉生日和芒种节的角度探讨了《红楼梦》婚恋故事的艺术构思；北京师范大学张石川副教授《论〈金瓶梅词话〉叙事时间的若干问题》考述了小说中存在的时间错漏问题和两套不同的叙事时间，进而推论出两条重要信息；我校文传学院叶楚炎《杨执中原型人物考论》在考辨《儒林外史》中杨执中原型人物王藻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一人物的形塑过程及其叙事意义。

古代小说的批评（包括评点）、改编与传播研究研讨主题中，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神怪小说批评中的偏见与误解》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神怪小说在古代乃至民国初年的文学评论中遭受的偏见和误解，并从这一侧面反观出神怪小说艺术思维的特点；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明清以来“三国”说唱文学编创经验综探》着重论述了民间艺人在改编、说唱《三国演义》的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带有共性的编创经验；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海教授《宋元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细致梳理了宋元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传播和研究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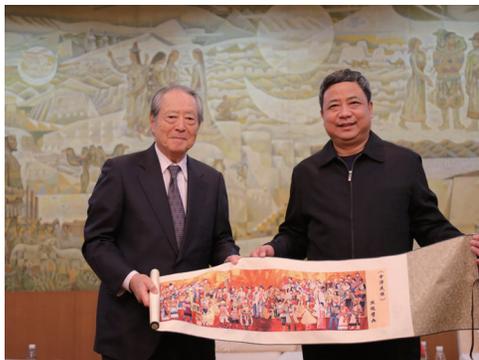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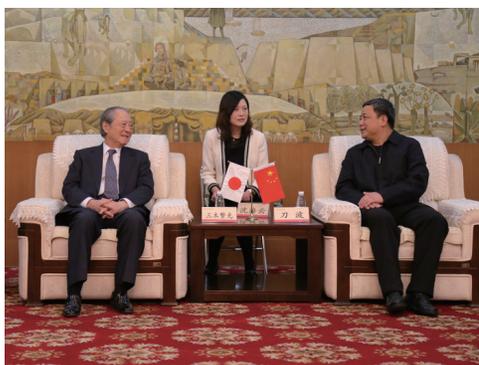
闭幕式由曹立波主持，中国传媒大学朱萍教授和廊坊师范学院许振东教授分别汇报了小组讨论情况，复旦大学罗书华教授致闭幕辞，傅承洲对本次学术会议进行了总结。

本次研讨会，前辈学者和青年才俊济济一堂，相互交流学习，开展了范围广泛、视角多元的研讨，必将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刀波会见三菱 UFJ 国际财团理事长一行



本刊讯 11月30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刀波在中慧楼贵宾室会见了来访的三菱 UFJ 国际财团理事长三木繁光一行。学生处处长马国伟、副处长贺露露参加会见。

刀波代表学校对来宾表示欢迎。他说，非常感谢三菱 UFJ 国际财团多年来对我校的支持。中国有句老话“日久见人心”，今年是“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奖学金”在我校设立 20 周年的日子，该奖学金目前在我校已累计资助学生 800 余人，这是个巨大的工程，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实属不易。我校会记住这种真情和友谊。

三木繁光饶有兴致地向刀波详细询问了学校学生的基本情况，希望拿到奖学金的同学能够好好学习，将来能贡献社会。

日本三菱 UFJ 国际财团专务理事小沢良明、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行长小原正达、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经理 马利联、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沈涪云随同来访。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副校长代表团访问我校

本刊讯 2016年12月1日上午，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副校长大卫·萨德勒代表团一行访问我校。我校宋敏副校长在三号楼一层会议室接待了来访外宾。理学院院长王义全、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张瑛参加会见。

在介绍各自学校情况后，双方就理学院本科生“3+1+1”项目和研究生“1+1+1”项目合作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表示希望将合作扩大法学、语言文学等专业和领域。

伦敦大学是世界百强名校，英国常春藤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英联邦大学联盟成员。玛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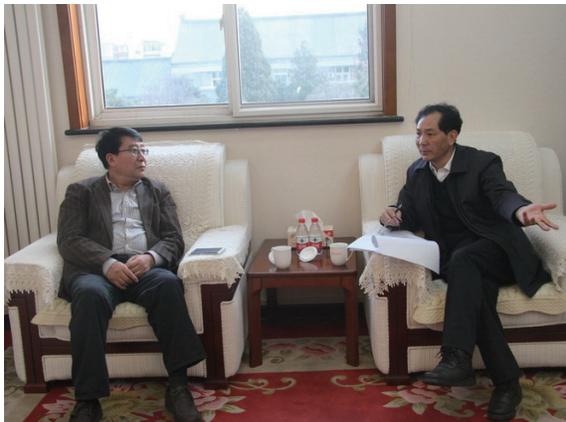
女王学院以英国玛丽王后命名，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伦敦大学联盟中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同时也是伦敦大学联盟中唯一将教学、科研及住宿场所都设于伦敦中心的校园式大学。学校现有学生近20000人，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超过7000多人的海外留学生，增进了学校的多元化色彩。曾就读校友中包括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它各行业领袖。玛丽女王学院在201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98位。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合作处



合作
交流

西昌学院副院长来校考察交流



本刊讯 11月30日下午，西昌学院副院长曲木伍各等来校考察交流。副院长曲木铁西在三号楼三层接待室与来宾进行座谈。

座谈中，曲木伍各介绍了西昌学院与民大的历史渊源、学院的基本情况以及拟与我校合作交流的基本项目。曲木铁西就人才培养、科研交流、师资培养等相关合作交流情况作出回应，并表示，民大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高等学府，办学宗旨之一就是为民族地区服务，而协助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做好相关教育工作是民大服务民族地区的重要途径，民大将会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给予西昌学院积极支持。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院长何刚，我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张俊豪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木乃热哈参加了座谈。

据介绍，西昌学院属于四川省属本科院校，目前学校开设64个本科专业、42个二级学科，在校生达17000余人，教职工近1000人。学校以“明德、乐学、求实、至善”为校训，立足地方资源优势，以培养生产一线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少数民族地区实用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地方性、应用型、民族性”三大办学特色。目前，西昌学院正在为把学校建成全国民族地区知名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而努力。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校长 肖恩·休斯顿教授一行来校访问

本刊讯 12月2日上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校长肖恩·休斯顿教授一行四人来校访问。我校校长黄泰岩、副校长宋敏在三号楼一层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会谈。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张瑛、教育学院院长苏德毕力格、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任国英参加了会谈。

会谈中，黄泰岩对肖恩·休斯顿教授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代表学校与对方签署了《学生研究交流项目协议》。宋敏回顾了两校间合作的历史和形成的深厚感情，希望两校进一步拓宽交流渠道与合作空间，通过合作互享更多优质资源，共同发展。肖恩·休斯顿表示，每年都有新的方式来开拓和加深两校之间的合作，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两校师生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宾主双方共同就联合办学、语言文化研究、科研合作、师生互访等方面进行了磋商和探讨，并对即将签署的教育硕士联合培养协议细节进行了讨论。

据悉，自2011年以来，悉尼大学多次访问中央民族大学，两校就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中国少数民族领域的科研情况、两校学生体验式学习项目合作、联合硕士培养、教师学生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商谈与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合作交流



内蒙古民族大学 考察团来校调研交流

本刊讯 12月7日上午，内蒙古民族大学考察团一行7人在校党委书记刘志彧和校长陈永胜的带领下到我校进行调研交流。我校党委书记鄂义太在三号办公楼三层会议室接见了考察团一行，代表学校对考察团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双方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合作和相互学习。

我校副校长宋敏、曲木铁西，及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张俊豪，期刊社社长贾仲益、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英、预科教育学院院长闫建敏、人事处副处长赵英男与考察团一行，围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核心期刊建设等进行了座谈。座谈交流由曲木铁西主持。

座谈中，陈永胜介绍了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历史沿革，以及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希望在学科特色的打造与凝练等方面向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并期待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进一步得到中央民大的支持。随后，宋敏介绍了我校的办学宗旨和目标、“双一流”建设的顶层思考和中微观规划，以及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情况和思路、在专业结构调整和布局方面的具体举措和成效。曲木铁西围绕高端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两个方面介绍了我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情况和成效，赵英男介绍了我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闫建敏从培养方式、教学改革和监控体系等方面介绍了我校预科教育的基本情况；孙英从学位点建设、人才培养特色做法和平台搭建、教学改革等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情况；贾仲益从办刊定位、学术方向、稿源、队伍建设和理顺与学科的关系等方面分享了对如何建好期刊社的思考。曲木铁西最后指出，内蒙古民族大学作为办学特色鲜明的综合性民族大学，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希望双方日后进一步加强交流和学习。

据了解，内蒙古民族大学始建于1958年，位于通辽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建高校，也是国家“十三五”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高校。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合
作
交
流

缅甸少数民族事务部 部长代表团到访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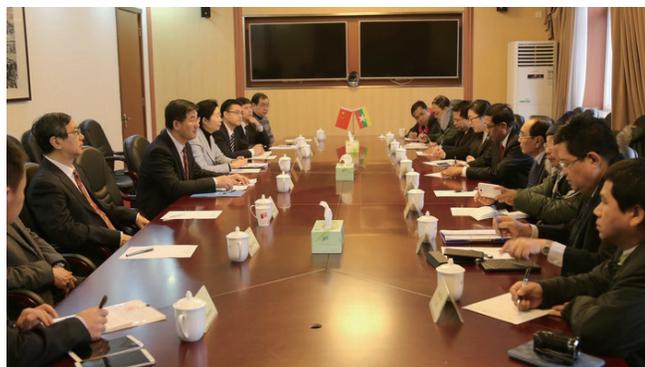
本刊讯 12月12日上午，缅甸驻华大使、缅甸少数民族事务部一行到访我校。校长黄泰岩、副校长宋敏在三号楼一层会议室会见来宾。

黄泰岩对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表示希望今后能与缅甸进行一系列国际化的交流合作。

缅甸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奈岱伦表示，缅甸少数民族成分多、居住分散，民族地区状况攸关国家发展稳定，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学习借鉴中方在管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教育等方面的工作经验，也希望中央民族大学能够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等方面给予帮助。

国际合作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据悉，缅甸少数民族事务部是缅甸民盟政府成立后，为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引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积极发展本地区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事业，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加强推进民族关系向“平等、团结、和谐”发展，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设立的新部门，专门负责少数民族事务。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合作
交流





2016 羌历年晚会 在京举行

2016年11月13日，由北京羌族同乡联谊会 and 北京羌族文化公益基金共同主办的“望羊角花开，凝羌风古韵”2016羌历年庆祝晚会暨峨思拉霸奖颁奖晚会隆重举行，300余名在京羌族同胞和来自首都各界关心关注羌族的亲友嘉宾齐聚中央民族大学中慧楼音乐厅，他们佩戴着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羌红，互祝“纳吉纳鲁”，共饮咂酒，同舞萨朗。

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其余散居在阿坝州松潘、黑水、九寨沟等县和甘孜族自治州的丹巴县、都江堰市、雅安市，少数分布在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和云南省，现有人口约309,576人（2010年），

自称“日麦”、“尔玛”，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羌历年，羌语称“日麦节”，意为“羌历新年”、“过小年”“丰收节”等，因羌族平阳历而得名，一般以农历十月初一为节日，活动为期3-5天，是羌族一年中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的最为隆重的节日。羌族没有文字，大量的羌族文化是靠口传心授来传承的。“日麦节”活动在民间长存而不衰，这说明她和她的民族一样，具有顽强生命力。1986年，由在京羌族同胞首先发起“日麦节”活动，由此“日麦节”作为羌族文化品牌的亮点倍受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并为官方所认同。1988年，茂县、汶川、理县、北川四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为期4年的“日麦节”活动，同年，该活动被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人民政府确定为羌族同胞的法定节日。“羌年”于200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羌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2009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此,羌族传统节日“日麦节”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

北京羌族文化公益基金理事张波向记者介绍,北京羌历年庆祝活动起始于1986年,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专门的羌历年庆祝活动。早期传统的羌历年活动,通常是聚餐的形式,关注于羌族同胞的简单聚会。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在北京举行的羌历年活动得到了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和企业的大力支持,邀请在京羌族同胞中的优秀人才,为羌族学子们做各种讲座和报告,开阔大家的眼界,增长大家的见识,庆祝节日的同时,将关注点更多的转向羌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以往羌族文化讲座和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本次羌历年庆祝活动以首届“峨思拉霸奖”颁奖作为重要主题和活动亮点。“峨思拉霸”在羌语里的意思是羊角花,是羌寨里最常见的一种高山杜鹃,被称为“羌族人的守护之花”。经过几位专家学者认真的评审,2016年度首届“峨思拉霸奖”名单终于出炉:

一等奖

郑伍曦 《龙溪羌语语法》

二等奖

王保峰 《龙溪羌语实验研究》

夏懿 《透视疼痛 -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羌族生命文化》

三等奖

孙文 《资源人类学视角下的黑水县多布村的生业研究》

卞全琴 《阿坝州境内自愿移民的人类学研究》

刘杨 《羌族民间故事毒药猫变形母体研究》

李有静 《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建自经纬》

张波说:“羌族人重视教育,人数不多的羌族,却培养出众多优秀的人才。在北京工作的羌族同胞中,就有很多知名学者,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副教授张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成龙等。举办‘峨思拉霸奖’评选就是要鼓励更多的青年学子投入到羌族文化研究中来,本次获奖的学生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既有羌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他们提交论文或调查报告,都是与羌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语言、民俗等相关方面的主题。这是很好的开端,一届一届



的办下去,对于羌族文化的研究、传承和推广,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届“峨思拉霸奖”还专门设立了一项特别贡献奖,中华民族园羌族馆馆长余步勇荣获了这项殊荣。能歌善舞的余步勇来自四川茂县,是一位朴实的羌族汉子,1995年来到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交流演出两年,2008年正式承担起了中华民族园羌族馆的演艺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羌族馆成为了首都推广和宣传羌族文化的重要窗口,为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回顾30年来的羌历年活动,在京羌族同胞的生活,也和我们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在北京的羌族同胞,主要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活跃,一些经商,务工人员也从羌族地区来到了首都。目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羌族同胞有近500人。参加了1986年的首次羌历年庆祝活动的张波回忆说:“当时我只是一个17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学校门外的白石桥大街还是满街的高大杨树,国家图书馆附近还全部是白菜地,感受最深的是那时候我们的眼界、能力、学识和现在的大学生是无法相比的。举个例子,30年前,我们很少人能够来北京读书,大部分人对国外更是一无所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家乡的羌族孩子们考到北京读大学,甚至出国留学。30年来,年轻一代羌族学子的进步,和他们在羌族文化传承中体现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最使我们感到欣喜的,这也是我们在羌历年庆祝活动中设立‘峨思拉霸奖’的初衷。”

武雷



在京土族欢度 2016 安召纳顿节

本刊讯 2016年11月12日在北京的各界土族群众及社会人士欢聚中央民族大学欢度第九届“中国土族文化论坛”暨第十六届“北京土族安召纳顿节”本次土族文化论坛与会者达一百多人。

每到农历7月12日正式开始这天，土族群众都会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一起，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晚宴中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土族学子身着漂亮的民族盛装进行土族传统文化习俗歌舞表演，精美的土族刺绣作品展，吸引了过节的各界土族群众及社会人士。

“安召纳顿节”是结合互助土族的“安召节”和民和土族的“纳顿节”而设立的土族群众的节日，自1993年开始每年由互助、大通、民和三个有土族世居的县轮流举办。

据青海省土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徐秀福介绍，纳顿节是土族群众庆祝丰收的一种社交娱乐活动，也称“庄稼人会”“庆丰收会”等，“纳顿”则是土语音译，意为“玩耍”“娱乐”。据徐秀福介绍，纳顿节从明代开始便成为了生活在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群众非常重要的大型土族民俗庆典活动，也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民俗庆典，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活动从一个村落传至下一个村落，以此类推直至活动结束，成为村落之间化解恩怨、互通有无的一种交流形式。时间从每年的农历7月12日正式开始，至农历9月15日结束，历时63天，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



彝年聚亲朋，彝心暖京城

——2016 北京彝族同胞欢度彝历新年系列活动在中央民大举行



本刊讯 2016年12月2日到3日，北京彝族同胞欢度彝历新年的系列庆祝活动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师生和在京的数千彝族同胞及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了彝族年体育竞技、彝族年彝族文化论坛、彝族年文艺晚会、达体舞会等系列庆祝活动。

彝族年亦称彝历年，是由彝族太阳历的第一个星回节转化而来的彝族重要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彝族地区，每到彝族年，彝族人要合家团聚，杀猪宰牛，祭拜祖先，辞旧迎新，彝族年也是彝族人的又一个“春节”。北京彝族年的举办始于1978年，是在果基宁哈、岭福祥等前辈的努力下发起，三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北京彝族年旨在传承民族文化，增进在京彝人的民族情结，让不能回家过年的在京彝族同胞感受到彝族年的喜庆与温馨；同时也让各兄弟民族感受到彝族文化，促进彝族和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多年来，在国家民委和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等单位、企业和热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北京彝族年办得越来越好，成为了全国彝族年庆典活动的“榜样”，成为展现彝族人风貌，宣传彝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折射出彝族人紧跟大时代发展，感恩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时代精神。此次彝族年庆祝活动由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与在京彝族年组委会共同筹办，由曲木铁西和岭福祥负责总指挥。活动得到了国家民委、北京市民族联谊会、中央民族大学、四川省凉山州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四川省凉山拉哈矿业集团总经理保伍拉哈的赞助和支持。

本次彝族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热闹的竞技娱乐和学术交流样样不缺。12月2日上午，民族大学师生进行了彝族年系列体育竞技活动。12月2日下午，由彝族青年学者博导巫达组织举办了“2016年北京彝族年彝族文化论坛”，论坛现场挤满了优秀的彝族文化学人。12月3日下午在民族大学礼堂举办了2016北京彝历新年文艺晚会。12月3日晚上，在中央民族大学体育馆举行达体舞会。

文艺晚会是彝族年活动的重头戏，整个礼堂座无虚席，来自北京和各地的领导嘉宾出席。晚会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曲木铁西致辞，北京市民族联谊会会长张学斌、云南省彝学会会长杨正权分别作讲话。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刘正发主持开幕式，他介绍了彝族年基本组织情况，并代表组委会向赞助彝族年的单位企业和个人致以诚挚感谢！

晚会共分《过年好》、《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三个篇章，荟萃北京和各地的优秀演艺人员。莫洛依鸽（陈芳）、马达、衣呷、杨大卫等彝族新秀担



当晚主持人。阿库乌雾、苏都阿洛、马玉龙、阿鲁阿卓、阿木、彝人制造、陶建阿成、罗洪木嘎、俄木沙马、乌萨、李菁梓以及银河星组合、启明星组合、中央民族大学火把协会等彝族文化界、文艺界等明星名人相继上台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过年好》、《千里凉山迎新春》、《我们都是一家人》、《哦啦》、《吉祥酒歌》等歌曲舞蹈和诗朗诵轮番亮相，为在京彝族同胞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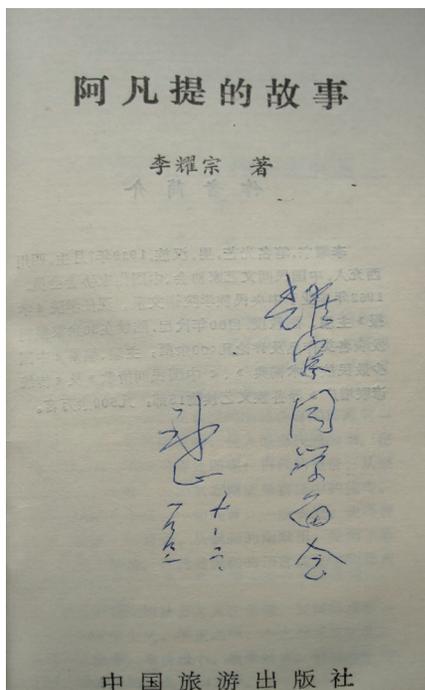
黄平山



评论讽刺小说

——阿凡提新篇

冰心



我为什么不说“介绍”而说“评论”，因为凡是阅读《北京晚报》的人，拿到报纸，总会先看阿凡提新篇。这位六七百年来的，在新疆被人传说称道的老人，太可亲、可敬而又可爱了！

古往今来，人们在自己周围总会耳闻目睹到一些听不下去、看不顺眼的、使人愤怒厌恶的事。在这时候，我们怎样对待处理呢？古代的皇帝，从来不能接受“直谏”，而东方朔或是宫廷中的优伶，却能用讽刺的方式，一句戏言，一段表演，使得容不下“直谏”的君王，从讽刺的幽默里，受到了教训，得到了警惕。这就是讽刺的语言或文字的最大用处！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又何尝没有一些大之如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小之如随地吐痰、坐车不让座等，事情很小，效果极坏。对这些事的批评，最好用的就是讽刺文学。

讽刺文学要短、小、精、悍，一语破的，直刺要害，但“短”、“小”和“精”，写来还都容易，“悍”字却不大容易做到。因为稍微“悍”得过了头，就会有“心里有病”的人，从四面八方送来怨谤，最怕的还是从上头忽然给你来个当头一棒！

李耀宗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民间文学、艺术等作品，都有很深的研究，并已出版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集子。这里，我只讲讲他写的这部《阿凡提新篇》。他怀着一颗嫉恶如仇的心，聪明机智地请出了这位可敬可爱的新疆阿凡提老人，请他骑上小毛驴，东跑西颠，以幽默风趣的讽刺语言来对这些让人怨愤厌恶的人和事，尽情地热嘲冷讽。这当然也会使“心里有病”的人，极不痛快，极不高兴。但这没有关系，只要笑呵呵的阿凡提老人，跳下驴来，作个幽默的“检查”，再鞠一下幽默的躬，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作者绝顶聪明的地方。

1987年10月16日晨

本文原载《北京晚报》1987年11月3日第3版，题《评论讽刺小说——阿凡提新篇》。1992年《新篇》汇集成书，冰心首肯赐作《代序》。同年10月2日，作者表示今后出个人《选集》，尚望老人奖掖再序。老人微微一笑，当即在此《代序》旁，题赠“耀宗同学留念”。作者惑感“同学”之称。世纪老人耐心诲曰：“文学属于人民。我们搞文学的都生长民间，都在学习民间，称‘同学’没错。”

李耀宗 本校语文系1958级校友，1962年毕业于留校，从事写作、民族民间文化教学与研究，文学系教授。历任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学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等。独、合著《民间谚语谜语》、《民俗学概论·民间语言》、《中国民间情歌》、《初春草韵丛》等20余书。研、创代表作有长论《天心一柱定中华——论黄帝出生建都有熊的历史人文契机》及《阿凡提新篇》、《天安门赋》等。迭获“中国改革开放文艺终身成就奖、中国当代最富影响实力派诗人、感动中国杰出文化传承人”等殊荣。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及香港《文汇报》等数十传媒专访、揄扬。传入《共和国功勋人物志》、《中华名人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百余书。

额鲁特的诗

父亲的长调

当父亲的长调在那片草原响起
狂野的风也会停息
温暖的天空下那静立的太阳花
此刻也会为这天籁之声着迷

父亲的长调是草原人灵魂的希冀
向着陌生的心籁轻轻开启
在那苍茫的景色里
所有的烦恼都因此而抛弃

父亲的长调是我童年的回忆
离家越久越觉得清晰
每一个晨光初微的早晨
都会把迷离的我唤起

父亲的长调啊
厚重而又细腻
多少个沉醉的夜晚
都是我无法割舍的旋律

父亲的长调啊
那是民族古老的传承和记忆
虽然我的族人已漂泊四海
都会让我们不离不弃

2016.06.19

在那东山岭上

在那东山岭上
我找到一株菩提树
菩提树下
我的心却不知逃到哪里

都说菩提原本就没有树
为何我要转动树下那金色的经桶
明亮的镜子不会有尘埃
为何要掬一捧山泉洗涤我的面颊

你和我之间本来就虚无一物
为何要透明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相伴
踏入这山门想寻得片刻的宁静
为何要祈祷一柱清香一缕烟

灵魂的颜色是一株金黄的树吗
为何树上难以寻觅青春的果实
都说人生是一场梦
为何梦中的内心在不停地颤动

2016.02.08

副刊



月亮下， 香的声音

屏住呼吸
忘记所有的烦忧
望一双纤细的手
用散发着暖光的银质香押
一抹一抹
轻抚心状的香塔

当一缕青烟释放
月亮下
我听到了
香的声音

那平静的声响
如母亲的轻唤
似婴儿的睡酣
如故乡的晨钟
似恋人的呢喃

那一刻
我的内心如氤如氲
仿佛在故乡的草原上
看到的月光如兰

2016.10.16

阿尔山的雪

当洁白覆盖住了金黄的树叶
我的眸子里噙满一泓绿波
玫瑰峰缠绕着蓝色的哈达
蒙古人的骏马奔向苍凉的旷野

新酿的马奶酒醉倒了月亮般的情人
断了弦的蒙古箏依旧在风中嘶鸣
杜鹃湖畔拾起的那一片落红
点燃了千里之外的大漠烽火

在山脚葬下一朵蒙古菊的芳魂
用泪流成河的喉把一曲长调唱完
掬一捧圣泉洗去昨夜的酒尘
银色的光芒中思念相逢的下一个春天

2016.09.29



我们在一颗星的光中出发

九月的草原
沸腾的火焰已经熄灭
记忆的长调在风中消逝
父亲的琴声湮没在沉静如海的原野

远方是苍白的地平线
我们在一颗星的光中出发
虽然已经痛饮过烈酒
野草依旧用露水为我们饯行
周围一片肃穆的寂静

盖住了喇嘛庙的诵经声
不再听到夜莺动听的歌唱
只有天空那映照人心的明镜

前方召唤和吸引我们的一切
是一颗星的光芒

2016.09.11

八月，那个没有歌声的夜晚

八月，那个没有歌声的夜晚
我站在故乡的草原上仰望星空
夜空中最亮最亮的那颗星
是我久久仰慕的情人

月光下的草原有一条白色的路
我在路上追赶着那颗星星
我知道，她也是无家可归的旅者
但是追到天边我们也不能相逢

黎明吞噬了我的爱情
我又怎能怨恨这岁月的无情
如果灵魂的爱还在
它将超越岁月和衰弱的身体永恒

2016.08.02

副
刊





诗和久远的记忆

星星的诗

写在平静的湖面上
水草在轻轻地诵读
掀起阵阵涟漪

鸿雁的诗

写在蓝蓝的天空上
云儿在轻轻地诵读
飘下晰晰雨滴

骆驼的诗

写在茫茫的沙海里
沙棘在轻轻地诵读
结出橙黄果实

我的诗

写在故乡的白桦树叶上
风儿在轻轻地诵读
能否唤起那份久远的记忆

2016.07.05

多美的月亮

十月的草原

秋草儿枯黄
季节的风正凉
唯有月亮是牧人的渴望

多美的月亮

月光吻着牧人的毡房
就像海浪亲吻着沙滩
为它轻抚岁月的风霜

多美的月亮

飘渺的雾气镀着银色的光
就像优美的音乐发在琴弦上
莲一般的美丽，兰一般的风情

多美的月亮

牧人的浅吟低唱
短暂恒久的轻吟，唤醒
草原千年的沉寂，泛起佛光

2014.10.26

魏公村往事

多少年前
我们在北京很热闹
魏公村在北京很热闹
魏公村在民院和京工的中间
我们在魏公村乘公交去西单
我们在魏公村给家里发电报
我们在魏公村修破皮鞋
我们在魏公村结识好汉
在魏公村第一次吃海参
在魏公村看上个北京妞
也在魏公村为民歌的一张门票打群架

多少年心中想起魏公村
这个名字它不起眼
这个名字中曾有的内涵
这个地方曾发生的那些事
魏公村书店买到的《十日谈》
把薄伽丘心中的自由和快乐
变成我们的及时行乐
在那些周末的黄昏
我们捧着乡愁的酒杯
一饮而尽
燃起内心的蠢蠢欲动
犹如中了魔法异想天开
以为饮下魏晋盛唐
以为游荡在千里荒原

副刊





小酒馆的老大妈
她的宽厚和关心
每一次把我们感动
看我和大侠老憨吃肉喝酒的大爷们
他们如今还在和撒压韵吗
如今还有让他们惊呆的少年吗
魏公村，它用它不起眼的名字
擦去了我们少年的多少虚度和丧志

多少年后我依旧虚度多少年
恍若隔世却又弹指一挥
依旧四季如幻依旧春夏秋冬
此刻我在河西走廊的风声里
听到一场大雪从天而降
看见这个悲欢交集的人间
想起你，想起你们
想起魏公村的酒馆
和街对面崔健怒吼的《一无所有》
时光是奔跑的马群
多少年后我依旧虚度多少年
此刻迎风而立
沿一缕飘香弥漫的曲线和虚妄的时间
恍然看见
风是色
马是空

强巴彭措

长征诗三篇

长征颂

晨曦初升，华耀大地。
龙翔舒姿，将何往兮？
赤浪怒涛，湍流鸣泣。
毅坚志满，四渡何惧。
铁索桥寒，坠坠欲亡。
冰破衾凉，不畏勇闯。
雪原莽荒，朔风长啸。
远封山河，万军出鞘。
草色尤新，路满泥泞。
深浅步履，难阻其行。
百炼千锤，翻山越岭。
还看来时，笑谈逶迤。
征途险陡，青丝白发。
红日冉冉，终成佳话。
时艰势危，斩苦除难。
而今年少，闻之奋然。
史载人传，历久弥新。
所愿吾国，昌荣民勤。
观古知今，溯来知往。
长征精神，永记心上！

■ 蒋秋玲

法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副
刊





背先辈行囊，承长征力量

战火烽烟，谁将勇气与坚毅镌刻下永恒印记？
国破家亡，谁把不屈与誓死活出了百年魄力？
五星飘扬，谁用热血与生命捍卫着国家荣光？
——题记

昔年血溅泸定桥，
四渡赤水展英豪，
金沙无豫争先渡，
齐聚遵义省自身。

先辈纵死也挥刀，
不惧雪山草地遥，
骏马蹄碎人不畏，
红旗高峰卷龙归。

枯木树皮与鞋履，
寒风雪肆与薄衣，
莫我私意不肯与，
但死我身为他命。

巍峨岂会挡我路，
猛兽敢能驱我返，
能做鬼雄绝不退，
护卫家国可会悔？

吞吐山河雪山耀，
六盘何以防我聚，
万水千山终相会，
我以我血祭苍天。

长征万里遍鼓角，
气势能把草地烧，
纵然东方已先晓，
亦宜上道莫言早。

感我先辈踏破铁马铮铮，
留与后生万里河山一片安好，
感我先辈勇夺险江峭壁，
留与后生国之稳态民之安康。

愿，
以采薇采桑之手，
传承我华夏亘古不变之雄风。

愿，
以承前启后为旨，
接前贤破浪扶风万里耀，
传后辈直挂云帆永世光。

■ 张琪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6 级本科生

我记得长征路上那些人

—

长征是一座不朽丰碑。
多少年来，被人们以各种方式传颂着，纪念着；
随着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到来，长征精神也又一次围绕在你我身边。
而我的思绪，却在一片繁杂中飘回过去——
飘回了当时那条长征路和路上的那些长征人……

—

重走长征路，但长征精神本身却在于那些路上的人——
我记得长征路上那些人。
暴雪夜里，雪山路上，一位战士突然颤抖了腿。
后边的人紧跟两步搀住他，还行吗？歇一歇吧。
山风里裹挟着雪，呼啸着过，此外一时无声……
他缓缓坐下，低着头，身体似乎在抽动，不住地发抖。
而终于，他抬了头，竟然满眼的泪水！泪水混着鼻涕一起，止不住地流啊流……
脸上结着冰霜，眼上挂着雪。
半晌，他没了力气，却像下定了决心一样挣扎着抓住身边手臂，颤抖着声音张开嘴：
“我怕是不行了……但老子就算是死了，也是真想死在终点啊！我多想在终点立块碑，亲手刻上我们这一路怎么走来，哪怕刻完最后一笔就死了，我也算不白活……”
然而，他早已用尽了最后力气……
手垂下，头也终于垂下……
身旁堂堂七尺的汉子，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也从来紧咬着牙的汉子，眼眶红红，背过身去。
忍住泪，有人上前拿起他的党徽，他手里紧紧握着的党徽。
多年过去……
终点立着一块碑，碑上刻了一树梅。



三

那些人给了我太多感动，太多反思与追忆，关于信仰，也关于热爱。

一群最热血沸腾的人，在最动乱的时代，坚持最赤诚的心。

为了抗击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穿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用生命谱写了最壮美的诗歌，奏响了我党一路昂扬的最强音！

而这最强音背后，又藏了多少的牺牲和坚持……

1935年，大雪纷飞的夹金山，雪山跟着风一起颤抖。

低温，饥饿，空气稀薄，在这片被一切生命敬畏的天地间，无数战士再也没能睁开闭上的眼睛……

1935年，四野萧瑟的甘南，一片荒山野岭之中。

物质匮乏，担架短缺，血肉模糊的伤员发出低声呻吟……

15岁的小姑娘努力照顾伤员，拖担架，不放弃任何一位战士。而当她最后体力不支，渐渐无力，最后在河边打水的时候坠入河中，悄无声息……

他们是如此真实的存在于历史，存在于画面，存在于我心。

当有一天，后辈问我，什么是长征精神？

我想起的绝不是仅仅几页铅字，而是眼前浮现出的他们的身影，浮现出的他们平凡而伟大的生命乐章。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是高尚的，而长征精神正是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无论哪个词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都是不朽的颂歌！

今日，中国变强大了。

于是，有人开始质疑：我们是否还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或许有了新的表现方式，但其内核却始终坚定并散发着别样的光彩。

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困难，仍然要有所担当，仍然要勇往直前，仍然要胆识和骨气。难道，这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精神？我记得，长征路上那些人，他们给过我感动和力量，也让我知道自己肩上扛起的责任。

也正是因此，即使时间过去了八十载，我仍会在回忆长征的过往时热泪盈眶。眼中之泪不为悲伤，而是为了纪念永不忘却，更为了祖国飘飘的红旗永远昂扬。

■ 穆霖

经济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图片掠影



外语学院——老照片

Old photo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图片掠影





Old photo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图片掠影





图片掠影





图片掠影





图片掠影





图片掠影

